



捍衛香港新聞自由，反對纏擾法建議！

爭取普選特首，廢除小圈子選舉！

溫家寶再提政改也改不了危機加劇

反核專頁

沒完沒了的經濟危機

家破人亡——追憶陳景光的慘痛一生

捍衛香港新聞自由，反對纏擾法建議！

軍行

香港現屆政府任期尚餘最後兩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重提法改會11年前的建議，為纏擾行為刑事化進行為期3個月的諮詢。

法改會在1998年就纏擾行為進行諮詢，至2000年提交研究報告，把纏擾行為定義為「在某段時期內針對某人所做的一連串使人受騷擾、驚恐或煩擾的行為」，纏擾者包括情痴、曾是密友的纏擾者、對私營或公營機構服務不滿的人、網上纏擾者、黑社會份子等。今天的諮詢文件，就採用上述建議作為諮詢框架，而且擴大定義至集體騷擾及阻嚇合法活動。一旦立法，持續騷擾性的追債、「箍煲」（意「求歸和好」）、以至傳媒不斷追訪都可能犯法，最高判監兩年。這等如是對著新聞自由和新聞工作者等的一把刀。因此諮詢文件一出，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即表示：若政府接受當年法改會的建議、把纏擾行為刑事化，等於將惡法23條「分拆上市」，法改會的定義嚴重削弱言論自由，即使採訪活動可以合理情況作抗辯，但要到法院才能爭拗，即時採訪已受阻，對新聞採訪自由已造成不可彌補的削弱，無法保障新聞採訪自由。她坦言，現時言論自由已漸被收緊，再加上纏擾法，只會令人更擔心。

從歷史例子來看，在號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英國，據《蘋果日報》12月20日報導：纏擾法是新聞界頭上一把利刀，英國傳媒早已身受其害。英國在1997年訂定《免受纏擾法》；到了2002年，已有6,000多宗引用個案，當中不少個案是被人濫用，以阻止記者採訪，干預新聞自由。07年英國能

源公司引用這「惡法」阻止示威並禁止記者採訪，就是極壞先例。

在多方面強烈而有理的反對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在接受《明報》專訪時表示，政府對纏擾行為刑事化無既定立場，只是同意立法制約纏擾行為，對纏擾行為的界定、免責辯護，可開放讓公眾討論，全都「有得傾」（意即「有得商談」）。

為免這份法例通過後會壓制新聞、採訪和示威等自由，又為免可能有人鑽這份法例的文字空隙，而且現時無迫切需要立法，因此應該撤回這次諮詢。

2011年12月28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8卷第2/3期合刊（總第231期）

2011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爭取普選特首，廢除小圈子選舉！

振言

沿用已久的小圈子選舉，今屆雖然從800席推選，增加到1200席，但這樣區區的少數選委，怎能與全港300多萬合資格市民人數相比，而不是剝奪了後者應有的選舉權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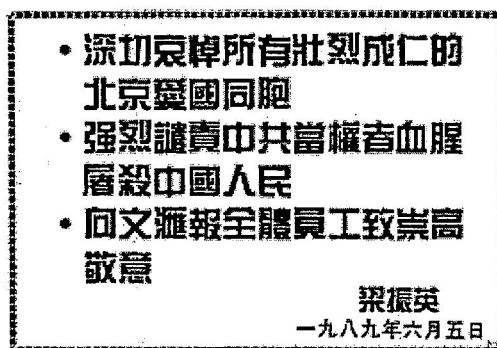
而且，過往以及現時的選委，絕大多數都是有錢有勢的大商家及其代表，連同建制派的人物組成，壟斷了推選的結果，連一點市民大眾的聲音都聽不到，怎能代表全港市民的應有權益？

即使從現時所實際進行的特首提名參選人來看，「選」前幾個月間喧喧嚷嚷，各報章每天都大篇幅刊登參選新聞，幾乎都是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人的參選活動。最近雖然增加了民協馮檢基和民主黨何俊仁快將決定誰代表泛民主派報名參選，但無論是哪一人參選，他都只能串演陪跑角色，而這一參選與他們批評小圈子選舉的言論是相違反的。

至於唐梁兩人無論最後何者當選特首，他也是大財團、大地產商的代表，依照後者的指示，維護後者的利益，也同時遵從北京的意旨，不能有所違背。他有時也要附帶照顧中產階層的利益，但對於低下層市民，即使有些小恩小惠，但不能損害到大有產者的利益。



具體地就唐英年來說，他出身於富有之家，其父親唐翔千原為國內大工業家，大陸解放後帶同剝削工人所得的巨額資金來港開設大紗廠，與北京關係密切。



至於梁振英則長期在地產界工作，為地產商謀利。梁振英去年底改口稱尚未清楚六四事件真相，日前被傳媒斥他參選特首後對六四態度有變，但梁振英昨天拒絕就事件清晰表態，反稱傳媒斷章取義。（2011年12月5日《蘋果日報》）

最大黨的民建聯將在2012年1月中開會決定在選委投票支持哪一人，就公開反映到北京的意向，決定特首誰屬。

唐梁倆在宣佈參選前都作出不少改善民生和政治上改良的政綱，但他們將來能否全部承諾都兌現，卻是很可疑的，試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港人亟需的是普及而公正公平的特首選舉，廢除有權有勢的極少數人的享受特權的現行推選制度，而這必需全體港人盡力爭取，才能得到的！

2011年12月25日

香港的區議會等選舉亟需普及公平廉潔

微波

2011年11月6日區議會選舉結果，建制派的民建聯大勝，連同自動當選的36席，和委任的10席，共得146席，加上上屆沒有打正旗號參選的工聯會得到29席，合共獲得175席，佔了區議會全部議席近三分之一，聯合其他的建制派，將會壟斷區議會的全部正副主席。

泛民主派中的社民連今屆派出28人參選，卻全軍盡墨。從原來的社民連分裂出去而成立的人民力量，派出了62人參選，也只有1人當選。

區選落幕，有不少參選的泛民主派老將都一一落敗，例如公民黨的陳淑莊，民主黨的李永達、王銳德，社民連的梁國雄、陶君行、曾健成(阿牛)、古桂耀、麥國風都終告失利。而對方的建制派，則有不少年青新手得勝，其中有些是以獨立人士名義當選，但不排除部份是有建制派背後支持的。

在區選中，人民力量以狙擊民主黨和民協為目標，不集中力量去爭取選民投票支持而不投票給建制派，反而被選民認為泛民主派內鬨，實際上幫助了泛民主派的共同主要政敵，使建制派漁翁得利，但也沒有給被狙擊的黨造成重大損害，反而增加了一些選民對民主黨、民協的同情和支持。這些都可以表明狙擊是不智的，狙擊者需要虛心檢討，汲取教訓。

社民連的大敗原因有：選前的分裂，近期被建制派藉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抹黑，又遭對手以「暴力政黨」中傷，令社民連一而再被邊緣化等等。這次戰敗，陶君行並不認為需要改變今后的抗爭路線，梁國雄更強調需要商討的是抗爭策略，而非選舉策略，「議席只是抗爭的平台，而非目的」。

另一方面，建制派中的民建聯能夠大勝，並非偶然，主要因為他們財雄勢大，競選經費充足，又有巨額的黨團員及同情者，可動用大量人手拉票。據民建聯本月17日召開年度會員

大會時宣布，該黨過去一年總收入7735萬元，較去年高出1255萬元，資產淨值總計達4525萬元，由此足見他們的經濟實力驚人，可運用大量銀彈去競選。選前後的「蛇齋餅糰」，選後以廉價推銷米油等「酬賓」，答謝支持，都眾所周知。《文匯報》甚至刊登一來函，「力證議員能夠提供『蛇齋餅糰』全憑勤力，多走一步，爭取贊助，方可讓基層市民受惠。」該報並以黑字體的《爭『蛇齋餅糰』贊助全憑勤力》為標題。（見12月19日該報）其實，這不是賄選之一種嗎？賄選者也可「全憑勤力」的。

今次區選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種票情況，幫助某些參選人增加得票數，以至壓倒對手，獲選為區議員，有些獲勝者僅多對方幾十或百多票。選舉事務處至12月19日共接獲超過3,600宗懷疑種票事件的投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其中有1,000宗毋須作出起訴，其餘部份人士未能提供正確的住址證明，有小部份人更承認了自己並非住在其填報地址，所有有關個案已交由警方及廉政公署處理。（見12月19日《文匯報》）

而在9月16日，廉政專員湯顯明已公開表示，廉政公署至今收到47宗有關議會選舉中，涉嫌有人種票的選舉投訴，當中涉及的住址超過2000個，涉及的選民人數介乎5000到6000人左右。（見12月17日《蘋果日報》報道）

實際上，沒有向當局投訴的種票事件相信一定還有很多，發現者只是怕麻煩而不去投訴罷了，以後也會有更多的種票投訴的。當局需要訂立法例予以防範，但不應矯枉過正，損害平等選舉權利和市民參選意欲。

香港的區選以及立法局議員或特首等公職人員的選舉，都必須恪守真正普及、公平、公正和廉潔的原則，嚴禁任何營私舞弊、為非作假、行賄受賄等行為，以維護香港市民應有的基本權利。

2011年12月20日

三百名示威者佔領香港中環

10月15日行動

在10月15日的全球反資本主義行動日的那一天，有300多人在香港中環參加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惡果的抗議行動。範圍廣泛的團體和政黨參加了抗議行動，包括左翼21（Left 21），FM101電臺，學生組織，反核聯盟，雷曼兄弟受害者，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街坊工友服務處等。還有一組青年男子，面戴“V”型面具和黑色衣服參加抗議行動。

整個下午，在那裡舉辦了一個論壇，有團體和個人輪流發言。左翼21的成員抨擊資本主義帶來貧富懸殊，因為資本主義只關心利潤。在香港，少數富人壟斷人民的財富，使後者只能賺取維持生計的工資。反核聯盟活動家魏思曼指出，為了賺錢，核電業由核工業養育。核工業勾結政府和聯合國愚弄欺騙公眾，說身體吸收的輻射量，處在所謂的安全水準上，而這個說法並無真正的科學依據。在福島縣的災難後，日本政府提高了安全水準的裁核，就證明了這一點。來自先驅社的林致良指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大賭場。數額巨大的社會資源都集中在幾個大財團手中，而公共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卻被奪去了必要的資金。他呼籲推翻富人的政權，建立勞動人民的政府，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在傍晚，論壇和所有參加者遊行到滙豐銀行總行地下繼續集會和佔領。在示威者抵達滙豐銀行總行後，警方警告示威者，說他們的集會是非法的，而示威者噓聲回應。最後，警方沒有碰他們。有幾十個示威者在現場通宵安營紮寨，在這份報告撰寫之時，佔領活動仍在進行中。

2011年10月17日

[本刊編者按：其中的年青戰士持續佔領了頗久]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441期，2011年10月號。



痛我回歸國土新現侵略物名

白重慶

大錯鑄成！

自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在1984年歷經數十回艱苦談判，從外強海盜手中接回割離母體（1841至1997）逾150年後，扶立的第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佈籌建新政府總部，毗鄰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的駐港部隊總部大樓新旁——請注意，這新旁絕非原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的所在地，即舊香港英國海軍駐港總部「添馬」號TAMAR 基地！它是從九龍洋（即入侵者改名為維多利亞海峽）的中環灣仔岸邊，填海14萬平方呎所得。原來是1902年一個麻石水塢，之前1878年是簡陋的海軍船塢。

2011年8月18日，為趕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移其大駕蒞港剪綵，概念「門常開」的新政府總部匆匆「落成」啓用。不必多說，年初（1月25日）舉行平頂儀式後，自始傳媒便頻密報導消息，以便社會知悉進度。

於是，甚麼「添馬艦發展工程」、「添馬公園」、「位於添馬艦的新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開始見諸報端；最高層官員如唐英年政務司亦「添馬艦」前「添馬艦」後，招牌笑面回應記者。

筆者納悶了好一段時光：究竟「門常開」政府總部大樓，周遭「地常綠，天復藍」然後「民永繫」，抑或是秘而不宣，又一殖民地侵略舊夢的靜悄悄佈局？公民黨前黨魁關心的只是新闢道路好不好加名「（伍）廷芳路」以媲美原港英高等法院（即所謂立法局／會大樓）旁的臧臣道（按：現定名「立法會道」）；其另一會內議員大狀吳靄儀，也見關心，但關心祇及「孤島上的立法會」（2011年7月24日《明報》「法政隨筆」專欄用題）。看來，關注舊夢佈局的社會大人物，幾乎一個也沒有。反而一些看風水的，趁熱鬧出聲說：『添馬艦位處香港中央，面向灣仔水源聚，後面有群山包裹，有山有水當然好風水，而且「水位」鎖得緊，可以左右逢源！』（港台《舊日的足蹟》，2011年1月30日）

那位風水「大師」一味向「錢」看，完全合乎香港地乜都假，撈世界先的市井哲學，聽入耳誰人不高興。

●
哪可有異議的聲音？

有。多得「風信子」。用此筆名的撰文有心人在一份大眾報的專欄「小氣候」出題：《添馬公園命名惹爭議》（《太陽報》2011年2月16日）他敏銳地指：『……土地上的建築群採用「門常開」設計，落成後有一半面積約17600平方米（公尺）闢作公共休憩用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地……康文署向公園所在地的中西區議會建議命名為「添馬公園」，以配合附近地段的統稱。』他承段提問：『「添馬公園」的名命好嗎？』然後引用史料，結論『這是一段戰史，也是一段殖民地歷史，從來只有「添馬艦」，並沒有「添馬」……官員把添馬艦簡化（筆者按：該是膽大包天的轉化）為添馬，考慮命名的過程，有參考這段殖民地歷史嗎？還是因為有這樣一段歷史，故意隱諱添馬艦之名，淡化殖民地歷史呢？』借地區輿論，認為『不如全新考慮其他命名，例如「門常開公園」讓添馬艦之名從此走入歷史。或許10幾20年後，市民已經忘記添馬艦在哪裏……香港的過去，就凝結在那一刻的歷史長河之中。反正一個不尊重歷史、忘記歷史的政府，也將會被歷史無情地嘲諷。』

究竟風信子的尊重歷史最正確方法，是否保留略侵者、佔據者在地設施的冠名，「原汁原味」再延伸新市時代，恢復國土身份地位的香港，以示曾有此被佔恥辱才是不「忘記歷史」？他語焉不詳，幸好提出「門常開公園」正確好名。而可疑的「添馬艦」要先解釋其前史：那英王愛德華五世時代，那派駐「遠東」征服大清朝中國，因而被迫在《南京條約》加署割讓而實早已由接林則徐手的欽差大臣滿人琦善，靜雞雞年多前（1841年12月26日）「給與」了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在虎門舟上簽了所謂《穿鼻草約》以香港供英國軍商攜眷「寄居」之地的運輸艦，它重3650噸。整個「皇家」駐港海軍便靠它運來？或運來武器大炮？它有一個源自掌管天氣的神話女神TAMARA的雅稱TAMAR。當時通譯師爺不弱譯「甜媽」，而威武地硬譯「添馬」有其「時代局限」。添足人馬，確然是龐大運輸機器的本領功能。

不過，添足人馬並非事實，另一隊狼子野心的大東亞共榮圈皇軍一攻入本港，軍力見拙的「皇家海軍」，便二話不說，把H.M.S. TAMAR這艘1897至1941年期間，長駐海邊的大搬運機器，於1941年12月12日，自行鑿沉。「皇軍」未到，先來一個玉石俱焚，H.M.S. 香銷玉殞，不再為女王陛下服務。這女王是誰？是香港常常戲謔伊為「皇后」（后）的域多利，其後廣泛改譯維多利亞。她十八歲登上王位，趕上海盜們奪得大清朝中國南部最佳深水港——香港島，其後九龍半島，又再99年拓展界址「租借」深圳河以南——的好日子。這婆娘冠名於香港各處，多至不可勝數。她現仍座鎮港島最大市肺，我們烙成共同記憶的「維多利亞女王公園」，老去了她，惡眉惡相死佔公園入口。

自70年代初起，被人起碼淋了2次紅油：1次是反殖民地填鴨式奴化教育制度；近1次是潘姓行爲藝術人，心血來潮，提醒港人她是一個醜惡的侵略者頭子。

但女王所屬的皇家畢打海軍上尉，下令自沉巨艦，成爲九龍洋海底意外的廢鐵。它不意的借地沉屍，死於自己人的魚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英倫海盜又重佔香港，打撈殘骸，剩得一些爛板改造成聖約翰教堂木門，每星期容納罪人到來懺悔，如此而已。

真的如此而已？關於它，前後2冊中西區區議會出版的《中西區風物志》，又真的祇有此小段「大添人馬」機器的簡史。筆者相信，3650噸巨艦不是專爲擺設而來，它之長期停泊水塢，作用等於當年林則徐雷厲風行銷毀鴉片的大政所致，外洋毒販的煙土都要逃到和借居零仃洋而停泊的「鴉片躉船」。義律企圖拖其時澳門的葡萄牙兵頭落水，被林欽差親往查察禁煙；澳門一地配合舉措的行動之後，義律亦得離澳。無陸岸可登，惟有暫浮澳門洋面的侵略者利器——「窩拉疑」軍艦上。如此一段歷史，成爲佔港英軍的前車可鑑。

明乎此，此長達34年的海邊旅店，是不是侵略者不言的心怯呢？再者，1897年之前，這海上逆旅，難道無涉於英海盜攻浙江省定海的舟山群島？1841年之後次第的強佔港島，二次鴉片戰爭之闖虎門及《南京不平等辱國條約》後之再搶佔九龍半島的海軍軍事行動？如果它是侵略戰爭的無罪者，實難以想象。

還是回到較近的時期着眼罷。

打開一冊2007年的香港街道圖冊（萬里版，2006年12月），因着地鐵站名金鐘Admiralty，97回歸前早已沒有陸軍部金鐘兵房的海軍惡佔的軍事要地，烟消雲不散；甚麼美利樓、夏葛樓（弄了一個罕用僻字：「慙」）都拆了，美利鬼屋還硬借屍還魂到赤柱，花費巧算入房委會賬簿內，淨是剩下一個「金鐘」空名。不錯，地圖上那片空地，亦印上兩個字而已。

在中環和灣仔之間，有意留下一個當年海陸軍部，氣得羅便臣總督「七竅出煙」的侵略部隊威風得很的記名；這如許往事，都收錄細寫於葉靈鳳舊著《香港的失落》（新版2011年7月，中華）

翻看只5年前的街道圖冊，驚心地發覺：原來空地左右兩條新路，都早已有伏筆。左名「添華道」右名「添美道」，「添華」者，因對面是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總部，用意盡在不言中；「添美」者，真的莫明其土地堂，大概希望起襯托作用，麻痺我人民我民族湔雪英美夾手夾腳要了香港的恥辱的意志罷！

「添美添華」，或「添華添美」，多麼浪漫，多麼和諧，要命在一個「添」字的伏筆。

今年9.18日本佔東三省此不忘日，筆者在民政處的小冊子架前，中了重重一記如雷的伏擊——皇皇「添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馬」二個粗體2公分見方的字，打向天靈蓋，幾乎暈了過去。不可以就此暈倒，定睛一看，是鐵定的事實了——運輸署剛出版《添馬·公共運輸及交通安排》（2011年7月版）。三幅詳圖，其中兩幅確印醒目的中英文地名：添馬TAMAR！我的天，變了天，也變不了天。是侵略者的，哪怕你升起五星旗，這不依舊是侵略者的？

新填海變地，也是侵略者的——所以口口聲聲：添馬艦發展工程；頗爲敏銳的風信子，也照捧如儀。

那麼舊日那塊皇家海軍駐港總部牌子（就說是「添馬艦基地」算了），究竟原掛在哪門口？奉知各位看官，在現時已拆走圍牆的美利道愛丁堡廣場段，向海的軍營入口閘外右邊。現時地段叫「中環軍營」，軍營是文明威武之師的駐港總部。人們但問：何以不依舊喚「添馬艦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開甚麼玩笑，誰敢！

可也不是就此不敢。所以才有甚麼「添馬艦發展工程」獻世。特區政府的基礎是龐大的港英留下，精英公務員的10多萬優秀隊伍，有團隊精神，也極速識做，可以大陸便大陸化。不過，舊情難捨，回歸後，郵局還是依原計劃，爲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出生辰紀念套票。有客路嘛，郵局靠的是半商的「營運基金」嘛。不單公家機構有情，民間議會也有義，怎也不甘願兵頭花園呆立著佐治5世銅像他移；你看，人家現在是客而已。英國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也在唉聲嘆氣，說移走便遺憾囉。不公開說出來的是：大家看看，80後那批傻蛋，不是千個不捨得，萬個不捨得「皇后碼頭」嘛。管它原來不是「皇后」，是御筆簽准揮軍重洋而來侵華的域多利女王惡魔！

唉！大錯鑄成，怎生是好。

原來「清醒和有心」本地自稱建制派不是保皇黨的港共政團，曾極力提議把新政府大樓建於九龍城舊啓德香港國際機場的大片土地上。表面的理由是中環貴地可賣之進帳庫房，又可帶旺九龍城新地帶。這可算新穎的建議，舊電池的曾某才不上當；紫廬也好，禮賓府也好，都要入主過個把癮。哧，就以爲我曾某不知你們念念不忘九龍城寨的清朝大鵬府協，由山上一路開往碼頭，都保留主權，官民出入不受干擾嗎？想捧某上「抗英神枱」？沒那麼容易。

世間各路英雄，且看某下台前漂亮之極的大手筆，別以前某掛大英勳章爵位是白當的。

筆者抬頭蒼天無語。

我們這個回歸了14年，象徵中國擺脫列強近個半世紀施辱終結的新市：香港特區，真奇特，萬千眼睛密密注視下，竟可任由奸宄舞弄，橫添我一段死不瞑目新恨。

香港中國人在哪裡？

2011.9.19-20

溫家寶再提政改也改不了危機加劇

張開

溫家寶提政改的內容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1年9月14日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時，再度高調提出要在中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其要點有五：一是要改變以黨代政，執政黨要嚴格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要改變權力絕對化和過份集中的現象；二是要(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改變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過大的現象；三是保證（《人民日報》是用「維護」兩字——引者）司法獨立，檢察、司法機關獨立，不受任何社會團體（《人民日報》是用「行政機關」而且放在前面——引者）、組織和個人干涉（其實更應明言是不受執政的中共干涉——引者按）；四是要擴大基層直選，由村級直選向省級直選試點（《人民日報》是：第四，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要切實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的民主權利和民生權益，其中最主要的是選舉權，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五是要推進財產申報：1是反對職務侵佔；2是逐步推進財產申報和公示；3是公開因公出境、公務用車、公務接待經費（《人民日報》則是：第五，堅決反對腐敗。……一是反對職務侵佔，二是逐步推進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三是公開財政支出中的‘三公’經費——引者）。

在這之前，溫家寶也曾多次發表政改言論，例如，在2010年8月21日視察深圳時就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保障，經濟體制改革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同月27日，在全國依法行政會議上指出：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而滋生腐敗的最大危險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同年9月，在接受CNN訪問時說：在我能力範圍內推動政治改革，風雨不改，至死方休。今年3月，在兩會記者會上提出：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1)

這些言論可以顯示：溫家寶是中共黨內的溫和改良主義者，與當年下台前的趙紫陽總理所持有的意見相類似。當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高潮、學生和市民們在天安門靜坐示威時，溫家寶曾隨從趙紫陽到場探望，溫就站在趙的後傍。嗣後趙紫陽被保守派排擠而下台，溫也隨之失勢而消聲了頗久。

溫家寶這一主張在中共領導層中也有些正面的回應：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今年深圳特區成立30週年的紀念活動中也曾提出：“要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2)而在中國民間，尤其是學者提出中國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也已有30年了。但在溫家寶復出擔任國務院總理後，已被保守派批評他「思想太自由」。而現時，溫家寶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表上述意見後，很快便遭到黨政高層保守死硬派不指名的反對。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便跟著表明：必須堅持五項原則，第一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即是中共依然領導（操控）政、軍各部門，堅持不搞三權分立，堅持黨政不分家等。這主要是由於他們自己的政治權力如果被削弱甚至被剝奪，則領導人、幹部以至黨員們所組成的官僚層一向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便會跟着被削弱以至消失，這是他們所絕難同意，因而是要加以反對的。

從趙紫陽以至現時溫家寶所代表的中共部份領導人主張溫和的改良，是希圖藉放鬆過於嚴厲的官僚獨裁，緩和官僚層與人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和矛盾，避免統治危機的大爆發，難於收拾。而今天，這種緊張和矛盾便已到達很高的程度，使得溫家寶要如此公開發聲，雖然仍是空言遠難於兌現的。

溫家寶講話的背景

正由於政制改革一直沒有實現，中國的

各種危機便日益惡化。就在溫家寶9月14日作上述講話同一天，中國的專家便公開指出，中國正進入危機頻發期：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在國際城市論壇2011年年會上，發佈了該院最新研究成果《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研究報告》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正隱藏着種種複雜多變的不穩定風險，危機事件呈現高頻次、多領域、大規模發生的態勢。突發事件和天災人禍形成的新的「災害鏈」聚集效應和放大效應明顯。

報告指出，尤其是五大矛盾正處於從潛在風險向公共危機轉化的臨界點上：一是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基尼系數超過0.5，逼近社會容忍線；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凸現並有激化的趨勢，通貨膨脹，社會分配不公，貪污腐敗現象乃當前之首；三是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無直接利益關係的群體事件或惡性事件呈現上升趨勢；四是仇富、仇官、仇權的社會心態問題日漸突出，極易借助現代傳媒迅速放大為社會危機；五是傳統的安全危機正成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脅。

連玉明並指出，當前有九類糾紛最容易造成突發性事件，並且很可能轉化成社會風險，即徵地、拆遷、物業、改制、醫患、勞資、污染、借貸、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等九大糾紛。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折射出的是經濟社會發展中更加複雜、更為深層的根源。以上五大矛盾與九大糾紛極易誘發和放大為社會危機。(3)

實際上，上述的五大矛盾迸發出來的九大糾紛，在中國大陸上是不斷爆發的，海外傳媒也常有報導。其中在最近發生的，就有以下的部份事例：

關於強拆民居逼遷、濫收屋地耕地、迫使有關居民物主以絕食、自焚等來抗拒等情況，多年來相當普遍地頻密發生。這類慘劇迫使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9月9日下發《緊急通知》指出，近年來，一些地方在土地徵收、

房屋拆遷強制執行引發的惡性事件屢屢發生。有的被執行人以自焚、跳樓等自殺、自殘方式相對抗，有的以點燃煤氣罐、潑灑石油、投擲石塊等方式阻撓執行，有的聚眾圍攻，衝擊執行人員釀成群體性事件，有的法院幹警不當使用武器致人死傷等等。上述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極為惡劣。

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領導和幹警要依法慎重處理好每一起強制執行案件，堅決反對和抵制以「服務大局」為名、行危害大局之實的一切錯誤觀點和行為，堅決防止因強制執行違法或不當而導致矛盾激化、引發惡性事件。各級法院必須嚴格審查執行依據的合法性。

但緊接着這份《緊急通知》下發，首都北京仍爆發官方迫遷引致有關居民起來抗爭事件。在半個月之後，廣東汕尾陸豐市烏坎村又連日發生騷亂，東海鎮數千村民不滿貪官強賣村民土地私吞款項，包圍市政府、派出所，並堵路抗議，破壞多輪警車。到11月21日，4千村民再遊行到廣場靜坐，拉起「反對獨裁，還我人權，懲治腐敗」的旗幟，迫得代理市長接見代表，表示將徹底調查，但卻實行秋後算賬。12月5日村民不滿當局拘捕1名村代表，將數名鎮官包圍在村委會，最終警方放人；9日，拘捕4名帶頭打砸者，稱會繼續追捕在逃人士；10日，村民罷市堵路，要求政府放人，並呼籲在外地村民返回聲援。激烈鬥爭會持續和再爆發。

毗鄰的龍頭村，接着也有數百村民，用鋤頭和推土機摧毀村內被私人發展商圍起數百畝耕地的圍牆，並高舉橫額抗議官員收地不賠錢，私賣土地。村民直言，目前全陸豐市都瀰漫反貪官的怨氣，「人民都是被逼出來的，這裡的貪官太多了！」(4)

在廣東中山市益隆村，前中共書記私將一幅估值4億元人民幣的128畝用地以75萬元賣給開發商，但村民沒有分到一分錢。曝光後，村民沖擊金蕊工業園，打砸搶燒，1000名公安出動鎮壓。這些是官商勾結、貪官中

飽私囊的新幾宗！

上引的舉例祇是冰山一角，此外，未被海外傳媒報導的最新事件相信定會有很多。

推行資本主義的惡果日增

中國執政黨專斷而錯誤地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錢權結合，唯利是圖，又不顧人民生命健康，容許廠家在民居聚集地帶興建化工廠，產生有毒物質，污染生態環境。以遼寧省大連市為例，當局容許民企福佳大化PX化工廠在人口密集地區興建，生產有劇毒的化工原料，長久吸入可致患癌；根據環保要求，PX項目須建在距人口密集城市100公里以外。該廠如不搬走，就等於懸在廣大居民頭上的計時炸彈。因此，連日來透過互聯網和手機短訊發動示威請願，要求將福佳PX化工廠從當地遷走。結果，響應而結集的示威民眾多達7、8萬人，迫得當局最終下令該廠立即停產，並安排搬遷，民眾達到要求。



嗣後在福建古田縣爆發逾千居民堵路，抗議工廠排放廢水，造成養殖的魚大量死亡。在浙江海寧市，也連續3日有逾千村民聚集抗議，指當地一間晶科能源公司污染當地水質，導致成群魚死亡，部份村民體檢証實有6人患上白血病，31人患上癌症。

更普遍而嚴重的，是遍及全國大部份地區的空氣中含懸浮微細粒子(簡稱PM2.5)。據12月3日《蘋果日報》轉引北京《工人日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報》報導：中國環境科學院研究報告指，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四川盆地和瀋陽等城市羣，PM2.5污染日益嚴重，這些城市灰霾天數佔全年天數30%至50%。PM2.5是形成灰霾天氣的元凶，與肺癌、哮喘等疾病發生密切相關。

國際通行衡量空氣污染標準，是測量PM2.5含量，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是每立方米少於20微克。但監測顯示，內地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以下，有58%城市PM2.5含量在100微克標準以上，為WHO標準5倍。（當地居民長期吸入，8年可產生肺癌。）

醫學專家指，數億居民長期生活在PM2.5超標的威脅之下，身體遭到的危害要比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洩露輻射還嚴重。2004年，內地城市空氣污染共造成35.8萬人死亡，經濟損失高達1527.4億元人民幣。

公共醫療服務差

另一方面，公共醫療服務每況愈下，醫務人員只顧收取高昂費用，無錢或付不夠醫療費的垂危病人則拒絕醫治或不盡力醫治的事例時有所聞。央視記者調查，20種常用藥品從出廠到醫院中間利潤超過了5倍，有些更高達65倍，醫生也分得其中部分利潤。

中國現時的醫療制度被民間用「冷血」兩字來指責。北京《人民日報》於9月1日刊出了「健康時空」專欄，內有署名白劍峰的評論文章，題為《讓醫療制度不再「冷血」》便指出，最近，媒體報道了兩起令人心寒的事件：

湖北武漢一位農民工兩根手指肌腱斷裂，在武漢市第三醫院接受了手術，但因就醫時帶錢不夠，一名醫生為其縫合傷口後，隨即將綫拆除。

河北安國一名受傷的智障流浪女被送到市中醫院，醫生進行簡單包扎後，一名副

院長竟然指示：“從哪來的扔哪去！”隨後，工作人員將其拉到荒郊野外，導致流浪女死亡。

從表面看，這是一個醫德滑坡問題，從深層看，這又是一個醫療制度問題。健康權是一項基本人權。這就意味着，任何一個公民，無論貧富貴賤，當生命健康受到威脅時，都應得到基本的醫療救治。在一個國家的醫療制度設計中，越是貧困的弱勢群體，越應享有較多的免費醫療資源。然而，我國醫療制度的最大缺陷是公平性差。越是強者，佔有的醫療資源越多；越是弱者，佔有的醫療資源越少。這就使得少數弱勢群體陷入了經濟與健康的雙重貧困。很多醫院出現推諉和拒收貧困病人現象，甚至把流浪病人拋棄荒野。這些惡性事件屢屢發生，暴露了醫療救助制度的缺失，不僅損害了醫療行業的聲譽，而且影響了政府的形象。

以上簡要引述的白劍峰評論所指出的醫療制度缺失，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實行市場經濟後，過去施行的免費公共醫療制度取消了，基本上改行『用者自付』的原則，醫療機構的人員滋生了『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意識，並加以推行。

在國家應負責免費提供的公共設施方面，多年來卻實行『誰投資，誰擁有公路收費權』的政策，以致祇是12省區公路2010年收費已年逾一千億元人民幣，大大增加了社會運營成本和公眾出行的負擔，也提供了貪官從中斂財的機會。



道德滑坡

推行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又加強了社會和人民的冷漠人性、道德淪亡、自私自利，不理他人死活、唯利是圖等不良意識。尤其是最近發生的廣東佛山兩歲女孩小悅悅事件，她被兩車連續碾壓重傷，18個路人冷眼相對無一施援手，小悅悅最終不治身亡。肇事司機的狠毒，路人的冷血，引發了全社會最為廣泛的道德討論，對國人的冷漠和道德滑坡的趨勢進行譴責和反思。

相隔只有10天，山東又出現同類的悲劇：臨沂一名五歲男童，被屋樑砸到重傷垂危，他的母親抱着他，在人來車往的馬路上，下跪叩頭求救，十多分鐘竟無一人一車給以援手，其中還有城管的執法車。

這些新事例再次佐証了溫家寶今年4月所斥責的國人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是合符實際的。當時這一承認竟遭保守派及其手中輿論的圍攻。現時小悅悅事件仍引起《光明日報》發表《不要動不動說道德滑坡》的評論，否認事實，強行詭辯。

但《文匯報》一則報導最能顯出公道自在人心：由環球網聯合環球輿論調查中心發起的網絡調查，有86%受訪者認為，相比十年前，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水平「有很大倒退」，認為「有一些倒退」的則為9.5%。道德滑坡的領域，受訪網友的意見集中認為官員、醫生、商人最缺德。(5)

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產生社會分化，貧富日益懸殊。從國際上通用的反映

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看，中國貧富差距已突破社會容忍的「紅線」——0.4，遠遠超過警戒線。具體舉一個例來看，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從1985年的2.9倍擴大到2009年8.9倍，且還有擴大趨勢。(6)

這種巨大差距，自然會導致兩種群體所過的生活很大不同，反映在《新京報》12月8日的報導上：11月，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所作的「北上廣個人生活感受」民調，7日發佈調查報告。代表中國都市高端生活水平的北京、上海、廣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感受呈兩極化特徵。以城市的「人生價值實現機會」為例，高收入精英群體滿意達81%，而草根基層僅為18%。(7)這必然會引起草根階層的極大不滿。

關於農村貧民數字，據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說：根據測算，以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為標準，到2011年底，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為1.28億人，佔農村戶籍人口比例13.4%。(8)



中國農民歷來都受到壓迫、搾取、歧視、被壓到社會的最底層，即使是在中國解放後60年的今天，一項調查顯示，全國仍有9成農民感到不受尊重。由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的「中國農村調查平台」進行的首個《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28日在京發表，報告顯示，農民表示在就醫、與政府官員交往和與有錢人交往時受到尊重的比率僅為4.7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3.7%和2.5%，而最感到尊重的購物亦僅為10.7%。農民們對於與自身利益無關的國家政策缺乏興趣，僅一半的人聽說過「十二五」規劃。(9)

從上述的新近事例，已可以顯出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它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必須加以徹底改革。但一黨專政的當權死硬派，連趙紫陽和溫家寶那樣溫和而有限度的改良也極力排拒、反對，足夠證明趙、溫的改良道路確行不通，而必須採行徹底的改革，才能見效了。

2011年12月2日

後記

上文寫好送出後，接連20多天，烏坎村的鬥爭持續和擴大，而且成立臨時理事會實行自治，還影響其他地區的農民也起來鬥爭，有形成新的農民運動的趨勢，迫使廣東省委不得不介入，派出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到烏坎與村民代表及其理事會會談，接受後者提出的三點主要要求：一是3天內釋放被扣押的三名村民代表；二是盡快拿出村民代表薛錦波屍檢報告，承諾不會秋後算賬；三是承認村民的臨時理事會合法。事件就此算暫告解決。這是烏坎人民堅持英勇鬥爭爭取權益的勝利，將會影響今後中國人民的爭取民主民生權益的鬥爭。

2011年12月23日

註釋：

- (1) 溫總意見全引自2011年9月15日《明報》；《人民日報》的文句則引自9月15日該報的《答問》。
- (2) 轉引自《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周瑞金文。
- (3) 引自9月15日《文匯報》。
- (4) 詳見9月25日《明報》。
- (5) 詳見10月23日《文匯報》。
- (6) 詳見12月6日《文匯報》據中通社電。
- (7) 12月9日《文匯報》轉載。
- (8) 引自12月3日《文匯報》。
- (9) 見11月29日《文匯報》載北京報導。

既得利益集團與維穩成本

破謎

2011年12月19日，汕尾市市委書記鄭雁雄在陸豐市召開的陸豐、東海、烏坎幹部與群眾代表會議上披露，陸豐市人民政府為烏坎村部署的武警官兵的吃住花費龐大，喊叫「你以為請武警不用錢嗎！」

改革開放三十年，雖說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社會衝突日增，環境不斷惡化，賺到的錢大半都要用來緩解社會矛盾以及改善生態環境，“先發展後治理”的成本實在高昂，比如政府花掉鉅款的、自上而下的、高壓的‘維穩’方式治理社會動盪。

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主編的《社會藍皮書》，從1993年到2003年，全國每年發生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從1萬起增加到了7.4萬起，參與人數也從73萬人增加到376萬人，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2007年全國群體性事件更高達8萬多起，各地政府對維穩工作高度重視，群體性事件仍保持多發態勢。

根據2010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報告《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維穩成本極為高昂。近年來，各地維穩投入急劇上升，成本相當高昂，甚至到了不計代價、不惜血本的程度。據估計，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高達44億元，遠遠超過當年社會保障就業資金的35.2億元。這說明維穩工作已經成為地方政府一項占相當比重的常規性支出。如果以全國計，每年用在維穩上的資金更是嚇人。據統計，2010年用於內部保安的預算達人民幣5140億元。據《2009年預算執法情況及今年預算草案報告》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在2008年增加16%，2009年再增8.9%，增幅超過軍費，實際金額亦與國防開支相差無幾。

報告還指出，目前的維穩模式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地方政府把維穩當作首要任務，不僅擴大編制、增設“維穩辦”、“綜治辦”等機構，而且凡是進入敏感時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都要進行大規模的動員，各個部門齊上陣，力保轄區內平安無事。對於可能製造“麻

煩”的人員，採用“多跟一”的方式，實施24小時監控，甚至使用先進的監控工具。這樣的維穩方式，給基層幹部帶來了巨大的工作壓力。地方政府有時還會發動大量志願者，或是走上街頭，或是據守社區，積極配合相關部門進行維穩工作。

根據2012年1月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今天發佈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轉型陷阱」。該報導網路版很快被網路監管部門下令刪除。

報告指出，「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徵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徵前期是改革後期是開放，而最新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

目前流行的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認為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認為是改革處於停滯甚或倒退狀態。可是報告指出，中國現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兩者，而是「轉型陷阱」。「轉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轉型過程會造就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由此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報告認為：「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但現在看，一個漸進式改革的國家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其實，現在中國的改革困境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改革開始進入深水區，已經改不動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現在的問題是，可能是摸石頭摸上癮了，連河也不想過了。」

根據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的分析，中國當下已經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第二是以官員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第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與之相對應，中國產生了三大富豪群體：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以及地產資源富豪。

報告分析社會結構趨於定型，固化為「貧富分化」的斷裂社會。報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其一，由於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比如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報告還指出，誤判社會矛盾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近些年來，社會矛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應當說，一些本來是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並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幻象。」

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大維穩」模式形成了。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定聯繫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處於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

報告批評，用「維穩」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大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還有，報告指出社會潰敗日漸明顯。「首先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失控，暴力截訪，血腥拆遷；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於是，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報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既得利益集團迅速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佈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製造等重要行業。

報告承認，目前變革社會的現實動力已經越來越微弱。「轉型陷阱之所以能成為『陷阱』，就是因為此時的體制已經對遏制變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資源壟斷日益嚴重、利益集團坐大、社會控制愈益嚴密。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已經完全沒有變革的動力。」

「目前對改革停滯的不滿在增加，變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圈子在不斷收窄，許多群體被甩出圈子之外。這都是進行變革的現實動力，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動力變成現實的動力。」

「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支撐的，缺少民眾參與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在理想主義消退之後，利益成為主導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眾參與的改革很容易演變為大規模的『分贓』。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顯的例子。」

報告最後呼籲，用「公平正義」凝聚改革共識。「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因此，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和目標。」

報告最後寫道：「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

這報告雖然分析了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僵局，以及以高壓的維穩手段治理社會不安的困局，但還沒有點出所謂『轉型陷阱』的邏輯乃源於“先發展(資本主義)後治理(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不安與環境惡化”的陷阱。換言之，真正的改革應該是改出(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僵局與困境。

從烏坎農民抗爭談起

青岩



1927年，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成立。廣東陸豐和海豐先後召開工農代表大會，宣告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建立。這是第一個紅色政權，其基礎乃號召“耕者有其田”。當年的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寫下詩歌〈田仔（即佃戶）罵田公（即地主）〉，其中有云：“田公唔（即）不知死，田仔團結起。團結起來幹革命，革命起來分田地。你分田，我分地；有田有地真歡喜，免食番薯食白米。”

當年依靠工農的紅色政權，當下卻屢屢被工農大眾質疑其威信。

2011年，廣東省汕尾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民因為土地糾紛與警方對峙，不斷在微博向外強調「我們只是對土地問題提出抗議，我們是黨員，是團員，請政府和媒體不要再誇張我們的性質」。幾番抗爭之後，烏坎村民自發組織的「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是中共建政62年來，首個由官方承認的維權民選村組織。

烏坎村人口約13,000人。村民指出，1,500畝水稻和3,700畝旱田幾乎都被徵用殆盡。早在1991年，東海鴻峰商業經理部劃走彩旗埔180畝地，而1993年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徵地經營一次性房地產開發業務。祖籍烏坎的港商陳文清於1997年徵地500畝，建立豐田畜產有限公司養豬場，此乃引發村民不滿的起點。事由陳文清被指與村委會勾結，倒賣3200畝土地予發展商碧桂園，從中私吞碧桂園支付的補償。陳文清乃廣東省及汕尾市政協委員，也是香港廣東汕尾同

鄉總會會長，在內地擁有多間酒店及開發公司等。

其實，自從1990年代以來，烏坎村民到陸豐市、汕尾市和廣東省政府多次上訪，惟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回應。原烏坎村黨委書記薛昌在任41年；村內幾千畝土地未經村民同意即被村委會以集體名義出賣和出租，涉及款項達七億多元人民幣，而補助款每戶只有550元。

2011年9月21日和22日，烏坎村民到市政府集體抗議，並獲市政府承諾，徹查事件。村委會領導早已逃離村莊，三層辦公室人去樓空。9月29日，烏坎村民選舉「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共13人當選，楊色茂任理事長，林祖鑾任理事會顧問。

在政府兩個月後仍沒有合理答覆的情況下，村民發起了11月21日的和平抗議行動。12月3日市政府單方面向媒體宣佈事件已經解決，市民對此感到極大的憤怒，12月4日開始，全村1萬3千多村民罷工、罷課、罷市、罷漁，並進行集會和遊行抗議。12月5日，村民抗議非民選的村支書進村任職。12月9日，警方刑事拘留莊烈宏、薛錦波、張建城、洪銳潮、曾昭亮等5位村民領袖。12月11日晚，陸豐市政府突然公佈，烏坎村民選村代表、臨時理事會副會長薛錦波心源性猝死。12月12日和13日，村民發起吊念和申冤的集會，並誓言繼續鬥爭。

面對群情洶湧，政府宣佈對村幹部進行“雙規”，即是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交待，並且暫停村民指控的薛昌和陳文清官商勾結的碧桂園項目。12月21日，林祖鑾與副省委書記朱明國及汕尾市市委書記鄭雁雄在陸豐市信訪辦公室會面。沒有媒體在場拍攝記錄，也看不到錄音器材，雙方各派一名筆錄員書面記錄。鄭雁雄口頭承諾，同意為猝死村民薛錦波再進行死因鑒定；兩天內釋放仍被扣押的三名村民；承認村民組成的臨時代表理事會，並承諾不會秋後算帳。至

此，事件暫告一段落。

12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利，無論他們是否還需要以此來作基本保障，也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分析，溫總理的講話向地方釋放了中央不贊成“土地換社保”的信號。12月8日，國土部曾經發佈《關於嚴格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開展增減掛鉤試點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必須經國土部批准。未經批准，不得以各種名義擅自開展增減掛鉤和建設用地置換活動。但鄭風田認為，必須儘快出臺新的《土地管理法》，加大地方政府的征地難度，讓農民在和地方政府博弈時有法可依。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至少5000萬到6000萬農民徹底失去土地，他們有的成為城市居民，有近半沒有工作，沒有保障，引起糾紛。近20年來，農民被征地約1億畝，獲得的征地補償費與市場價的差價約為2萬億元。鄭風田批評，現在農民對於土地的增值收益只能獲取10%左右，其他的90%被上一級政府層層截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指出，現行征地模式的危害極大，如果繼續用“以地生財”的模式搞發展，損害農民的利益，將會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與衝突。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1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指出，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徵用，失地農民的數量迅速擴大。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的總量已經達到4000萬—5000萬人左右，而且仍以每年約300萬人的速度遞增，預估到2030年時將增至1.1億人左右。

現代農業經濟理論認為，每徵用一畝土地，將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依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2030年的30年期間，佔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即失地農民將增至1.1億人左右，據抽樣調查，有60%

失地農民生活困難，沒有因失地影響基本生活的只佔30%。有81%的失地農民對未來生活擔憂，其中擔憂養老佔72.8%、經濟來源佔63%、醫療佔52.6%。

在大規模征地的同時，城市土地浪費與低效利用現象嚴重。據國土資源部2008年10月發佈的《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全國城鎮規劃範圍內共有閒置107.93萬畝，空閒土地84.24萬畝，批而未供土地203.44萬畝，三類土地總量為395.61萬畝，相當於現有城鎮建設用地總量的7.8%。1997年—2005年，鄉村人口減少9,633萬人，而農村居民點用地卻增加了近11.75萬公頃（170萬畝），說明農村建設用地利用效率普遍較低，徵地規模確實大於土地的實際需求。

報告還指出，失地農民轉變為城中村居民之後，政府沒有承擔為城中村民就業轉型、社會保障以及長期的服務和管理職責，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農民上訪中有60%與土地有關，其中30%又跟征地有關。再者，徵地擴大惡化城中村的問題。城中村宅基地雖然仍屬於農村集體土地性質，但城中村居民積極追求土地收益並盡力擴大受益規模，導致嚴重的違章亂建現象，最終使城中村淪落為環境惡劣、安全隱患突出、人口管理混亂的地區。

假如失地農民越來越多，後果真的不堪設想。環顧中國歷史，任何政權想要長治久安，首要原則乃農民‘有田有地、輕徭薄賦’，安居樂（農）業。

總而言之，得（農）民心，得天下。失（農）民心，失天下。



中國無法拯救世界脫離危機

吉恩·薩努克

在北美和歐洲遭受重創之際，中國頂住了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依靠的是結合龐大公共開支，低利率和消費補貼於一體的救助計劃。中國的增長率在 2009 年達到 9%，在 2010 年為 10.4%，把亞洲和拉丁美洲拉出其危機。它也設法把失業率維持在可容忍的水平。在 2010 年，中國甚至超越日本，按照國內生產總值計算，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崛起似乎不受次貸危機的影響。

再仔細一看，真正的問題擺在前面。中國工人不再能接受過度的剝削。2010 年夏天，罷工浪潮蔓延。工人爭取增加工資，爭取改善工作條件，爭取組織和談判的權利。自 2010 年中期以來，通貨膨脹，特別是食品價格的上漲，使工人的生活百上加斤，政府擔心不滿的浪潮會發生。最重要的是，政府正竭盡全力，防止阿拉伯國家的任何民主革命蔓延到這裏。雖然中國的整體情況完全不同，但這些民主革命向中國勞動者表明，即使是最惡劣和最強大的獨裁統治，也有可能被推翻。

中國對第一階段經濟衰退的抵抗力

到目前為止，危機對中國和亞洲的影響，已經被限制住（薩努克 Sanuk，2008 年）。不像歐洲銀行，亞洲銀行沒有過度地捲入次級抵押貸款和有毒產品中。除韓國外，亞洲國家並不依賴短期資本和銀行貸款為其經濟提供資金。她們不像東歐國家或希臘那樣陷入債務陷阱。她們大多數，特別是中國，已經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能夠對付 2008 年底發生的資本外逃。因為北美和歐洲的需求低迷，亞洲國家主要受到的是出口下降的打擊。一般而言，衰退的影響，對最開放的亞洲國家較大，因為她們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製造業上，而美國是其重要的買家。舉例來說，製成品出口佔馬來西亞的 70% 左右，在泰國和柬埔寨則超過 40%，中國、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約為 30%，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則少於 10%。這些特點，解釋了為什麼亞洲的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三個最大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在 2008 年和 2009 年間，都沒有經歷過單季的衰退。這三個國家有韌性，最重要的是中國，它是亞洲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引領了 2009 年第二季度的快速

反彈，導致了比世界其它地方強得多的“V”形經濟復蘇。

首先，為了應對出口下降的衝擊，亞洲國家推動了前所未有的救助計劃，該計劃不同於 1997-1999 “亞洲金融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導的使危機進一步惡化的結構調整計劃。中國救助計劃的規模令人注意：5850 億美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13.3%，為期兩年。平均而言，亞洲國家公布的救助計劃總額為國內生產總值的 7.5%，而 G7 國家的救助總額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2.8%。此外，亞洲的救助計劃，更注重公共開支而非減稅。平均而言，亞洲國家救助計劃的 80% 專用於公共開支的增加，而 G20 國集團國家的這個數字平均只有 60%。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尼西亞，減稅是主要的。這些公共開支，伴隨著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亞洲各國央行的平均利率下降了 2.25 點，是上次危機期間的 5 倍多。由於銀行系統繼續運作，這對經濟增長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越南和中國等國家，擴張性貨幣政策發揮了主導作用。在中國，公共開支從 2007 年的 23% 略為增加到 2008 年的 26%，但在 2009 年回落到 21%，在 2010 年救市計劃正式結束時，甚至回落到 17%。從總體上看，公共開支並沒有起到克服衝擊的關鍵作用。事實上，2009 年信貸擴張達到 31%，在 2010 年下降至 -4%，因為中國政府決定使經濟降溫，以防止銀根的放鬆誘使一個新的投機泡沫。

第二，家庭消費保持穩定，因為危機期間就業率沒有大幅下降。在亞洲國家，危機時期的失業率通常不會猛然增加的，因為除了少數幾個國家，那裏一般是沒有失業救濟金的。產業工人失去了工作，只要可能，就會試圖去服務業找工作，或是做自雇工作，或者返回到農村。中國的情況尤其如此，2008 年的冬天，成千上萬的出外打工者回到內地，呆到 2009 年 2 月的新年結束後。2009 年春天經濟復蘇，他們很多人返回城市找到工作，得到的工薪更多。第三，同許多嚴峻的預測相反，從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2 月，中國的出口儘管下降，但並沒有大幅下滑，並且由於世界貿易的復蘇，很快地調整過來。鑒於中國出口品的進口組件的含量很高（約 50%），所以進口也會下降相同的比例，因此使貿易經常賬戶幾乎總是正的，只是數量較小而已。這既表明了中國抵禦外部衝擊的韌力，同時也暴露了弱點。

不受世界其他地區影響的亞洲神話

中國快速的貿易成功，得益於其組件裝配中心的作用，這些組件是亞洲其它地方製造的，大部分在日本和南韓製造，少數在東南亞製造。在中國組裝的最終產品，大部分運往世界各地，特別是歐洲和北美。爲了較少受到美國和歐洲危機的影響，東亞和東南亞需要吸收其最終產品的主要和增長的部分。雖然危機發生以來，東亞內部的貿易有進展，但尚未達到可以緩和全球貿易萎縮的地步。儘管中國在 2010 年越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在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絕對值上趕上美國，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仍然遠不能取代美國，美國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人口總量，根據目前的狀況，人均收入將在 25 至 50 年的時間內趕上美國。在 2005 年，大部分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位於沿海，占中國人口的 42%，如果現在只考慮該地區，那麼在 10 至 20 年的時間裏，就可能趕上美國。由亞洲開發銀行最樂觀估計，按照目前的速度，22 個歸類爲“發展中的亞洲”的亞洲國家，到 2030 年，其消費將超過經合組織國家的消費。所有這些預測，都依據樂觀情況，並且遠離目前的國際危機。爲了不受世界其它地方的影響（至少相對而言，因爲在現今全球化的經濟中，沒有可能出現一個完全自治的地區），亞洲，首先是中國，必須重新平衡其經濟，離開出口帶動型的增長，轉而注重國內市場。這只能在三個條件得到滿足時實現。首先，中國必須部分重估匯率，降低進口價格，從而降低爲國內市場產生的商品的成本，減少出口利潤。其次，最重要的是，中國必須顯著提高城鄉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使國內消費水平可以從目前極低的水平（相當於 GDP 的 35%）上恢復過來。這是極爲敏感的决定，因爲國有和私營企業超額榨取工人而賺取的巨大利潤，中國的資本家和官僚集團習慣於活得像肥貓。第三，中國必須提高其目前的低水平利率，以抑制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極高投資，調整經濟，使其有利於國內服務業，如教育、衛生、住房、文化和休閒，滿足大多數中國人的需要。有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够產生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這是中國需要的，而且可以減少能源消耗，引起的污染低於工業性污染。中國已經朝這個方向取得了進展，但離目標尚遠。

中國能否抵禦新的衰退？

2011 年，國際金融危機進入第二階段。歐洲的危機非常嚴重，而美國的情況也不是太好。第二次

十月評論 2011 年第 2/3 期

經濟衰退正來臨，世界貿易將會有新的滑坡。中國和亞洲的出口將再次受到打擊，問題是：中國和亞洲是否能够再次運用大規模的救助計劃抵禦新的貿易萎縮？對此有悲觀的理由。中國和亞洲國家不能每隔兩年就展開大規模的公共開支或大規模地擴大信貸。上次救助計劃已經引生了尚未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情況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激增，通貨膨脹，房地產投機和證券交易的泡沫也大幅增加。同美國和歐洲一樣，中國銀行將必須用公帑來挽救。同美國和歐洲一樣，總是勞動者爲政府買單。在中國，拯救負債累累的銀行和地方當局將要花費很多錢，如果勞動者要這樣或那樣地買單，那麼面向內需的再平衡目標將會長期延緩，中國能把世界拖出危機的神話也會遲遲不見。

參見：

安德森（Anderson），喬納森（Jonathan），2009 年，“中國的儲蓄神話”，遠東經濟評論。

阿齊茲（Aziz），賈漢吉爾（Jahangir）和崔麗（Cui Li），2007，“解釋中國的低消費：被忽視的家庭收入的作用”，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文件：3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華盛頓。

巴爾達契（Baldacci），埃馬努埃萊（Emanuele），卡勒嘎熱·喬瓦尼（Callegari Giovanni），寇地·大衛（Coady David），丁鼎（Ding Ding），庫馬爾·曼莫漢（Kumar Manmohan），托瑪斯羅·皮特羅（Tommasino Pietro），胡加楚（Woo Jaejoon），2010 年，“中國公共支出中的社會方案和居民消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文件，財政事務部：2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華盛頓。

布蘭查德（Blanchard），奧利佛（Olivier）和佳瓦茲·弗朗切斯科（Giavazzi Francesco），2005 年，“重新平衡中國的增長：三種手段。”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 37，麻省理工學院：華盛頓。

讓·薩努克是經濟學家，亞洲問題專家。他最近組織了 IIR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經濟學家研討會。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 442 期，2011 年 11 月號。

致溫家寶總理的信(轉載)

中國國務院溫家寶總理清鑒：

要求國家停止核能大躍進

福島核災難開始之際，閣下即下令全國嚴審新上核電項目，及對在運行和在建的核廠進行安全評估、消除安全隱患，至今工作經已完成。惟「大安檢」對有關核電廠作了那一些評估和建議，有沒有因隱患難除而要求終止興建或營運，以及有關之審查是否獨立地進行，或受到無利益關係者的獨立評核，一般人民至今所知甚少。

位處珠三角與鄰近香港之大亞灣-嶺澳核反應堆組群，附近人口密度之高屬世界核電廠之冠，但該廠之座落位置與規模之龐大，對人民及生態所造成的威脅是否屬「大安檢」之範圍，或「大安檢」對它們作出了怎樣的危機重估，公衆皆未有所聞。唯一所知的，就是由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這個投資和營運大亞灣核電廠的機構，負責主持該廠的「大安檢」，而它就提出了只需加強防水浸設計便可的建議。這樣的充滿利益衝突的「大安檢」安排，實令公衆難以信服。

在看不見有實質而基本的檢討核安全情況下，該處之嶺澳第四台反應堆在近期依期投產；而八月中旬開始，大亞灣-嶺澳核廠之內及鄰近地區，更展開了一項「國際中微子研究實驗」。後者明顯地已令有關核電廠的用途超出了發電範疇，對附近居民要承受的風險(包括恐怖襲擊及實驗帶來的不可知因素)大大增加，而民衆對有關內情亦一無所知。

至於興建核廠于位處地震帶的省份及地方——山東、東北三省、浙江、福建、廣東的台山和陽江，「大安檢」後是否有了新的評估，民衆也不得而知。以廣東的台山和陽江為例，「大安檢」期間繼續施工，也預計2013年如期啓用，到底有否吸收了福島災難的教訓，實成疑問。

回到基本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國全國各地區，秉其傳統智慧及配合永續發展的新思維，在民間締造出讓各地自供自用自足的再生能源，而不搞核能這種剝削性能源(剝削包括由郊區的人民和生態承擔風險，供應城市浪費性的使用；以後代與大地物種之基因變異悲劇為代價，換取企業集團之私利)，是完全可能的。在廣大的國土上，按照當地天然條件採集能源——如熱帶、亞熱帶地區充分利用太陽能，鄉郊農戶家家都可使用沼氣池或風能，城市樓房設計以節能為主調，這些才是正途。

至於要達到緩和全球暖化所需的減碳目標，核能更是絕對無效(見附注)。搞核能，只是要攫取國家能源巨額投資以自肥之企業集團的發財捷徑，却讓千秋萬代之中國人民與生態承受災難，可謂最不道德的工業之一。請 溫總理秉持公正與負責任的執政精神，為中國締造出一個無核的未來。福島及無數已發生的核災難事故已敲響警鐘，政府不應置若罔聞，更不能讓災難事故在社會中淡化，人民要有充分的資訊，才可作出明智的、向未來負責的能源選擇。

香港特別行政區三十九個民間團體聯席
——〈反核之眾〉謹上
(聯絡電郵：nonukessinohk@gmail.com)

2011年9月19日

附注

核能發電不減碳的原因如下：

- 核電在日常運作中會產生及排放帶輻射性的碳-14。
- 核能發電的前期(包括開鈾礦、提煉鈾、濃縮鈾、製造鈾燃料、建核電廠)和後期(包括處理核廢料和種種核設施除役)的每個階段會使用大量火力能源，部分過程甚至產生碳氫化合物這些比二氧化碳更具溫室效應的氣體。
- 處理用完却依然充滿輻射性的燃料棒(稱「乏燃料棒」)及其他退役下來的核設施，整體來說是全球至今為止始終無法應付的問題，其暫時的儲存及運到其他地方去儲存等等程序，到底最終要耗費多少能源，因此製造出多少碳排放，根本就是一個最隱藏和被隱瞞的數字。所以，宣揚核能清潔的人提供的「核碳排放」數字，完全不可靠。
- 核電廠在定量發電的情況下，令廠方得到最大的利潤，所以按需求調整發電量便不會被考慮，這種情況比煤電更甚。核電廠浪費的熱能有時高達百分之四十，甚至三分之二(如大亞灣)。既然生產核電是一個製造碳排放的過程，如此浪費熱能就是製造大量不必要的碳排放。
- 核電廠日夜排出冷却機組的熱能到廠旁的海洋或湖泊，令水溫上升，碳溶解程度降低，因而釋放二氧化碳到空氣中，令全球暖化。

致香港天文台台長的信(轉載)

反核之眾 (香港39個民間團體) nonukessinohk@gmail.com

2011年9月17日

全球Goodbye to Nuclear Power Plants運動(香港行動) ——抗議香港天文台散播偽科學欺瞞公眾擁護核電

「反核之眾」向香港天文台提出以下抗議：

(1)天文台在福島核災開始至今，不斷刻意舉辦講座及派員以其所謂工餘時間，四出以統一之口徑，並其虛假之數據（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等國際賣核組織提供），誤導公眾「核電為減碳所必須」。對此核電減碳神話，我們的科學回應如下：

-核電在日常運作中會產生及排放帶輻射性的碳-14。

-核能發電的前期（包括開採礦、提煉鈾、濃縮鈾、製造鈾燃料、建核電廠）和後期（包括處理核廢料和種種核設施除役）的每個階段均使用大量火力能源，部分過程甚至產生碳氫化合物這些比二氧化碳更具溫室效應的氣體。

-處理用畢卻依然充滿輻射性的燃料棒（稱「乏燃料棒」）及其他退役下來的核設施，整體來說是全球至今為止始終無法應付的問題，其暫時的儲存及運到其他地方去儲存等等程序，到底最終要耗費多少能源，因此製造出多少碳排放，根本就是一個最隱藏和被隱瞞的數字。所以，宣揚核能清潔的人提供的「核碳排放」數字，完全不可靠。

-核電廠在定量發電的情況下，令廠方得到最大的利潤，所以按需求調整發電量便不會被考慮，這種情況比煤電更甚。核電廠浪費的熱能有時高達百分之四十，甚至三分之二（如大亞灣）。既然生產核電是一個製造碳排放的過程，如此浪費熱能就是製造大量不必要的碳排放。核電廠日夜排出冷卻機組的熱能到廠旁的海洋或湖泊，令水溫上升，碳溶解程度降低，因而釋放二氧化碳到空氣中，令全球暖化。

(2)天文台主辦「科學為民」學生專題研習比賽，以完全錯誤引導式的解題方法，讓全港學生達到「香港必須使用核電」之結論，此等欺瞞學童之反教育惡劣行徑，實在居心叵測。其後更加散佈謊言，指「反核之眾」對其「錯誤引導性解題」之指責全無科學根據，卻無法提出半點實質的回應。（我們原來的分析已刊於此網頁：<http://www.greenpartypost.net/nonukes/ProNuclearScienceProject.html>）

(3)香港天文台隸屬世界氣象組織，該組織自1959年始，即與IAEA締結條約，讓其研究及研究發表，皆須經IAEA之同意方可進行。所以，大半個世紀以來，由世界氣象組織及其屬下之地方天文台，對於核輻射之所謂科學分析與公佈的言論，皆在該國際賣核組織所操控之框架下作出，其「科學性」、「客觀性」大家可想而知。基於此，我們要求香港天文台立即向公眾承認及清楚解釋，過往於輻射之量度與安全評估方面，從來都只是依從賣核集團之準則去行事；假若香港天文台的人員尚且懷有半點科學家應有的反省能力和求知態度的話，他們應該從今站出來重新作出獨立的科學研究，向知識真理和人民負責，不再向權勢屈從。

總括而言，香港天文台的所謂「科學家」，在核輻射問題上，可謂不務正業——一方面聽命於國際賣核組織，另一方面又兼負本地政府的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政治任務」在身。他們在自稱「機構使命」這個大前題下，包括了「就……輻射……等領域提供優質服務，提高公眾的防災意識」的機構工作，但所做的其實剛剛相反。既然如此，謹請貴台人員在日後發表有關輻射的數據與防災言論時，先表明自己作為國際與本地政經利益喉舌的身份，切勿再偽裝科學家，也不要詆毀疑核反核的人民都是「盲搶鹽」的無知之徒。

致香港科學館黃慶瀾館長的信(轉載)

反核之眾 (39個香港民間團體)

2011年8月21日

請收回引導學童擁護核電的「愛因斯坦趣味習作」，及停止在「常設展覽」中宣傳核電為唯一能源出路，不提半句核輻射對全球生命的威脅

敬啟者：

我們謹在此提醒 閣下：(一) 科學館由公帑支持，向廣大市民---包括兒童---進行公眾教育，絕不能向任何財團、政治勢力的利益傾斜；(二) 科學知識的選材介紹，並無「絕對中立」可言，所以科學館在這方面要有對知識和公眾的責任感---只談一種技術可行又不提出其已知及可能之不足，甚至對它已引生的嚴重惡果避而不談，便是借介紹科學知識之名，推銷該種技術為實。基於以上兩點，我們對科學館 (1) 愛因斯坦展中的「趣味習作」，(2) 「常設展覽」中有關核能的展覽深表不滿。

首先，科學館在給中小學生的「愛因斯坦展趣味習作」中，提到 1939 年愛因斯坦上書美國總統建議研發核武，之後就說他 1955 年死了，這就結束了他光輝的一生，絕口不提其間愛因斯坦深悔上書，並積極投入反對美國政府繼續發展核武；又有「思考題」，引導學生回答縱使核武核彈危險，「核能和平使用」去建核電廠還是有益人類的，利弊計來算去，結果就是讓核電暗渡陳倉，成為正面貢獻。

而「常設展覽」有關核能的部份，展出有鈾礦一塊、有影片介紹、有反應堆模型，更有一段動畫指出煤電污染環境，核能發電才是出路。[這個講法大錯特錯，故意誤導。事實是：核電不減碳：核電產生帶輻射的碳-14，發電的前期、後期更使用大量火力能源，產生碳氫化合物。核電無助全球暖化：相反地，核電日夜排出冷卻機組的熱能到廠旁的海洋或湖泊，令水溫上升，釋放出二氧化碳，令全球暖化。]展品完全不提核輻射之驚天危害，殃及全球眾生與人類，也絲毫不提採鈾、提煉、濃縮等製造核電過程及核廢料之無法處理，害死多少礦工及鄰近的居民---特別是原住民；至於反應堆平常運作及發生意外時漏出多少致命輻射，令生物生癌生病，基因變異，也絕口不提。尤有甚者，該段動畫竟指出「香港不適合用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這個講法也是大錯特錯，故意誤導。事實是：在節能的配合下，投放資源研發及引進小型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科技，甚至在村郊地方用沼氣池發電，在香港完全可能，只不過這不是本地電力財團所願見的情況吧。所以科學館說「香港不適合用太陽能、風能等再生能源」，就是站在電力財團的立場說話，令人震驚。]

由此可見科學館之展覽選材及公眾「教育」，以片面推銷核能為主旨，令公眾對這種科技之危害性與不道德性無所察覺，故實在大有利用展品教材，為「中電」此科學館所鳴謝、卻又是投資廣東核電的財團塗脂抹粉之嫌。

我們要求科學館立即 (一) 收回上述所言的引導學童擁護核電的「趣味習作」，停止在「常設展覽」中宣傳核電而不提半句核輻射對全球生命的威脅；(二) 向公眾道歉，和承諾不再舉辦向財團利益傾斜的展覽及教育項目，回歸應有的向知識與公眾負責的正途。

致中電主席的信(轉載)

中電控股董事會主席 米高嘉道理爵士

副本致：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陳紹雄先生

反核之眾（香港39個民間團體） nonukessinohk@gmail.com

2011年9月18日

全球Goodbye to Nuclear Power Plants運動（香港行動）

——要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立即廢核

並向公眾公開大核二十年的禍害紀錄

「反核之眾」（包括其前身「一群不願做愚民的反核人士」）之前共向 台端致函三次，提出各項關乎人命安危、公義、向地區以至全球生命負責等重要理由，要求中電停止在大亞灣及陽江的核電投資和營運，卻至今完全未見中電自投資核電之歧途歪路上回頭。「反核之眾」對此深感遺憾和憤怒，現在重申一遍之前提出的各項要求，以及指出中電如再採取麻木不仁的態度，恃財勢與公眾為敵，則日後要承擔更嚴峻的後果。

我們要求中電：

- (1)立即撤出廣東陽江核電廠之投資。陽江位處地震帶，這項投資與蓄意殺人無異。
- (2)立即撤出大亞灣核電廠之投資。大核經已運作20年有多，趨向老化；鄰近一公里之嶺澳，更有四台核反應堆經已全面投產，以此六台反應堆共同構成之龐大規模核廠，座落在珠三角及與香港為毗鄰，已被公認為核電廠建於人口稠密區之世界之冠。此時理應停用及退役，以免造成瀾天大禍。
- (3)中電作為營運大核的集團，應立即公開大核運作20年來對鄰近居民健康影響之紀錄，讓獨立的專家進行審查驗證。對於造成的傷害，要作出合理的賠償。
- (4)中電作為營運大核的集團，應立即公開大核運作20年來員工（特別是負責清潔、維修廠房及更換喉管等工作的基層員工）所接受的輻射量及健康紀錄，讓獨立的專家進行審查驗證。對於造成的傷害，要作出合理的賠償。
- (5)中電作為營運大核的集團，應立即公開大核運作20年來對附近陸地、地下水及海洋生態系統的輻射污染紀錄，讓獨立的專家進行審查驗證。對於造成的傷害及由之而導致的漁業、農業和其他經濟損失，要作出合理的賠償。
- (6)大亞灣連同嶺澳等六台反應堆的廠內及鄰近地方，現時已展開一項「中微子研究」，證明有關核廠已非純粹生產核電的設施，而已出現各種不為人知的額外操作，與核武也有可能的連繫。中電作為投資及營建大核的集團，應即向公眾交代此事，以及停止讓大核被「借用」，免生恐怖襲擊和各種因核廠的異常使用而倍增的風險。

最後讓我們一再提醒 台端及中電高層，中電在不同層面向社會輸送偽核電知識及洗刷形象的行為，是逃不過人民雪亮的眼睛的。諸如影響香港科學館核電展覽的真確性、支持各大學及社團舉辦擁核的偽科學講座及研討會、舉辦所謂公眾教育及參觀活動以宣傳核能之必須及安全、利用嘉道理慈善事業之慈祥面貌去掩飾中電罔顧生命、滅種滅族的核電投資之醜惡，都終會被悉破。與其遺臭萬年，不若回頭是岸——這是我們第四次向 台端與中電提出之勸告，請勿視作等閒。

德國近年的反核運動

塔多·帕托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反核電廠的運動是德國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之一。經歷過去 20 年的放緩之後，它又出現了，就像鳳凰浴火再生一樣。雖然在其他歐洲國家，失業和社會福利削減，引發了抗議和抵抗，但在德國，核電或者說環境問題是當前運動的中心。是什麼原因呢？

德國反核運動簡史

五六十年代，反對核致命（Nuclear Death）運動的主要焦點在核能的軍事用途上。這個運動主要推動者是德國共產黨和它的盟友，左翼工會會員和社會民主黨。

反對民用核能的運動則出現在七十年代。在德國南部贏得了第一次大鬥爭：有 27 個葡萄種植者的一個組織抗議在其靠近法國邊境的區域建設核電廠。邊境兩側的當地居民，環保主義者，當地葡萄種植業者和激進左派結成聯盟，加入了抵抗行動，施工現場於 1974 年被佔領，經過多年的奮鬥，今天，那個地方成了一個自然保護區。

這第一次的成功是一個全國性運動的開始，它舉行了巨大的示威活動，圍繞眾多的建築地盤（例如，反對在克雷-馬威勒（Crey-Malville）建快中子增殖反應堆的跨境鬥爭行動，1977 年在克雷-馬威勒（Crey-Malville），教師維塔爾·米恰龍被員警殺害）展開堅決的抗爭，特別是圍繞戈萊本（Gorleben）村進行了堅決抗爭，因為有計劃把核廢料傾倒在那裡的一個鹽丘裡。幾乎所有的激進左派團體都加入了運動，而且在七十年代末，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綠黨的建立是這個運動的結果，它聯合了資產階級（有時甚至是右翼）環保主義者，激進左派和左翼工會會員。

雖然大型工會支持利用核能，但在八十年代，風向改變了。切爾諾貝爾災難後，首先是公共服務工會，然後是金屬工人工會改變了立場，自 1986 年以來，在所有的選票中，都有一個穩定多數投票贊成放棄核技術。自那時以來，沒有規劃或建設新的工廠，並且因為抗爭力道強大，在瓦克多夫/巴伐利亞村安裝核燃料後處理廠的計畫被放棄了。1986 年社會民主黨在其大會中甚至決定放棄核電。

從 1995 年開始，當第一批核廢料運向戈萊本時，抗爭行動出現了一個緩慢而新的連續增長，有示威和（主要是和平的）封鎖鐵路的行動。

“退出計劃”

當政 16 年的保守黨政府在 1998 年結束，社會民主黨和綠黨聯盟上台執政。在此期間，綠黨本身融入統治制度有多深，立刻變得顯而易見。首先，綠黨同意對塞爾維亞的戰爭，然後妥協並違犯退出核能的承諾。一個延長現有工廠壽命的時間框架決定了，工廠的關閉一步一步地實行。但這種尊重法律的做法，讓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現任政府可以很容易地修改它。

因此，在 2010 年，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新政府決定了再次延長這些工廠的壽命。但是，當有關的計劃公佈時，結果是反核運動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新抗爭起義：2010 年 4 月，在德國北部的兩個工廠之間，有 150 000 人參加，組成了一個長度為 120 公里的人鏈。2010 年秋季，對核廢物運輸的阻斷封鎖運動，其規模是十餘年來最大，人數最多的。而在 2011 年 3 月福島縣的核災難後，僅僅一天，在德國南部的兩個反應堆之間，就有 60 000 人組成人鏈。

運動規模變得越來越大。全國各地都有地方和區域的示威遊行，有行動，有 160 000 人的徹夜監視，結果是驚人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表演了一個經典的後空翻。

福島後果

當福島核電站的災難變得明顯時，在保守黨統治 60 年的巴登-符騰堡州，舉行了區域選舉。民調顯示，反對派極有可能獲勝。所以，選舉前一周，默克爾總理的思想發生了一個神奇的變化。在周日晚上，她仍表示，德國的核電廠是完全安全的 --- 但第二天早晨，她宣佈，在 3 個月內，至少立即關閉最老的七家核電廠，並設立了“道德”委員會，給出遵守退出方案的建議。

但它無濟於事：保守黨失去了選舉，綠黨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該地區政府的最強勢力，現在與其小夥伴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

在此期間，有關退出的戰略存在一個建議，但其內容再次令人疑慮。最遲在 2022 年，將關閉所有的核電站，但運動要求一次關閉所有核電站，這一點甚至不在考慮之中。對於仍在運行的研究用反應堆，則完全沒有提及。目前的政府正試圖同反對派就退出計劃一事達成共識。另一方面，綠黨和社會民主黨處在一個危險的境地。本屆政府現在提出的一切事，本應該十年前就由前社會民主黨/綠黨政府完成的，但沒有做到。而現在，他們要求一個比他們當政時所計劃的時間更快的退出....

新一代

如果察看一下目前的示威活動，很明顯的是，新一代的反核活動分子正出現在運動中。一方面，參與者中，有一些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老”活動分子 --- 他們仍然積極活動或恢復活動，但還有很

多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越來越主動。當前的運動已經是這幾十年來最大的一次。而且它不只是專門反對核能。環境污染的問題，包括反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也是重點主題之一，還有個人和集體的運輸問題也在內。上述的巴登 - 符騰堡州的選舉，也受到當地鬥爭的嚴重影響，例如，環保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的廣泛聯盟發起的，反對在該地區首府斯圖加特建設一個新火車站的抗爭，還有核問題抗爭，都有重大影響。

長處和短處

該運動的實際力量在於團結，事實上，它植根於所有階層的人們。這就是目前的政府做這種突然轉變的原因。福島問題之前，核電已經是德國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它幾乎沒有影響到選舉。這一點已經改變了：在德國，目前沒有一個擁核的政黨可以贏得選舉。

但另一方面，運動是相當非正式的。新青年積極分子階層正參加行動並組織頗有新意的活動 --- 但一般的政治覺悟水準和組織建立永久性機構及委員會等等的意願，還是相當低的。這同七十年代的運動相比，是一個很大的不同，當時激進左派在政治話語上是主導的力量，能夠圍繞運動組織起來。

但運動沒有結束：反對政府違規妥協的運動在繼續。現在要靠激進左派的力量，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一個可靠的方案，替代統治系統及其災難性的環境社會政策。

■ 塔多·帕托是德國社會主義革命聯盟 (RSB, *Revolutionär Sozialistischer Bund* --- 第四國際在德國的組織之一) 的領導成員，第四國際政治局成員。他是一家醫院的醫生。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 437 期, 2011 年 6 月號。

日本危機中的第一個轉捩點

皮埃爾·魯塞

對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的嚴重性，對掩蓋核能巨頭遊說活動的謊言，對核能選擇給人民帶來的風險的廣度，對否定民主的問題，每天都有新的揭示。醜聞的衝擊波遍及整個日本列島。可以說，日本的危機已經到了一個轉捩點。

起初，只有弱小的少數民族動員起來反對政府的社會能源政策。在不斷呼籲全國團結的情況下，人民開始遭受地震，海嘯和核危機三重災難的殘酷和暴力的摧殘。被巫師學徒愚弄的感覺四散傳播，點燃了大眾的憤怒之火。面對不斷上升的反對聲音，雇主們不是道歉，而是表明了一個明確的不想放棄的意願。對峙陣線正在形成；未來幾個月的政治問題正在顯現。

福島：當代的謊言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Tepco）和日本當局不得不承認，從危機一開始，電站六個反應堆中有三個，其核心已經融化；同先前的誓詞相反，地震損壞了建築物，破壞不僅僅是海嘯造成的；把裂變材料浸入水裡以冷卻它，這造成了一個新的大問題：大量放射性水散佈在電站，使得工人無法在那裡工作；他們完全沒有為這樣的事故做好準備。企業和政府也沒有能夠協調行動，有效地對付災難。

注意，缺乏準備的不僅是日本。國際核能當局從未設想過福島的場面：一個地震和一個海嘯，使四個反應堆同時發生事故。一個神話徹底破產了，這個神話聲言“一切都計畫好了”，“一切都受到控制”。一個真相露面了：科學機構（物理學家），專家和媒體串通一氣編造罪惡的謊言。事實上，特別是日本，她是一個頻繁遭受劇烈地震的國家，人民對核工業的支持依賴於對“專業知識”的信心，而這種信心正在破碎。

核電：昨日的謊言

一個時代的標誌---雖然來得遲緩而且膽怯---就是日本媒體開始報導事發中的核危機的較重要資訊[1]。該群島的核謊言歷史面紗逐步被揭開。潘朵拉的盒子在打開。

首先，強加於人民的核工業規劃，依據的是一個不誠實的承諾，即：獲得無限的能量，它便宜，無風險，是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礎。然而，為了讓它在日本獲得接受，要克服兩個障礙：廣島長崎的創傷和日本群島地震不穩定性引起的關注。

20世紀50年代，為了促進核工業，並隱瞞其在廣島和長崎的大型戰爭罪的責任，美國把“原子能用於和平”說法同“原子能用於戰爭”說法對立起來 --- 從而模糊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繫，實際上民用核能生產會產生製造軍用炸彈需要的東西。他們作為佔領國，獲得了日本政府的積極合作，不無成功地傳遞出了資訊：日本反核武運動的傀儡成了民用核能的熱切捍衛者。

另一個天大的謊言就是斷言一切都在預計中，一切都在控制下，而核危險的發生是數百年，數千年，甚至更長時間才可能的事。略微看看過去的歷史就足以知道，即將來臨的歷史會帶來自然災害，工業事故，政府危機，經濟崩潰，戰爭，革命和反革命。然而，很少有記者和科學家們嘲笑這種把裂變（不能像電力一樣被切斷）和放射性排放（不能解除掉）置於永恆控制下的說法。由於物理學家和專家機構對核能企業巨頭的支援，再加上輿論製造者這個真正罪犯的作用，不同的聲音被銷聲匿跡了。當前的學術前沿出現了裂縫，而人們則不相信專家。日本的核謊言歷史除了其特殊性以外，同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發生的情況非常相似。

既成觀念的終結

3月11日災難後果有一個更令人吃驚的方面，就是日本當局不只是在核危機方面缺

乏準備，就像聯合國編寫的一份報告所描述的那樣，這份報告已由日本時報[2]發表。

報告說，地震，反復的餘震，海嘯和緊急核事故，這些結合在一起，造成“多方面”基礎設施的同時崩潰 --- 這種崩潰一般發生在欠發達國家：無法迅速向受影響的人提供水，食物和住房，或未能迅速重新建立通信和服務的運作。儘管日本的地震防範水準肯定挽救了大量生命，但當局不希望在防範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件上做投資。

一個數字說明問題的廣度：5月中期，“讀賣新聞”[3]報導，平均只有30%的援助，通過官方管道達到受害者手中，混亂是如此巨大。

嚴陣以待的雇主

日本的危機，毫無例外地表明：在人道主義災難期間，階級主導力變得更強，超過它在團結的名義下變得含糊不清。老闆表明，他們不會動搖對核能的選擇，他們認為，東京電力公司和核工業既無罪過也無責任，應通過稅收或增加電價來獲取資金給受害者做賠償 --- 說到底，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讓利潤私有化而損失社會化。

自1980年以來，日本經濟第一次進入了衰退，4月份的貿易出現了赤字。雇主認為，危機證明，應該削減社會救助，增加人民稅收的負擔，減少對裁員的保護。老闆帶頭攻擊核問題和社會權利。抵抗應連接這兩個問題。

抵抗的興起

在核領域，公眾已喪失對“專家”的信心，而人們對政府的犬儒主義尤其感到震驚，該政府提高了法定的輻射率，這針對的並不僅僅是福島電站的工作人員，還有該地區學校的學生。“政府能保證我們孩子的健康嗎？”家長們這樣問[4]。

就像法國的情況，爲了讓反對的聲音沉默，日本的核工業使用財政訛詐當武器，操縱發電站所在地方的稅收和補貼。然而，政府不得不同意暫時關閉濱岡的反應堆，因爲它的設置完全沒有對付海嘯的準備。還有其他醜聞暴露出來，例如在敦賀灣的文殊增殖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反應堆。它坐落在一個非常活躍的地震斷層帶，在一次嚴重的鈉洩漏事故後，已於1995年關閉。2010年5月重新開啓，三個月後，它遭到了一個新的事故，部分堆蓋跌落在反應堆坑裡。以後，並沒有拿出解決方案，工地的一位經理自殺身亡，留下一份遺書，其內容被保密。

今天，反核武器運動已經啓動。在一些大型的示威遊行（在東京兩處有17,500人）發生後，有一個號召呼籲，6月11日把地方行動傳向全國全球的行動，把這天作爲全球動員日[5]。

從地方轉向全國的抵抗，這個過程仍然要在社會層面上進行。目前正在採取措施，保護遭受放射性風險的核工業工人。村民表達不同意見。難民譴責他們的條件。激進工會成員爭取社會權利。但融合這些鬥爭的呼籲，目前還沒有出現。

然而，激進的活動家正在連接社會鬥爭和反核鬥爭 [6]。工會已經發起了一些新鮮行動，如在東京電力公司總部前靜坐。

政治賭注

具有政治，協會和工會背景的積極分子參加了反核運動。但後者多以青年爲主，他們沒有事先的承諾，使用社會網路作爲保持聯繫的方式。他們中間現在有許多家長，關心著子女的未來。不帶政治傳統背景的參與行動，給新興的抵抗運動帶來力量和活力。這個情況，40年來在日本群島沒有先例，這表明，我們正在見證該國政治局勢的一個轉捩點。

日本的危機不是“部門性”的，它不“只是”牽涉到核能或“只是”牽涉到社會問題。這是一場信任的危機，一個民主的危機，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一個國家的危機。精英們要去克服它，不會很容易。它也是一個沒有現成替代方案的危機，對於一般人，形成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方案並不容易。

當然，結束核電的計畫正在制訂中，這是第一次。但在事件中，政府將被迫退出這個舞臺（目前，它已放棄把核電比例從30%增加至50%的電力生產計畫），企業將提出自

己生產主義的替代品，選擇可以生成利潤而非其社會和生態理性的替代方案。關閉現有的發電站是不夠的。改變能源模式也是必要的 --- 不打擊（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邏輯和既定的權力，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應該希望福島縣的災難不會變得更糟，但即使最樂觀的假設，也認為受影響電站的放射性排放，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至於社會衝突，它只是剛剛開始，將伴隨著整個災後的重建時期。長遠來看，我們必須考慮的是團結一致。

利害關係的國際化

福島的衝擊波讓人覺得遠遠超出了日本列島。它也激起了其它的運動，例如印度傑塔普反對巨型核電站建設的運動。它加強了公眾對核電站的拒絕，這在德國已經很強烈了，並在核電占主導地位的地方降低了公眾的支持，例如在法國。

福島事件後，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此外，從企業的觀點來看，核電投資的經濟效益受到挑戰，接著切爾諾貝利事件後面，日本的災難將導致實施新的安全需求，成本會增加。德國西門子公司已決定退出這個行業，瑞士當局已經宣佈結束核電，還有其他國家的政府在猶豫，這些都是徵兆。至於法國部分，政府仍然無節制地捍衛核能方案。

不幸的是，3月11日的災難以過高的代價，才在核能企業巨頭的牆上開啓了一個窟窿。日本人民必須同時面對地震，海嘯和福島災難的後果。在此困難時刻，他們需要我們的聲援。

歐洲團結無國界組織（ESSF）為日本社會運動，特別是東北地區的全國工會理事會（NTUC）籌集資金。捐款請通過歐洲團結無國界組織（ESSF）轉送：

支票

付給ESSF的歐元支票請寄：

ESSF
2, rue Richard-Lenoir 2,
93100 Montreuil 93100
France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銀行

Crédit lyonnais
Agence de la Croix-de-Chavaux
(00525)
10 boulevard Chanzy
93100 Montreuil
France

ESSF帳戶號碼為：445757C

國際銀行的詳細資料

IBAN: FR85 3000 2005 2500 0044
5757 C12
BIC / SWIFT: CRLYFRPP
Account name: ESSF

帳戶名稱：ESSF

►皮埃爾·魯塞是第四國際的領導成員，專門負責亞洲的聲援活動。他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的成員。

附注

[1]在許多日本記者的英語文章中，對這一點做了反思，我們把它們放在ESSF網站上。沒有任何大日本媒體反對核能。“朝日新聞”是一個中間派的全國報紙，有英語版的週刊，並把一些英語文章放在網上，“每日新聞”也有類似的地方。“日本時報”偏左，只有英文版日報。“讀賣新聞”非常偏右，是強烈的擁核派。該集團亦發行英文報紙“讀賣新聞日報”。“日本產經新聞”（“Japan Economic Newspaper”）相當於日本的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國“華爾街日報”。該集團發行英文週報，有線上服務。

[2]日本時報，2011年5月27日。ESSF網站（文章21728）：“日本/東北：聯合國列舉“同步”的基礎設施故障”

[3]“讀賣新聞”，2011年5月24日。ESSF網站（文章21679）：“日本/東北：只有30%的捐款達到受害者手中”

[4]見ESSF網站（文章21704）日本媒體的文章

[5]見ESSF網站（文章21553）：“來自日本的呼籲 --- 6月11日行動：不要核電”

[6] [例如，“日本：讓我們通過工人之間的聯合團結捍衛我們的生活和就業！” ESSF（文章21609）

本文全譯自《國際觀點》第438期，2011年7月號。

聲援佔領華爾街運動

團結政治委員會

佔領華爾街運動，只是美國經濟危機第一次爆發以來所發生的最好事情。佔領運動在蔓延。我們站起來還擊。我們還表明，另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是可能的。

我們是一個受壓迫者的運動。我們包含了失業者，無家可歸者，監禁釋放者，窮困潦倒者和被蹂躪者。我們歡迎那些受歧視者，那些被拋棄者。這就是民主。我們正在建設一個爭取民主的獨立運動。

在“99%”的人裡面

* 7月，官方統計的失業率是8.2%的白人 — 但黑人的失業率是16.8%，拉美裔為11.3%

* 2009年，白人中等家庭的資產淨值為113149美元 — 而黑人為5677美元，拉美裔為6325美元

* 2009年，有15%的白人家庭的財富為零或負數 — 但有35%的黑人家庭和31%的拉美裔家庭的財富為零或負數

* 男性黑人不到美國人口的10% — 但占整個監獄人口的35.4%。我們來自五湖四海，來自各個種族，所有宗教，有男有女，同性戀和異性戀者，不分年齡，大家聚集一處，共同建立一個強大的力量，反對華爾街和華盛頓的貪婪和腐敗。

我們並不是昨天開始的。較早的工會和社會抗議和佔領，像‘彭博村’運動(Bloombergville，要求紐約市長彭博下臺的群眾運動——譯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現在，我們每天都在增強。整個世界都在注視：而且紐約市工會和社會正義組織也已經抵達。我們邀請大家今天進軍佔領華爾街，或者返回華爾街。

我們知道，今天銀行和企業主導著美國。我們知道，企業的老總和金融業內部人士與共和黨人及民主黨人勾結，決定國家的議程。他們一起制定規則 — 還有他們的利潤。我們付出代價。是終止它的時間了。

我們需要在這個國家有一個新的財富分配。我們需要給所有人提供工作，獲得基本生活工資。我們需要免費教育，全民保健。而且這是可以做到的。我們需要開始行動，結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使所有的士兵回家，關閉世界各地的幾百個美軍基地。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改變這個制度。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9月30日通過的‘佔領紐約宣言’指出，公司應為失業，無家可歸，環境破壞和帝國主義負責。‘宣言’描述了美國和世界各地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傷害。

華爾街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神經中樞。我們在這裡眼盯著蜘蛛，但我們知道問題不是蜘蛛 — 而是它的網。

眼下，我們在這裡，在華爾街象徵性地打擊該制度的心臟。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需要去建立一個運動，可以把這個制度改造成一個真正的基於平等和民主基礎上的制度。我國和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應獲得體面的生活。擋住這種可能性的是聚集在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擋路的是這個蜘蛛網：資本主義。

我們需要加強我們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力量不只在於個人的參與，還在於同我們家人和朋友的連接，同我們社區和工作場所的連接，同我們工會，學校，宗教團體的連接。我們需要將這些群體聚集一起，作為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之間，以團結為基礎的一種社會力量 and 一個政治運動。否定那些人的政治。否定銀行家或老闆。否定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

我們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人民認識到，有些事情必須要改變了。我們的運動是由讀不起書沒有工作的青年組成的。它必須是失業工作者，喪失家園的家庭，和永遠不能完全共用機會的有色人種的一個運動。我們正在共同凝聚力量，要創建一個新的民主制度，要為我們的社會帶來正義。

我們聚在這裡，是多麼地神奇和令人興奮。我們必須學習塔里爾廣場的埃及人，西班牙廣場的憤怒者，和威斯康辛州的工人。‘佔領華爾街’已經導致全國各地的‘佔領’運動。我們是世界各地的民主和社會正義國際運動的一部分。我們是一個新運動的一部分，這個運動可以改變歷史和世界前進的方向。這個運動，引進一個不同的制度，可以拯救這個星球及其人民。

2011年10月5日

此文首先發表於團結網站Solidarity website。

中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41期，2011年10月號。

巴基斯坦工黨受到攻擊，請幫助我們進行反擊！ 巴基斯坦工黨（LPP）的呼籲

法魯克·塔里克

巴基斯坦工黨（LPP）的支持者和黨員被關在巴基斯坦不同的監獄。9名紡織工人，包括LPP領導人法紮勒·伊阿赫，被關在費薩拉巴特監獄。15名活動家，包括LPP的當選聯邦委員會成員巴巴揚，被關在吉爾吉特監獄。他們不是恐怖分子。他們是政治活動家。然而，所有的人都按照反恐主義法被控罪。

11月14日，總理吉拉尼在曼迪·巴胡爾丁說，現在這個時候在巴基斯坦沒有政治犯。他是我的大學同事，我告訴他，我知道至少有24名巴基斯坦工黨的支持者和成員出於政治原因被關在監獄裡。除了那些失蹤的人，在俾路支省的監獄，還有很多其他的人在受煎熬。

在費薩拉巴特的9個政治犯中有6個被反恐主義法庭可恥地定罪判了整整490年的監禁。有犯罪行為導致了2010年的紡織工人的罷工。當時一個老闆從工廠向工人們開了火，工人進行了憤怒的反擊。老闆無罪而工人被定罪判了490年監禁。

在吉爾吉特，員警開火，打死一對父子，因為他們要求給阿塔·阿巴德湖的所有受害者一個公正的賠償，導致人民反擊並佔領了該地區。殺害兩人的涉案員警無罪，但是前吉爾吉特區議會議員巴巴揚，以及該地區14個主要的政治活動家被監禁。正義在哪裡？

在費薩拉巴特，是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的謝裡夫，還有省司法部長拉納·薩納爾拉（Rana Sanaullah），追捕我們，他們要給我們一個教訓，因為我們在該城建立從未有過的紡織工人運動。在吉爾吉特，是巴基斯坦人民黨，包括首席部長邁赫迪·沙阿，要教訓我們，因為我們支持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的抗議群眾反對不公正和不當行為。

我們不會放棄，要反擊，建立一個運動，為這些政治活動家的釋放而鬥爭。我們需要你們的道德，財金和政治上的支持。

運動的建立記錄

巴基斯坦工黨成立於1997年，是一個小型的左翼政黨，旨在幫助建立巴基斯坦的社會政治運

動。在2000/2001年，我們發起了對奧卡拉的旁遮普佃農協會（Anjuman Mozareen Punjab）的支持行動。該農民運動建立了巴基斯坦農民運動歷史的最好例子。他們回擊了軍事農場當局，接過了68000英畝土地，並堅持抵抗。

2003/2004年度，在巴基斯坦第三大城中建立了織機工人運動（the power looms workers movement），我們發揮了重要作用。還有勞工民族運動（Pakistan Labour Qaumi Movement），它的領導是LPP的成員，領導了成千上萬的工人，為更好的工資和勞動條件而鬥爭。現在，他們正受到攻擊。

2007/2008年，在律師運動的建設中，我們起了作用。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走進監獄。我們每週參加律師的示威和集會，我們是長期街頭示威的一部分，領導了在拉合爾GPO Chowk地區著名的員警抗爭行動。

不像那些現在才自稱是軍政府的堅決反對者的人，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就反對穆沙拉夫將軍的軍事政變。在穆沙拉夫當政期間，幾乎所有的巴基斯坦工黨（LPP）領導人都多次被逮捕。例如，我自己在穆沙拉夫獨裁期間就被逮捕了12次。

建設另一種媒體

巴基斯坦工黨（LPP）積極致力於建立一個替代性的媒體，以反對商業媒體的影響力。從1997年到2010年，巴基斯坦工黨（LPP）出版了一個週報‘工人鬥爭’（Mazdoor Jeddohud），該報沒有插入任何廣告。由於經費拮据，該報現在改為月刊。

社會主義巴基斯坦新聞（SPN），開辦於2004年，是目前規模最大的政治電子郵寄清單，有超過7500的成員。巴基斯坦工黨（LPP）的活動家每天自願工作一個多小時，審核此郵寄清單。

我們也參加了‘線上觀點’雜誌的工作，該雜誌這是最好的線上雜誌之一。

聲援和救災工作

LPP的支持者和成員積極參與了2005年的

地震和2010年的毀滅性暴雨和洪水的救災活動，籌集資金，幫助那些在困難中的人。

我們全力以赴，建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要在巴基斯坦，更加一般的。是要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女權主義的，和環境保護的運動。

請送出您的捐款

我們希望到2011年11月26日之前募集至少五十萬（500,000）盧比。11月26日，勞工民族運動（LQM）計畫在費薩拉巴特召開公眾集會。我們期待著數千名人參加。我們需要您的財政援助，聲援和支持受害者的家庭，這些家庭現在沒有其他的生活來源。

為“費薩拉巴特六君子”的緊急財金求援

眾所周知，費薩拉巴特的六個勞工領袖已被判入獄490年。他們唯一的罪行就是領導一個和平的罷工，爭取增加政府公佈的最低工資。他們是阿克巴爾·阿裡·卡博（Akbar Ali Kamboh），巴巴爾·沙菲克·蘭德哈瓦（Babar Shafiq Randhawa），法紮勒·伊拉希（Fazal Elahi），林蛙裡·亞茲·艾哈邁德·穆罕默德（Rana Riaz Ahmed Muhammad），阿斯拉姆·馬利克（Aslam Malik）和阿斯伽·阿裡·安薩里（Asghar Ali Ansari）。其中四人於2010年7月被捕，而另外兩個人在2011年7月以同樣的罪名被捕。

還有三個工人在監獄裡等待審判。

所有這些人都是織機工作組織的領導人，這個組織名為勞工民族運動（LQM），在巴基斯坦第三大城市費薩拉巴特。勞工民族運動（LQM）是一個基於勞動組織的社團，自2004年以來，它為紡織工人的權利而戰。

2011年11月1日，一個反恐法庭的法官，在費薩拉巴特，以恐怖主義罪名判決六名領導人。經常觀察到的情況是，這些法庭判決恐怖分子無罪，但卻按照巴基斯坦的反恐法判決工人領袖有罪。

他們被指控在罷工期間燒毀工廠。這是捏造的罪名。事實是，在罷工的那一天，2010年7月20日，廠主收買的歹徒在工人正要離開工廠要求改善工資時，開始開槍射擊。一些工人勇敢地進到工廠裡面，迫使歹徒停止開槍射擊。歹徒中有人受到憤怒工人的暴打。

在審判過程中，工人們的律師問，如果工廠

已被燒毀，那麼它如何能夠在三天之後再次開工。

2010年7月20日，在費薩拉巴特地區，10萬多名織機工人舉行了罷工，要求增加政府在2010-11年度預算中宣佈的工資。政府宣佈，私營部門工人的最低工資增加17%。罷工前，費薩拉巴特的勞工民族運動（LQM），章城（Jhang）和其他地區已經與動力紡織機雇主做了三個星期的談判。

這些工人領袖的長期監禁已給了費薩拉巴特乃至全國的工人運動一個破壞性的打擊。法院會做出如此嚴苛的反勞工的司法判決，特別是因為這個司法機構本身由於一個強大的人民運動的支持才得以恢復的，這完全出乎任何人的意料。然而，反恐法庭選擇作出如此判決的唯一目的是破壞織機工人的運動，因為該運動正慢慢成為全國各地工人階級戰鬥者的象徵。

資本主義制度訓練勞工的主要方法之一，是驅使他們，讓他們只能與老闆按照老闆的條款進行談判。達成這個目標的方法，是通過殘忍的政府武力，或從財政上鎮壓工人階級，使他們為了在制度內得以生存，只有選擇妥協。

老闆們使用後面的策略，確保這些勞工領袖成為任何人敢於發聲反對不公正判決的工人的例子。我們所有入獄的同志都已婚，是其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他們的家庭被推向經濟災難的邊緣。這些家庭在考慮讓孩子退出學校，因為他們甚至無力購買足夠的食品。

我們知道，這是老闆征服工人的政治戰略的一部分，它對被監禁領導人的家庭有嚴重的惡果，巴基斯坦工黨，勞工民族運動，全國總工會和勞工教育基金會呼籲集資支持我們入獄同志的家屬。

這些家庭值得我們的慷慨支持，不僅因為這些同志由於他們參與工人階級運動而遭受迫害。而且，因為這項運動的結果，以及我們聲援和支持患難中的同志的能力，將決定這個特定事件是否會阻止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如老闆希望的那樣），還是成為工人階級團結反對統治階級醜惡戰術的一個光輝的榜樣。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42期，2011年11月號。

“爲什麼我是並將繼續是社會主義者”

馬來西亞傑雅庫馬·德瓦拉寫於拘禁中

傑雅庫馬·德瓦拉和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的 29 名成員被拘留在檳城，被控以試圖重振共產黨和發動反對國王的戰爭。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指控，雖然沒有證據支持它們。目前正在組織世界範圍的抗議，反對這種粗暴的拘留。見吉隆坡的鎮壓 - 聲援 6 位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 (PSM) 的同志。



“嘿，庫馬爾 (Kumar 王子的意思-譯注)！你還在用槍挑戰風車嗎？” 4 年前在一個格鬥訓練館，一個醫生朋友向我打招呼說。一周前在媒體上，曾有一些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的消息。

對於許多人來說，社會主義的實驗已經被放入歷史的垃圾堆，只有糊塗者還在爲社會主義奔波。

但是，對於我們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 (PSM) 人來說，我們堅信，要避免在未來 30-60 年發生一場巨大的經濟生態災難，社會主義須要擔負一個重要的，甚至關鍵的作用！

我們相信，世界能找到一個可行的經濟方案，替代以貪婪驅動的經濟。我們爲這個立場提出 3 個主要論據。

1. 馬來西亞目前的經濟發展趨向“觸底競爭”。

全球資本和技術的擁有者，控制市場的出入，這種公司的數量相對較少 --- 大約 500 到 1000 個。在當今的單極世界，他們已成爲全能的，可以“予取予求”。即使是最大的政府也無法控制他們。

馬來西亞吸引投資者進入馬來西亞的措施，包括：

降低公司稅，同時又制定商品及服務稅 (GST) 以便補充稅收收入。把稅務負擔轉嫁到普通的馬來西亞人身上。

加強“勞動靈活性”。這是一個名不副實的說法 --- 它允許簽勞工合約，削弱工會，從而破壞工作安全性和工人的權利。

把像衛生保健和高等教育這樣的基本服務私有化。

所有這些措施把經濟壓力施加在 70% 的人口身上。

而這些措施，也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施行 --- 這些國家競相狂熱地爭取外國直接投資 (FDI)。在這種發展的框架內，要建立一個互相關懷的社會，是非常困難的。

2. 導致金融資本大規模增長和日益動盪的金融“泡沫”的消費引起的慢性病。

大企業能夠在最便宜的地方建廠，這個“予取予求”的能力，對這些公司意味著巨大的利潤，但在同一時間，也抑制全球經濟的總的消費能力。當一個美國或歐洲公司轉移到中國，解雇了 100 個美國工人，並用的 1/7 工

資雇用 100 名中國工人時，那麼工人階級的總購買力就降低了。

消費需求缺乏強勁的增長，這種情況決定了公司企業不能靠投資於消費品的生產而獲得利潤。因此，企業需要嘗試用其他方法賺錢，如期貨市場，外匯交易，股票市場和其他金融產品的衍生物。

這種傾向的典型是這個事實，即“量化寬鬆”--- 向美國經濟印發更多的錢，努力刺激工業生產，從而減少失業 --- 事與願違地在世界各地製造了更多的金融泡沫。問題是消費需求疲弱，而不是缺乏生產資本。

這裡的問題並非沒有足夠的控制調節，而是世界財富的錯誤分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挑戰公司的權力！

3.我們已經達到了經濟增長的環境極限。

全球經濟嚴重依賴於石油。在未來 50 年左右的時間內，這種商品將要耗盡。我們迫切需要思考的，不僅是替代性燃料的來源，還要更多地考慮燃料的效率！

全球變暖與我們同在。海平面的上升來得如此之快仍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 但這是否意味著，如果它只影響我們的子孫而不是我們，我們就可以忽略這個問題？

一個經濟模式，如果必須要有一個全球平均每年 4% 的增長速度，才能避免經濟衰退，這樣的模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不適用於未來的 50 年！我們需要更公平地重新分配我們已經創造的財富。我們必須減少浪費！增長不能是無止境的。

所有這些都是可能的，只要我們已經準備好挑戰這樣的模式，這個模式認為未加抑制的貪婪會為世界上大多數人帶來最好的結果，因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仍然在操縱今天企業引領的全球化。

全世界的普通人民，需要取得力量，以決定國家或世界經濟的方向，讓它離開世界最富有的 560 個公司的手掌。

我們需要讓世界人民通過民主進程接管這些任務。這是面向 21 世紀的社會主義所面臨的任務。這些都不是容易達到的目標。

但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極其嚴重的。若不加控制，它們可能會引發生態環境的，食物或氣候的災難，將導致世界人口的大量毀滅。

這不是我希望留給我的子孫後代的世界。這就是我為什麼是社會主義者，並打算繼續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原因，儘管我遭到按照緊急狀態法（EO）/內部安全法令（ISA）的逮捕！

傑雅庫馬·德瓦拉博士是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和豐議會選區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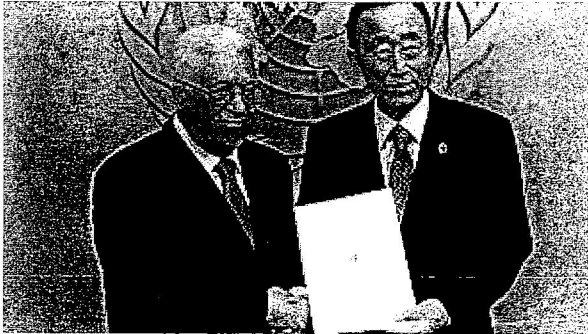
譯自《國際觀點》第 438 期，2011 年 7 月號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 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 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 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 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 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 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 元

支持巴勒斯坦的聯合國成員國地位

趙京



在9月23日下週五的聯合國總會期間，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終於擺脫傀儡的恥辱，不顧美國和以色列的威脅，將代表全體巴勒斯坦民眾尋求安理會和總會承認巴勒斯坦的聯合國成員國地位。在聯合國的193個會員國中，已經有2/3贊同巴勒斯坦以獨立的國家身份獲得完全的會員資格。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從目前的“觀察員地位”升格為“非成員地位”，那樣只需要193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大會的簡單多數支持就可以獲得。即使只是成為“非成員地位”（但畢竟被承認為一個國家），巴勒斯坦也可以以獨立國家的身份把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告上法庭，在ICJ國際法庭等機構要求以色列解除對加沙的海上封鎖並開放西岸和加沙的領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在展開激烈的宣傳戰，其中的關鍵在於美國政府的態度。

我記得幾年前參加聖何西和平與正義中心的Sharat Lin博士（他不懂中文）的講演。他介紹自己年輕時到巴勒斯坦參與抵抗運動的經歷，最後總結道：中東問題的結症在華盛頓，我們每一個在美國生活的公眾都有責任迫使政府切斷對以色列的援助、實現中東和平。這也是我幾次參加猶太人社團活動、觀察他們影響美國政治的方式的原因。我注意到自己經常是猶太人聚會的唯一非猶太人。[1]

2009年2月，在奧巴馬準備任命得到阿拉伯世界普遍支持的外交官Charles Freeman擔

任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時，在美的猶太人發起猛烈的反對運動。不明來源的人用Freeman與胡錦濤、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的合照，發動在美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們也來簽名。我不是“領袖”，但有當代中日關係最黑暗歷史的教訓，有人問我是否簽名，我很失望地希望他們應該與被壓迫的巴勒斯坦民眾站在一起。我不瞭解Freeman本人，但他作為尼克森的翻譯訪華見過毛澤東、周恩來等，後來又擔任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與這些國家的頭頭們拍過照，不足為奇。美國政府要任命國家情報官員，與我們中國民權運動有什麼關係？這個任命結果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奧巴馬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

奧巴馬2009年6月4日在開羅大學的講演倒頗有新意，在提到巴勒斯坦時說道：“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尋找家園的過程中歷經苦難。60多年以來，他們承受了流離失所的痛苦。許多人在西岸、加沙以及鄰國土地的難民營裡等待著他們從不曾過上的和平與穩定的生活。他們每天忍受著由佔領帶來的大大小的羞辱。所以，毋庸置疑：巴勒斯坦人民的境況是不能容忍的。”[2]正是他的不同于前任的外交政策使他在上任的第一年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人們有理由對他寄予很高的期待實現美國中東政策的轉換。

但是，兩年多過去了，伊斯蘭世界發生的革命推翻了阿裡、穆巴拉克、卡劄菲等獨裁者，巴勒斯坦民眾有理由期待變革，但他們還是處於不能容忍的境況，原因就在華盛頓。人們寬容地認為奧巴馬要處理許多更急迫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全民醫療保險、世界金融危機等事務。那麼，這一次，面對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的申請，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包括所有阿拉伯聯盟成員國）都期待、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多次表示支持（說這一問題已經“拖延太久”）的情況

下，奧巴馬只要順水推舟、頂住猶太人的遊說壓力，舉手之勞就可以“成名千古”了。

然而，奧巴馬當局非常愚蠢地強烈反對推動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做法，稱這樣做會“適得其反”（激怒以色列、美國會取消援助）。奧巴馬9月12日重申，如果巴勒斯坦完全建國的議案下星期在聯合國大會開幕時遞交給安理會，美國將使用否決權來加以阻止。美國的態度影響了本來不反對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的歐盟。歐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頓說，歐盟目前沒有明確的立場，即使巴勒斯坦這次沒有加入聯合國（實際上暗示加入不了聯合國），歐盟不會“懲罰”巴勒斯坦[3]。看來，奧巴馬最需要的是來自美國民眾的呼聲，幫助他拿定主意。

今天中午，我接到CBS 5 News關於美國是否應該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的採訪電話，感謝他們這時盡到了新聞機構的職責。我除了簽署網上簽名[4]外，決定用傳真直接給白宮奧巴馬（202-456-2461）呼籲。[5]

這封“關於巴勒斯坦完全聯合國資格”的傳真包括以下內容：

一、呼籲奧巴馬改變錯誤立場；

二、1949年11月29日聯合國總會第181號決議承認以色列建國的內容還包括巴勒斯坦國的建立；

三、巴勒斯坦民眾自從1948年和1967年被趕出家園的難民生涯以及加沙地帶的人道危機；

四、聯合國安理會第242和338號決議要求以色列退回到1968年以前的邊界，2004年7月9日國際法庭對以色列非法佔據巴勒斯坦領土的判決；

五、美國在很多國際場合是唯一袒護以色列的國家；

六、你的錯誤立場將讓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再次確認美國政策的虛偽，喪失中東和平的良機；

七、我從來沒有投過任何人當總統，但這一次如果你採取正確和明智的決定，我下一次將破例投你一票助你再選。

奧巴馬先生，請擺脫機會主義的政客打算，讓人性、人道指導你的政策選擇！

2011年9月18日，聖拉蒙

注釋：

[1] 例如，Jing Zhao “Watching Refuseniks” , March 8, 2009.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refuseniks.pdf>

[2] 引自趙京：“美國能實現中東政策的轉換嗎？” 2009年7月26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obama_cairo.pdf

[3]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8, 2011.

[4] 這個網頁也有中文：<http://www.avaaz.org/cs/>

[5]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letter_to_obama.pdf



濟州島會成為第二個沖繩嗎？

趙京

濟州島是韓國最大的島嶼，是一座火山島，面積1825平方公里，包括26個小島，島中央是通過火山爆發而形成的海拔1951米的韓國最高峰漢拿山，有“韓國夏威夷”之稱，人口約60萬。

濟州島地處東亞中日韓地區的中心部（附圖），北距朝鮮半島南部海岸90多公里，東與日本的九州隔海相望，西與上海相距5百公里，地扼朝鮮海峽門戶，地理戰略位置極為重要，一目了然。濟州938年以前曾為獨立島，後隸屬於高麗王朝。1273年，統治中國的元朝征服高麗後，佔領濟州島，設置耽羅軍民總管府，管轄駐紮在島上的軍隊和居民。1356年高麗朝廷重新掌權，濟州島上的官員在元朝滅亡幾十年後向高麗投降。與沖繩類似，濟州保留著獨特的文化，無乞丐、無小偷、無大門，貼切地反映了濟州樸實的民情（摘自百度百科）。

20世紀30年代，統治朝鮮半島的日本把濟州島變為軍事基地，稱為“不沉航空母艦”，從這裡起飛的軍機不用加油可以直接轟炸上海、南京等。1944年，日本為了防止美國可能的本土進攻，在濟州島駐紮7萬5千兵力，完全把濟州島變為一座大軍營。日本的快速投降避免了濟州成為第二個沖繩。戰後，美軍同時駐紮日本和韓國，蘇聯海軍配置在海參崴和“北方四島”與美日同盟對峙，中國的有限海軍能力被制約在臺灣海峽對面，濟州島相安無事。

隨著中國實力的擴張和海軍能力的延伸，所有與中國鄰海的國家都緊張起來，其後必有美國的因素。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今年6月4日表明要在亞洲增加美軍的寄港地，而濟州島成為代替部分沖繩功能的戰略基地，很有魅力。為此，推動濟州基地建設計畫的韓國海軍與國防部一方面主張美國不會把濟州島作為戰略據點，但卻沒有否定美軍寄港利用的可能性。反對派市民團體指出：根據美韓相互防衛條約和美軍在韓地位協定，美國原則上有使用韓國基地的權利，如果戰事爆發，這麼得天獨厚的戰略基地，豈有放置不用之理？沖繩基地只能停泊3千

噸以下的軍艦，現在華盛頓、東京和沖繩三方正為如何轉移基地較勁，濟州島如果建成基地，可以停泊6艘驅逐艦、潛水艇，甚至航空母艦。反對派市民團體也擔心濟州基地會轉用為美日導彈防禦系統的海上基地，迎擊中國的洲際導彈。對此，韓國海軍部說：韓國沒有加入美日導彈防禦系統，在濟州基地停泊的韓國驅逐艦也沒有迎擊導彈的能力。反對派市民團體反駁說：問題在於具備迎擊導彈的能力的美軍的停泊，這樣刺激中國，讓濟州島成為美日軍事同盟指向中國的尖刀，違背了韓國“不採用威脅、壓迫外國的軍事措施”的國防方針，適得其反。

韓國海軍還提出“中國對濟州島的主權要求”、“石油運輸線被封鎖”、“麻六甲海峽那樣的海盜橫行”等想像力豐富的理由，也暗示與日本對海洋資源的爭奪前景。從根本上講，是以半島南方（韓國）吞併/吸收北方（朝鮮），在東亞出現了一個7、8千萬人口（全世界第18，比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國、法國還多）、經濟實力全世界第十這樣的中等強國為前提，因此需要相應的軍事能力。中國、日本，再加上美國、俄羅斯，會容許、放心、支持這樣的東亞格局嗎？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韓國沒有提供一個明確的半島統一後的政治框架（例如，非核、不結盟、中立，甚至非武裝等），半島周圍的四大國不願、不能、不讓半島統一，這也正說明在推進濟州島的基地建設之前，韓國需要明智的國際政治判斷與和平外交努力。

正如我對釣魚島/尖閣諸島的非主權方案²一樣，濟州島的非軍事化是關係到東亞和平的唯一政治前途，沒有別的選擇。要實現這一點，不能指望任何國家強權的善意、明智或制衡，只能基於我們民眾之間的相互尊重、瞭解和支持。

1 摘譯自日本《橋樑》週刊2011年8月29日第2187號“韓國現況”譯文。

2 趙京：“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的非主權方案”，2011年3月14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diaoyu.pdf>。

氣候變化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孟加拉的情況

達尼埃爾·薩拜

孟加拉地處世界最大的三角洲，兩條喜馬拉雅河流，雅魯藏布江和恒河，在那裡匯合，流入孟加拉灣，該國的氣候災難頻繁。孟加拉土地面積的一半，離海平面不到 10 米。它主要由發源于喜馬拉雅冰川的河流帶來的泥沙沉積而成。冰雪融化時，經常導致大規模的洪水。沿海地區受到旋風的擺佈，巨浪會淹沒沿海地區。

孟加拉遭受極端的地理氣候條件，經過幾個世紀，那裡已經建立了一個平衡，能夠讓密集的人口生活在那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應用加劇了全球變暖，打破了這個脆弱的平衡。毫無疑問，在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比它更脆弱，今天孟加拉的人民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前所未有的氣候變化

孟加拉沒有任何地區免受氣候變化之殃。在該國北部，過去夏季只有 2 到 3 個月，現在可以持續 5 或 6 個月，伴隨著溫度的大幅上升。因此，肥沃的土地變得乾燥，作物焦枯。河流乾涸，農民依賴昂貴的灌溉系統，抽取地下水，逐漸耗盡它。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農民還面臨著井水受砷污染的問題，砷原本在地裡，但因為抽取地下水而上升到地面。

在冬季，寒冷和濃霧越來越嚴重，摧毀許多蔬菜和季節性作物的收成。

在南方，夏季的極端溫度也在經常地上升，冬季寒冷的天氣更加常見。沿海遭受到日益頻繁的旋風，旋風正變得越來越猛烈。巨浪侵入沿海地區的肥沃土地，增加土地和河流的含鹽量，使土地長久不適用於農業。

現在該國有只有三個季節，夏季，冬季和雨季，而此前則有六個季節。在這期間，天氣好象瘋了：夏季越來越炎熱乾燥，冬季越來越冷酷，雨季越來越潮濕。孟加拉一直遭受的洪水和旋風，現在越來越頻繁，而且特別地是，它們發生的時間出乎預計期限。氣候變化無疑與這些混亂有關，至少是部分地有關。大氣變暖加速了南極和北極冰川的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孟加拉沿海部分正逐漸被咸水淹沒。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第三次報

告估計，如果海平面上升 45 釐米，該國就可能失去其陸地面積的 10.9%。

在北方，交匯於孟加拉的河流，因喜馬拉雅冰川融化而獲得水的補充。隨著全球變暖，這些冰川的融化速度快於冰凝結的速度。因此，河流在逐漸地減少，如果這種現象加劇，河流可能會很快地乾枯，這將導致孟加拉北部變成一片沙漠。

但時間一到，季風期間降雨量增加，再加上冰川融化的加速，使得要疏通的水量增加了。由於海平面上升，這部分應流入海洋的河水本身難以流入大海。這兩個因素的結合，使得洪水更頻繁，更廣泛。

隨著海平面上升，20 世紀 60 年代建成的高度只有 5 米的堤壩，已不再足以保護沿海村莊免遭漲潮滅頂之苦。海平面上升，北方河流攜帶的泥沙減少數十億噸，這兩者合在一起，不再阻止咸水滲透進入低地。而堤防把雨水保留在陸地一側，因此加劇了洪水。

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形勢惡化

孟加拉農民是環境退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不過，氣候變化不是導致環境退化的唯一因素。在 20 世紀 80 年代，當局制定面向出口和增加糧食生產的經濟政策。推動和支持這項政策的是一些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和英國國際發展部。

同其他地方一樣，孟加拉的結構調整政策有利於大型國營公司的私有化，有利於能源部門向外國資本的開放。其情形同 20 世紀 90 年代的採礦業一樣。國家的退出，驟然引發教育和衛生部門的危機，為私人營運開闢了道路。在發展的名義下，這些經濟改革為大規模土地的購買和對百萬人民的剝奪開闢了道路。它們造成了一個迴圈的依賴性，使孟加拉農民非常難以逃脫。

沿海的蝦養殖業擴展，旨在滿足富裕國家快速增長的市場需要。孟加拉是當今世界上第五大蝦養殖生產者。約 130 家公司從事這個行業，雇有近百萬孟加拉工人，每人一天的工資

不到一歐元。19 萬公頃的紅樹林和肥沃的土地已被轉換成水產養殖（aquicultural）場。開始以低廉的價格從小生產者手中購買的農業用地，後來轉換成蝦養殖場，從而加劇了土地的鹽鹼化，使其鐵定地不再適用於農業。

這個行業危及農民的生存手段，卻沒有提供足夠數量的就業機會。在孫德爾本斯（Sundarbans），蝦的養殖打破了脆弱的平衡，而這個平衡曾經使得當地居民有可能依賴世界上最大的紅樹林資源謀生。該生態系統不能很快地適應水的鹽鹼化和溫度的上升。大樹林在消失，大量的動物和植物物種也在消失。過去的稻農，如果沒有在水產養殖場找到工作，就回到孫德爾本斯重操漁民舊業。但是，紅樹林不能承受手工捕魚和養蝦業日益高漲的聯合壓力，因為這些行業留下的是受污染破壞的池塘。這會導致一場生態災難，加強氣候變化的影響，因為紅樹林是陸地和海洋之間的緩衝區。它們抵擋橫掃沿海地區的旋風所造成的侵害。更進一步，在內陸，迅速提高土地農業生產力的驅動力，導致化肥的過度使用。這加強了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和土地的侵蝕。

糧食主權和氣候難民

孟加拉的 1 億 5 千萬居民，尤其是其中的最貧窮者，面臨的社會挑戰是巨大的。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70% 的人沒有土地。氣候變化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危害數以千萬計的他們的生活方式。預測表明，近 4 千萬人可能成為氣候難民。如果該國的一部分，因為被洪水淹沒或已變成一片沙漠，不再能夠住人，可以預見有大量流離失所的人口，首都達卡沒有能力吸收他們。因為傳統環境的破壞，達卡每年已經接納了五十萬農民。在鄰近的印度，也找不到一個解決辦法，印度與孟加拉有 4000 公里長的共同邊界，並在 2500 多公里的邊境豎立了高 2.5 米的雙重鐵絲網牆。印度政府的說法是保護自己，打擊恐怖主義和走私。在現實中，它在一個特別複雜的邊界兩側防止了移民蜂擁而入。該解決方案必須基於合作和互助，肯定不能依靠邊界的封鎖和鎮壓。

這個國家，20% 的國內生產總值和 65% 的勞動力在農業，糧食主權似乎是個關鍵問題，它必須讓農民既能減輕又能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又要養活主要的貧困人口。糧食主權模式同主導的農事商業（agribusiness）

模式是對立的，後者以尋求利潤為優先，而不是以人民的糧食需求和對環境的尊重為優先考慮。糧食主權模式“肯定了當地人民有權確定自己的農業和糧食政策，控制自己的國內糧食市場，防止通過傾倒剩餘產品而促進當地農業發展。它鼓勵多樣化和可持續的耕作方法，尊重土地，認為國際貿易只是對本地生產的一個補充。糧食主權意味著把對土地，水和種子這樣一類的自然資產的控制權交還給當地社區，反對一切生物的私有化” [1]。

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提醒我們，大國政府無能力採取必不可少的措施。不離開資本主義制度，未來的氣候災難不可避免，因為資本主義的基礎是最大的利潤和無限的積累，同保護環境和滿足社會需求的目標是矛盾的。

像孟加拉農民聯盟（BKF）和孟加拉農民婦女協會（BKS）這樣的農民組織[2]與農民們一起組織研討會，以評估氣候變化的影響，並就獲得土地及糧食主權的問題動員他們。到 2011 年底，這兩個組織計畫推出糧食主權大篷車周遊全國。組織者希望通知和動員最弱勢的群體，共用普通農民運動的經驗，在氣候變化和糧食主權問題上，特別是在南亞，發展國際聲援活動。這些進步和獨立組織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是建立一個激進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運動要在世界範圍內爭取氣候正義。

► 達尼埃爾·薩拜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和第四國際的成員。她是第四國際駐亞洲的記者之一。

注釋：

[1] 2011 見以斯帖·維瓦斯，“主導農業模式的替代方案” ‘國際觀點’ 434，2011 年 3 月

[2] BKF 和 BKS 兩者都是代表孟加拉‘農民之路’的農民組織。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 456 期，2011 年 5 月號。

沒完沒了的經濟危機

米歇爾·胡森

正當這篇文章完成時，兩大危機震撼了資本主義，使得股市暴跌：一個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一個是美國債務上限的觸頂問題。可能的情况是，有關政府將在災難的邊緣才解決這些危機。然而，在危機爆發的三年後，這些嚴重的緊張局勢表明，危機遠遠沒有得到解決，在公共預算推出後，現在正呈現給人們的是帳單。本文的目的是調查最近的資本主義行徑，檢查它對危機時期的影響。

還有利潤率...

如果我們把利潤作為資本主義的晴雨表，那麼似乎一切事情都在好轉。邊際利率，也即利潤的增值份額，正在復蘇。儘管美國是最快[1] 陷入危機的地方，但現在它幾乎已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準。在歐元區，衰退來得遲些，追趕沒有那麼快：邊際利率已返回到十年前的水準，從而丟失了過去十年的增長，至少現在是這樣的（見圖表1）。但利潤在帶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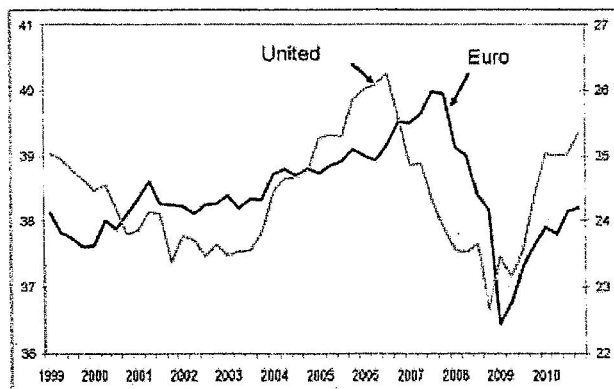


圖1 歐洲和美國的利潤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經濟分析局。

此外該危機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當緊縮鬆弛時，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工資被凍結甚至降低，大集團和銀行首先關注的是開始重新分發股息和紅利所得。

然而，這種增長提供了相當不同的意味。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在評估資本主義的良好健康狀況（幸福完全是另一回事）時，GDP的增長也是一個有用的指標。不過在結帳時，利潤率才是它的真正標準，如果市場銷路不存在，其危機後的重建就不能持久。從這個角度看，最大的問題是，經濟衰退的趨勢是否會被克服。人們可以先想像三種情形：恢復到危機前的趨勢，一個持久的衰落，或者一個越來越厲害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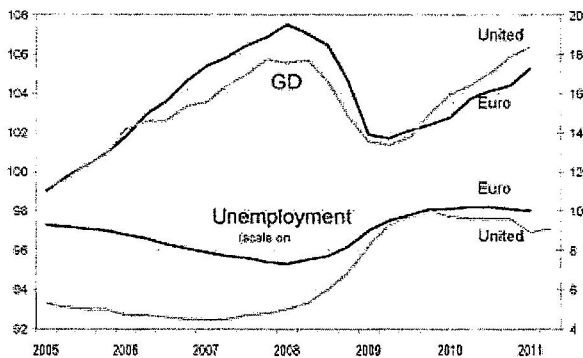
最新資料顯示，許多國家處在持久衰落的情形中，[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GDP的衰落和危機的代價（Pertes de PIB et facture de crise）”，‘hussonet’ 評論，35期，2011年7月，<http://hussonet.free.fr/pertepib.pdf>]。在2011年第一季度，一些國家的GDP尚未收回復到危機前的水準：它們是日本，英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美國，德國和瑞典正好達到，法國則略微高於危機前的水準。但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並不意味著衰落消除了。對轉變的這種理解，會讓我們弄清楚其廣泛的趨勢。

一個分裂的歐洲。雖然法國，瑞典和德國走出了危機的纏繞，但這卻不是其他許多國家的情况：西班牙，希臘，愛爾蘭，冰島，義大利，葡萄牙，英國遭受到活力的持久喪失，或者難以重新獲得發展動力。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落在後面。美國暫時恢復了其危機前的增長節奏。歐洲聯盟作為一個整體，要獲得進展，困難重重，還沒有填補好漏洞。最後，日本就差得更遠，核災難以來，其國內生產總值再次下滑。另一方面，兩大新興國家（中國和印度）的增長仍在繼續，危機幾乎沒有影響到他們。其他國家（巴西，韓國，俄羅斯）的活動都遭遇了較嚴重的下降。

失業問題成了痼疾。美國和歐洲目前的狀況相同。增長重新開始，但失業率並沒有從危機造成的高點上降下來（圖表2）。

圖2 歐洲美國的增長和失業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帳單尚未支付。經濟增長的損失似乎難以彌補。這意味著，即使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恢復到其以前的標準節奏，“收入的損失”也不會恢復。把觀察到的GDP，同根據金融危機前的傾向而估計出來的GDP作比較，我們可以用兩者之間的差距來計算評估這個金額。這樣計算出來的差距，在歐元區為8%，在美國為6%。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約150000億美元，歐元區為94000億歐元（約120000億美元）左右。總之，在這兩種情況下，收入損失約為9000億美元（7500億歐元）。

國內生產總值的這個損失是以公共債務增長的形式反映出來的。2008年和2010年之間，歐元區的公共債務增加了9800億歐元。同期，美國的公共債務也大幅增加，為32000億美元。

這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損失”差不多有使債務大山崩潰的風險。為了限制傷害，國家已擔負起這一收入損失的責任。現在他們的問題是處理債務，顯然，其做法就是把帳單轉給絕大多數的公民。但這個計畫遭遇到各種障礙，這種不確定的形勢，將使昔日增長的回歸變得更不可能。如果無所作爲，放任債務，那麼吸收債務惡化所需的時間同債務構成的時間不相上下。因而增長將回落，回落比例同危機前人爲帶動的增長相同。有更根本的原因，讓人確信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兩大極的增長將持久衰退的假設：美國模式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起作用，歐元區已陷入一個持久的結構性危機之中。

美國模式的限制

下面的圖3總結了美國模式的整個邏輯，顯示了這種模式遭遇到的限制。該圖比較了兩條曲線。首先是家庭儲蓄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自20世紀80年代初，直至危機爆發，其趨勢已經下降。這意味著，在這整個時期（四分之一世紀），家庭（平均）消耗了他們收入的增長部分。

圖3 1970至2010年的儲蓄率和貿易赤字



粗線表示國內生產總值的貿易平衡額的百分比（右邊的尺規）。淡色線表示家庭儲蓄率（左邊尺規）。資料來源：經濟分析局

美國這個非常顯著的情況，在美國以外找不到真正的第二者。它涉及不同的社會範疇按不同比例使用的兩個機制。首先是財富效應：當我的財務或財產的資產有價值時，我不太需要存錢，於是就可以消費我的大部分收入。第二是過度負債：儘管我的收入停滯不前，但我進一步舉債，以便繼續進行消費。而一些富裕家庭還可以舉債炒股票！消費的過度增長，這種現象為GDP的增長作出了重大貢獻 [2]。

然而，這種模式導致貿易平衡的退化，這就是第二條曲線。在家庭消費的推動下，內部需求趨於增加。它的速度比國民生產快，差別則被超額的進口所覆蓋，增加的是貿易赤字。可以在世界其它地方，強行為這個赤字的融資，只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型才可以運行。這就是為什麼上面圖表（儲蓄率和貿易平衡）的兩條曲線在1980-2006年整個期間是同步的原因。

這種關聯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基本核算平衡的結果，是所謂的“結算平衡規則”的結果[3]，歸納起來就是：私人儲蓄+預算結算=貿易結算。

私人儲蓄代表的是企業和家庭的累積儲蓄。前者一般是負的（公司陷入債務）而後者是正的（全球家庭的儲蓄多於他們自己的欠債），但兩者的總和，可以是正的或負的。至於預算結算，一般都是赤字。方程的意思是，貿易平衡結算等於私人儲蓄和預算結算的總和。如果是負數，則意味著是資本的流入專案，確保了支付的平衡。換句話說，世界其它地方的儲蓄，掩護了有關國家的儲蓄需要。在貿易順差的情況下，它是相反的：國家（政府+家庭+企業）處理了盈餘儲蓄，然後它可以用資本流出的形式出口到讓其獲得貿易盈餘的地方。

美國家庭儲蓄率的下降，因而自然地伴隨著貿易平衡結算的增長。另外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公司的債務和貿易赤字）起到第二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圖3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它們的蛛絲馬跡。我們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家庭儲蓄率繼續下降，但貿易赤字趨於穩定。原因很簡單：在此期間，預算平衡大為改善。貿易結算從1992年GDP的-5%的赤字變為在2000年的2.6%的盈餘，這是互聯網泡沫破裂，布希的減稅和軍費開支增加以前的事，然後再次陷入赤字。因為危機和通貨再膨脹計畫，它陷入深淵，預算赤字達到GDP的10%左右。

所使用的核算關係仍然有效，但關於其實現的條件則沒有任何意義。不存在其它因素要服從的主導因素：每個因素互相關聯。但最重要的是，調節做法同任何舊的增長率是不相容的。在美國的情況下，這種平衡的實現只能以低於危機前水準的增長速度發生。

然而，我們可以找到一個開啓近期良性迴圈（圖表3）的辦法。陷入危機後，家庭儲蓄率停止下降，它甚至增加了GDP的4%。關於貿易平衡的影響是立即的，順序幾乎是相同的。初看之下，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意味著美國經濟對外國資本的依賴少了。但矛盾的是：由於儲蓄率的降低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它的增加，意味著它已不再可能

算作為經濟增長了。

因此，有必要考慮預算赤字的增長。它的規模（約 GDP的10%），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沒有相當者，因此，預算赤字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今天政治爭論的主要點，就不那麼令人吃驚了。這裡，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矛盾：儲蓄率，無論是否產生於公共赤字的私營部門，將越來越難以被資本的流入掩蓋。

這裡，再次在增長減低的水準上找到平衡點，其一大批政治社會問題，特別地與歷史高水準的失業率相連接，失業率只能慢慢下降。它甚至已經開始增加了，從3月份的8.8%到6月份的9.2%。如果把業已放棄尋找工作努力的求職者，以及把尋求全職工作的兼職雇員包括在內，那麼現有的失業涉及到六分之一的工作者。

只有兩條路徑，可以解除這種制度的束縛。第一條有利於美國出口的增長，無須增加貿易赤字，卻能增加增長。投資和創新的努力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但在當前的時機，投資並不很活躍，跨國公司優先投資在海外。只有美元不斷的貶值，才使美國產品更具競爭力。但是，這種傾向會達到它的極限，加深對美元匯率的疑慮，並導致外部融資的乾枯，而這些融資對於彌補赤字是必要的。所以這條道路帶有根本的不確定性。

另一種解決方案可能涉及到收入劃分的一個實質性的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增長帶來的額外收入被很狹小的一部分人圈佔。因此，1982年和2007年之間，平均收入增加了18,900美元。但占人口10%的最富有者拿去了這種額外收入的81%！[4] 如果能更好地分配增長所得，使工資像勞動生產率那樣演進，較低的增長是可以接受的。眼下，一個激進的稅制改革，要讓這不平等的四分之一世紀的利益作出更大的貢獻，將使赤字減少。顯然，各個勢力的社會關係不足以推行這樣的解決方案。在這些條件下，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美國將尋求讓世界其它地方為他們的繼續繁榮負責。但是，這又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對於減緩用於彌補美國貿易赤字的資本，它只能起反作用。此外，中國和許多新興國家將會發現他們的盈餘減少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它們的經濟將重新

以其內部市場為主，並且將加強它們之間交流。

歐洲資產階級治理的危機

從邏輯上說，危機會在政治上有利於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幸的是，現實情況大為不同：激進左派並沒有真正的進展，社會民主黨和右派轉向去適應選舉的節奏，而民族主義右派幾乎無處不在地冒頭。要知道，這個形勢的根源在於危機的制度性，而在歐洲，這個危機還結合了一個半截建設的特殊矛盾。

我們可以在這裡談論歐洲建設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和單一貨幣選擇的自食其果的後果。後者的設想主要是依據於工資管理方面的考慮：在不可能操縱匯率的情況下，工資成了唯一的調整變數，允許在同一貨幣區的幾個國家經濟體共存同居。但這個系統是不一致的，它包括兩個洩漏變數。單一貨幣意味著利率趨同向下。於是怪誕的影響如下：一個控制價格不佳的國家，仍然獲利於較低的實際利率，這有利於以債務增長為基礎的發展。此外，由單一貨幣的定義，導致一個國家的貨幣貿易赤字的回饋效應的消失。西班牙得益於這兩種效應，經歷了強勁增長，這導致了失業率可觀的下降。但這種增長的基礎是一個不受控制的樓市高峰和一個龐大的貿易赤字。

這一切能夠作用得好也能作用的壞，但危機尖銳地揭示了歐洲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非一致性。除了日復一日地修修補補之外，歐洲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走向聯邦制，讓大家立即分擔債務，或者是歐元區的解體。由於歐洲資產階級沒有準備好接受這些後果的任何一個，結果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危機，還有，無法真正談論一個統一的歐洲資產階級，因為既不存在歐洲資本也不存在一個歐洲國家。

為簡化起見，有必要區分四個“演員”：大型跨國集團，銀行，金融和統治階級的政府代表。對於整個系列的問題，顯然存在一個深刻的協議，它關注的是階級精英的利益：在當前時機，共同的觀點是應用休克療法，從危機中獲利，以化解形勢。這場危機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是進一步加深社會倒退的機會：削減公共開支，凍結工資，養老金改革等。

但是，這種利益共同體並不能防止因危機加深的內部矛盾。根據對立的兩極，一方面是國家和資本，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其他資本主義分支，可以對它們進行分析。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目前形勢的特點是越來越無力處理這些矛盾。

主權債務危機揭示的是第一個矛盾。一般而言，資本不再關心在這個或那個國家的危機，因為其首要的當務之急是盈利能力和市場份額。事實上，既不是銷售點也不是生產線把跨國集團連結到一個特定的領土上，在困難的情況下，他們甚至會退居於他們的參照地。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情況下，國家的作用已經日益縮小，以確保一般的盈利條件。因此，雷諾首席執行官卡洛斯·戈恩，會在“金融時報”（2010年6月2日）撰文說“雷諾已經不再是法國的製造商”，但他立即措辭微妙地指出，“雷諾是法國的，雷諾在法國有其基地”（歐洲 1，2010年6月13日）[5]。事實上，法國政府在其汽車製造商有困難時，給他們注入了必要的資金。我們不再處在布哈林描述的一個世紀前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情況[6]，當它可以涵蓋國家和資本。

頗為新穎之處在於，跨國集團的地平線是全球性的，並不局限於國家甚至歐洲的範圍。布哈林生前談論“更高的保護主義”，對於他來說，這就是“聯合企業式的經濟政策的國家模式”。事情已經改變，我們不能責備他沒有預期到資本主義的轉變。對於提出貿易保護主義的“去全球化”的倡導者，這是不明顯的，仿佛生產的全球化並不存在。這種新的形勢產生了深刻的不對稱：政府在為“自己的”資本服務的，但後者則游離於一個動態內部市場的必要性之外。在此期間，政府繼續不顧一切地管理每個國家內部的階級關係。特別是這些政府現在負責確保其公民為危機買單。

第二個矛盾針對金融，銀行和政府。今天，出現針對主權債務和風險進行金融投機，這時金融本身表現為一個特殊的力量，反過來使銀行受挫，因為後者持有這些債務的很大一部分。這三個參與者（銀行，金融，

政府)之間的輪廓明顯地在變動,而且相當模糊。但這大多是些利益的衝突,是極不穩定局面的根源。歐洲資產階級內部發生的爭論,顯示了這種資產階級“治理”的深刻危機,它起於對希臘債務違約可能產生的影響的恐懼,它確實令人恐慌。政府搖擺於兩個目標之間:要讓人民給危機買單,但也要避免他們的銀行受挫。

所產生的風險是雙重的。希臘債務不可避免的違約,威脅著銀行,會讓它們承受難以評估的損失。今天,許多銀行的經濟學家都在做內部壓力測試,它比官方的模擬更接近實際,官方的模擬只是嘩眾取寵的東西。結果已經足夠讓一些銀行不安,因為這些銀行選擇對衝擊作預估,接受希臘債務的受控重組,直到下一次還債日。但歐洲央行捍衛的另一種觀點,絕對反對這種看法。其擔心的是危機延伸到其他瀕臨險境的國家,那些金額比希臘債務高得多。教條式的立場是首先拖延時間,以“保證金融市場”,希望困難國家的情況可以改善。

有一點是肯定的:暫時沒有人相信希臘有可能償還其債務。彭博社論是這樣強調的[7]:“即使希臘得到幫助,經濟反彈,政府也必須要運用占國內生產總值5%的預算盈餘,用約三十年的時間,把債務調低到歐元區規則允許的最高60%的水準,這不包括債務服務費用。僅僅用五年時間實現這樣一個財政的壯舉,不僅對希臘政府,對於任何一個政府都極為罕見”[8]。最新的救援計畫,只能略微改變這種局面。

社會民主的僵局

至少在起初,危機給了社會民主一些新鮮話題:凱恩斯主義,金融調節,銀行和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回歸,社會狀態在吸收經濟衰退上的作用,在收入分配和稅收上尋求更大的公平等等。危機似乎為社會民主黨開了一條路,重要的是要考慮,為什麼其空間沒有縮小,而政治空間也沒有擴大。

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也受到壓力的測試,而且也沒有通過測試。典型的情形是希臘社會黨總理帕潘德里歐,他面對危機的方式,極度可悲。他本來可以用一個手臂作摔跤比

賽,說:“希臘不會支付,所以我們必須談一談”。這是阿根廷在2001年暫停其債務時所做的,它贏得了重開的談判。但帕潘德里歐屈服了,未經討論接受了“三駕馬車”(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聯盟)的所有要求。

帕潘德里歐的例子不是孤立的。例如,根據法國社會黨議員帕溫奇·貝利斯(Pervenche Berès)的報告[9],還有薩派特羅,也有剛剛獲准的屬於綠黨和自由派的歐洲議會議員。在該報告的建議中,我們發現有報導,要求“採取措施,通過適當的結構改革,克服目前缺乏的競爭力”(…)呼籲“歡迎歐洲經濟政策的協調研討會的原則”(…),在其法文版裡,要求拆除貿易壁壘,必須在透明和互惠的基礎上開放公共合同。同時,“只要不損害會員國可能相當期待的稅收能力,稅收競爭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該報告“支持委員會努力解決有害的稅收競爭”。這種有害稅收競爭的新概念無疑變得重要。

特別影響婦女的貧困風險當然也提到,但奇怪是,其結論是訴諸現存的非政府組織。面對社會預算的削減,該報告扭扭捏捏地寫下這樣地文字:也“可以”期望保障公共部門的服務,即使合併公共財政,也要維持現有的社會保障水準。條件陳述式的使用意味深長。這裡有一些有意義的跡象,只是這些跡象發展得小心翼翼;因此,報告對委員會施加可怕的壓力,要求反思“歐元債券的發行”。

在法國,兩個主要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都同意緊縮。弗朗西·奧朗德得說很清楚:“到2013年,我們的公共帳目必須重新獲平衡(…)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說我不知道來自市場或評級機構的是什麼樣的壓力,而是因為它是我們國家找回自己信心的條件”。馬汀娜·奧布裡也加入了該行列,並承諾自己“在2013年,達到3%的水準,因為這是現在的規則”[10]。這個可怕的公式,說了很多,給社會民主黨深陷其中的僵局提供了鑰匙。從而可以總結出 --- 任何真實的社會民主計畫,將意味同資產階級的高度對抗,而這是社會民主黨不準備採取的方式。

面對這場危機,一個所謂的后凱恩斯主義

[11]學派認為，對工薪者更有利，同股東權力連接更少的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將有積極的影響。如果這些貢獻對於正確說明當前危機的原因，是非常有用的，他們就低估了其制度性質。特別是，他們繞開了社會需求和資本主義標準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問題，更不用說及金融。

目前的現實是，解決危機的任何進步成果都會被看成同資本邏輯的直接對抗，因而是一個更高層面的衝突。我們剛剛提及的例子表明，社會民主黨徒同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只有非常輕微的區別，實際上，處在他們拒絕越過的激進主義的最低門檻以外。

封鎖的地平線

任何經濟衰退都產生緊張情勢，因為要尋求重新增長，經濟政策轉向，會引發矛盾。在最近的“大衰退”情況下，更是如此，但衰退也是一個系統性危機的症狀：資本主義再不會像以前那樣運行了。回到“往常一樣的業務”或回到戰後受控資本主義的時代是不可能的。因此，該危機開啓的時期是以深刻的不確定性為特點。在由此而來的計畫中，資本主義面臨以下的障礙，在前面的文章中稱之為“困境”[12]：

1. 分配的困境：利潤的重新建立同增長的恢復相對立，而且往往與財富的不平等分配有關聯，這是危機的深刻根源之一。
 2. 預算的困境：清理公共赤字意味著削減公共開支，這個做法只能加劇經濟衰退的傾向，更不用提其社會影響。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說，“預算緊縮可能進一步減緩復蘇”[13]。
 3. 歐洲的困境：三重拒絕 --- 拒絕對公共債務的互利合作（mutualisation），這一來自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真正貢獻 --- 意味著歐元區的解體，不能排除出現一系列的違約。
 4. 全球化的困境：不平衡問題的解決，只能以世界經濟增長的放緩為代價才能做到。聯合國的報告已經指出，“世界經濟的復蘇被發達經濟體拖了後腿”，強調“對世界經濟的不協調做再平衡”的風險。這四大困境是緊密相連的，顯示一個資本主義的“混亂調節”，長期找不到一個能兼顧深刻矛盾利益
-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的退出危機的途徑。只有社會動員，可以防止資本主義為了退出這一僵局，進一步深化社會的倒退，把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推向極端。但是，這還要假定，這些運動依據於另一種觀點。由於後者意味著更高程度的對抗，今天，歷史性的任務是實現激進左派力量的團結，拋棄在抵制緊縮和同飄浮不定的制度邏輯決裂的目標之間架橋的做法。

►米歇爾·胡森是經濟學家，負責巴黎經濟社會研究所（IRES）的就業問題。他是左翼智囊團Copernic基金會的成員，也是阿塔克（ATTAC）科學理事會成員。他剛剛出版了‘純粹資本主義’（Un pur capitalisme），洛桑，2008年，第二版。詳見 <http://hussonet.free.fr>。

附注

- [1]見“在金融危機之前的企業盈利的下降”，hussonet 評論，第8期，2009年9月，<http://hussonet.free.fr/h8probou.pdf>
- [2]對於美國模式更詳細的分析，參見蜜雪兒·胡森，“美國：一個模式的終結”，突破第3期，2008年，<http://hussonet.free.fr/usbrech3.pdf> 和：“中國-美國。危機的不確定未來”，新社會主義第2期，蒙特利爾，2009年，<http://hussonet.free.fr/chimeri.pdf>。
- [3]見“美國模式的局限”，hussonet 評論第36期，2011年7月，<http://hussonet.free.fr/uslimits.pdf>
- [4]資料來源：收入增長時，誰獲益？經濟政策研究所，<http://tinyurl.com/whogain>
- [5]克勞德·傑克坤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工業危機：什麼意思？”中引用，新時代，第3期，2011年，<http://gesd.free.fr/tn3cj.pdf>
- [6]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1917年：<http://tinyurl.com/bukimp>
- [7]2011年6月29日，<http://tinyurl.com/unsavor>
- [8]參見“GDP的損失和危機的收費”，hussonet評論第35期，2011年7月，<http://hussonet.free.fr/pertepib.pdf>
- [9]關於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報告：有關措施和行動的建議
- [10]洛朗·摩迪，“再見，凱恩斯！萬歲，雷蒙·巴爾！”Mediapart，7月19日，2011年，<http://gesd.free.fr/krbl1.pdf>
- [11]因為，它處在像米哈爾·卡萊茨基，瓊·羅賓遜或路易吉·帕西內蒂這樣一些作者的傳統裡
- [12]米歇爾·胡森，“危機的新階段”，反潮流，第9期，2011年，<http://hussonet.free.fr/nouphase.pdf>
- [13]全球經濟的形勢和展望，ONU，2011年，<http://tinyurl.com/wesp2011>。摘錄來自本報告的法文摘要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39期，2011年8月號。

糧食危機根源探索

埃理克·杜桑



2007-2008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和糧食危機的爆發表明，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是多麼深。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們重新發表埃裡克·杜桑2008年11月寫的文章。

2007-2008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和糧食危機的爆發足以表明，世界經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

在第三世界國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過去兩年主要關心的並不是美國和歐洲銀行的金融危機，而是糧食價格的急劇上升。今年創紀錄的穀物產量，以及最近商品股票市場上食品價格的下跌，應不會創造一個虛假的安全感。“例如，如果目前的價格波動和流動性條件維持在2008/09年度，那麼播種面積和產量可能受到這樣的影響，即在2009/10年度出現一個新的價格飆升，引發更嚴重的糧食危機，其嚴重程度會超過近來所遭受的糧食危機，”這是糧農組織最近的一份報告

[金融危機將損害農業市場，糧農組織，2008年11月6日，羅馬，<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

...]所指出的。2009年較低的產量和較高的食品價格，可能會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讓他們難以獲得足夠的信貸和外匯購買農產品。糧農組織說，“出口融資變得更困難，因為銀行收緊信用貸款的發放條件。”

有關糧食危機的錯誤解釋，目前非常普遍。中國和印度的消費增加是一個反復述說的原因，以至於它變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我們迫切需要確定真正的原因，確定那些真正要負責的人。

非常受人尊敬的國際清算銀行在其2008年6月發表的年度報告[國際清算銀行是各大中央銀行的銀行，請參閱其網站：www.bis.org。有關國際清算銀行的說明，請參閱：www.bis.org/profile.pdf]上也講述了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消費量增加的老故事。首先，這種虛偽的追索有意隱瞞北方各國政府和跨國農業食品企業在增加生產生物燃料上的責任，其次，隱瞞大金融集團在商品市場投機的責任。國際清算銀行的作者試圖使他們的解釋科學合理化。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什麼是導致食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呢？“在食品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EMES，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GDP近年來的快速增長，在拉動需求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種效應因為結構性的變化而加強了，特別是在中國，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上升，增加了對穀物的需求，尤其是飼養牲畜的糧食需求的增加。根據糧食和農業組織估計，在1962年至2003年間，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穀物消費量上升了20%，而肉類則增加了三倍。糧食價格的需求效應被誇大了，因為根據一些估計，通過牲畜產生的熱量所需要的糧食，是通過直接消費糧食而產生相同數額熱量的2至5倍以上。在2002年，全球糧食產量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用來餵牲口的。”[國際清算銀行，第78屆年度報告，巴塞爾，2008年6月，第39面。]這個所謂的科學的解釋，其推理如下：發展中國家居民的消費急劇上升，這些人吃的肉越來越多，因此價格相應地上升。但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會在價格高峰期僅發生在2007-2008年，而發展中國家的消費量已大幅增加了40年？

實際情況是，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食品價格都在下降。在1998年和2002年之間它們進一步下降，在2002-2004年略有增加，然後在2005-2006年再次下跌[參見馬丁·沃爾夫在2008年4月30日的“金融時報”和雅克·貝脫落特提供的資料。同前引]。2006

年糧食收穫後，世界市場上的糧食價格在1998年的水準，遠低於20世紀70年代的水準。

2008年，按美元不變價值計算，糧食價格仍然低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達到的最高水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證實了這一點：“和通常的情況相比，目前的繁榮，有更廣泛的基礎，持續時間更長，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反差明顯，大多數商品價格呈下降趨勢。那就是說，儘管下降趨勢有明顯的逆轉，許多商品在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價格，仍遠低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所看到的水準”。

見 www.imf.org/external/pubs/ft...] 總之，需要解釋的是2007年和2008年的價格暴漲的原因。而國際清算銀行給出的解釋，完全不能解釋真正的原因。雅克·貝脫落特指出：“把食品的消費量增加，歸因於如中國和印度(…)這樣一些新興國家的生活水準的迅速提高，這是幾年來持續不斷的說法，但它並不能解釋過去兩年農產品價格持續上升的原因”[雅克·貝脫落特，同前引，第2面。]他繼而陳述說，直至2007年10月，大米價格都保持穩定。另一方面，2007年10月和2008年5月之間，大米價格幾乎增加了三倍。

那麼，在這裡，有三點，是最準確的解釋[這個解釋來自達米安·米勒和埃裡克·杜桑於2008年8月發表的文章，題為“為什麼有世界糧食危機？”]，
www.cadtm.org/spip.php?artic...]:

首先，面臨2005年以來穀物價格的歷史低位，美國和歐盟各國政府給予農業綜合企業發展生物燃料產業的補貼。這些公司希望在兩個方面增加他們的利潤：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穀物，以及讓生物燃料生產有利可圖。在這兩方面他們都獲勝了。

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他們從以下假設開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用石油不再可能做到（因為現有的石油儲備萎縮）的事，可以用大豆，甜菜，穀物或甘蔗做到。因此，他們要求國家當局給予補貼，以便使非常昂貴的生物燃料生產變得有利可圖。華盛頓，在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和其他的歐洲資本家一

致聲稱他們能保障自己的國家或地區的能源獨立[請再次注意該“雙重標準”政策：為確保能源安全，北方國家政府迅速補貼私人行業，但是卻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否認南方國家政府資助其當地的農業或工業部門生產者的權利。]生物燃料的遊說捐客們說服政府採用了荒謬的論點，即同碳氫燃料相反，生物燃料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種支持政策把大量基本食品吸入生物燃料行業。同樣，以前用於生產食品的土地被轉而用於生產生物燃料。這也限制了可用的食品供應，引起食品價格上漲。總之，為滿足少數有意發展生物燃料生產的私營公司的利益，決定劫持世界糧食生產的急需部分。應當指出，上面引述的國際清算銀行年報，在解釋食品價格的上漲原因時，認為國家補貼的生物燃料只起了輕微的作用[國際清算銀行，第78屆年度報告，巴塞爾，2008年6月，第41面]。

其次，在2007-2008年，農產品的投機炒作非常厲害，使互聯網泡沫破滅後本世紀初開始的這個趨勢得以加強。2007年夏天，次貸危機震撼美國，機構投資者[主要的機構投資者是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銀行：他們可以調動700,000億美元，投資在回報率最高的地方。不要忘記對沖基金，它可以調動15,000億美元。]逐漸退出依靠美國住房產業的債券市場，認定農產品和生物燃料可能帶來高額回報。他們在世界穀物投機活動的主要市場---芝加哥，坎薩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股票市場購買了作物期貨。同樣，他們還在其它市場購買了石油和天然氣生產期貨，投機於價格上漲。

第三，發展中國家處境軟弱，難以應對糧食危機，因為債務危機以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的政策，剝奪了他們自己必要的保護力。這些政策包括：減少作物種植用地，專門做一或兩個出口產品，拆除價格穩定系統，結束穀物的自給自足，結束穀物儲備，使地方經濟依賴世界市場的變化從而削弱它們，大幅削減社會支出，抑制對大宗商品的補貼，開放市場，讓小農戶與跨國公司作不公平的競爭。

一些錯誤的解釋

雅克·貝脫落特列出了一串舉證，以加強說明新興市場國家消費增長的神話，特別是中國和印度，是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所有這些舉證都是來自雅克·貝脫落特的研究]。

2008年4月15日的商業日報“回聲報”(Les Echos)說：“這個新的現象，主要來自新興國家消費習慣的快速變化。隨著收入的增加，中國和印度兩大巨頭，對肉類和穀物的需求在增加”[[www.lesechos.fr/info/agro/47 ..](http://www.lesechos.fr/info/agro/47..)]。

2008年4月17-23日的‘新觀察家’把“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飲食習慣的改變”作為七個原因中的第一個，並補充說：“印度和中國已經從糧食出口國變成了進口國”。

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雅克·迪烏夫同印度農業部長沙拉德·帕瓦爾會晤後，在2008年4月8日的非洲-印度論壇上聲言：“世界穀物庫存量只能夠滿足僅僅8個到12個星期的需求”，而原因是“由於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有較高的需求，這些地方GDP的增長為8%至10%，而增加的收入會用在食品上”[www.nationalpost.com/news/wo]。愛荷華州的生物柴油委員會主任蘭迪·奧爾森則認為：“豆油價格較高的原因是中國，印度和其他地區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的需求在增加”[[www.desmoinesregister.com/ap ...](http://www.desmoinesregister.com/ap...)]

同樣，對於“為什麼食品價格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國際農業發展研究合作中心(CIRAD)研究員薩科·布利卡斯回答說：“中國和印度消費者的習慣正在發生變化，那裡的購買力在上升。其結果是需求爆炸性地增長。希望買得更多，吃得更好。他們吃更多的肉。為了飼養他們的牲畜，農民需要種植更多的飼料作物。這一切都有助於整體價格的升高。在國際範圍內，農產品關稅也大幅上漲，因為對它們的管制已經放鬆”[見www.lexpansion.com/economie/..]。在2008年4月22日的‘世界報’(Le Monde)上，對於“是兩個新食人魔(中國和印度)的到來，是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暴漲的主要原因

嗎？”這個問題，菲力浦·查爾敏乾脆回答“是”[見[www.lemonde.fr/archives/arti ...](http://www.lemonde.fr/archives/arti...)]。

在同期的“世界報”，菲力浦·勒梅特以同樣的口氣繼續說：“缺乏基礎設施，使得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失去了約30%的收成，並再次成為糧食淨進口國”[見www.lemonde.fr/opinions/arti]。

2008年4月18日巴西總統盧拉向糧農組織發話：“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告訴我，因為生物燃料，糧食變得昂貴了。糧食昂貴，那是因為世界沒有準備看到數百萬的中國人，印度人、非洲人、巴西和拉丁美洲人一天吃三頓”[見www.lemonde.fr/ameriques/art]。

糧食價格飛漲不是中國和印度的責任

中國和印度出口的糧食比進口的更多。雅克·貝脫落特用數位證明這一點，顯示中國仍是一個糧食(小麥、玉米、大米)和肉類的淨出口國！印度也是一樣。自1995年以來，印度人已經成了糧食產品淨出口者。因此，這兩個國家不可能是世界市場上糧食價格飆升的根源[見www.lemonde.fr/ameriques/art]。

印度受害於進口自由化的後果

在小麥進口方面，印度的自由貿易經歷，一直是非常不利的[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27面]。在其世界貿易組織(WTO)夥伴的壓力下，印度的辛格政府---辛格自己是新自由主義的好學生---取消了小麥的進口關稅，該規則自2006年2月起生效。自2001年以來，這是第一次，這一年印度小麥的進口(670萬噸)多於出口(0.6萬公噸)。這是印度政府方面的一個深思熟慮的政策，因為它希望滿足兩個需要：求得其世貿組織合作夥伴的支援，在世界市場上以比地區生產者賣價更低的價格購買小麥。

印度政府直接從國外購買了550萬公噸的小麥，而這個時候，其全國的生產已經足夠滿足國內需求(印度小麥產量達到7千4百萬公噸，而國內需求只有6千萬公噸)。因為商

人的投機囤積，在國內市場上小麥價格不降反升。辛格政府的這種惡劣行徑，導致其對手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迫於民眾的憤怒和輿論的壓力，總理在2007年退縮讓步了。

我們應該注意到，儘管印度在2006年成爲一個小麥淨進口國，但由於大米和玉米的出口，它仍然是穀物淨出口國。

由於缺乏中國的數據，媒體開始改變策略。

2008年8月19日，法國財經日報‘回聲’（Les Echos）報發表了題爲“食品價格上漲：中國認爲無關其事”的文章。借鑒經合組織的統計數字和北美農業部出版的一位北美研究者的研究，法蘭西日報表示，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尤其是在穀物方面。與此同時，英國的新自由主義週刊‘經濟學人’，在其2008年8月16日版上刻意安排了一場盛大表演，專說一件事情，而且在同一段落裡自相矛盾：“中國食品和能源的巨大需求，推高全球的商品價格，這個說法有道理。”接下來的幾行後面，經濟學家的社論繼續說：“在過去幾年，中國的糧食生產增長速度高於消費速度。作爲一個小型但增長中的小麥，玉米和大米的淨出口國，不管如何，中國有助於緩解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真是不折不扣的智力體操！

美國和歐盟的政策是全球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

雖然中國和印度食品的出口超過其進口，但美國和歐洲聯盟卻相反[回到貝脫落特的文章，他所做的8個頁面的研究顯示，美國和歐盟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食物貿易並不平衡。]。2006-2007年期間，美國是食品淨進口國。歐盟國家也是這樣，它們在淨穀物進口國的名單中名列第三（僅次於日本和墨西哥）。因此，來自美國和歐盟的需求有可能把價格哄抬起來。

但是，特別地，美國和歐盟是如何造成食品價格的上漲的呢？

首先，必須考慮到，在決定全球糧食價格（糧食，石油生產的穀物，含有豐富蛋白質的穀物）上，美國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爲其他國家根據芝加哥，堪薩斯市或明尼阿波利斯的股市調整其價格[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3頁]。

此外，糧食價格的上漲，直接推高肉價 因爲家畜飼料來自穀物[2006年1月至2008年4月以來，牛肉價格上升47%，雞肉價格上升42%，羊肉價格上升31%。還要指出的是，中國人特別喜歡的豬肉，其價格一直停滯不前。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6頁。]

在2006-2008年食品價格的惡劣上漲這件事上，直接依賴於美國和歐洲的兩個因素都起了作用。

首先，在美國和歐盟，存在持續擴張性的生物燃料生產。其次，是股票市場上針對食品價格（還有碳氫化合物[提高碳氫化合物的價格也直接影響食品價格，因爲生產費用（運輸，使用的工具，化肥）增加了。]）的投機。

美國生物燃料生產的大規模興起

2007年，美國生物燃料生產占全球的43% [其次是巴西，其生物燃料生產占32%（巴西的情況，下面有進一步的討論），歐盟的15%，中國的3%，印度和泰國各占1%。世界其他地區占5%。]。2005年和2006年間，在美國，用玉米生產的乙醇，擴大了5倍。在2005年和2009年之間，這個生產因此增加了9倍！在2005-2006和2007-2008年之間，專門用於乙醇生產的玉米，其百分比從14.4%升到23.7%。

一部分大豆生產，也轉向生物燃料的生產（2007年8月，23.2%的國內大豆油的消費專門用於生物柴油的生產），但其成本遠高於玉米乙醇。以前用於種植小麥和大豆的大片土地，現在轉而用來生產玉米，從而推高了小麥和大豆的價格。自從很大一部分的玉米轉而用於生產乙醇以來，動物和人類食用的玉米價格也飆升了。同樣，因爲種植玉米，大豆，小麥和其他牧草穀物變得更加有利可圖，所以大米產量下降，於是美國生產的大米價格也隨著飆升（見框圖）。

生物燃料生產的增加與自由市場無關，它純粹是政府在農業綜合企業的壓力下，直接干預的結果。

儘管油價上漲，但沒有美國聯邦預算的補貼，生物燃料的生產是不可能賺錢的。200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能源法，推動了生物

燃料的生產。2007年9月19日的能源獨立法加強了這個支持政策，能源獨立法實際上威脅石油工業，如果到2015年，他們的燃料生產中不包括570億升生物燃料（150億美制加侖[1美制加侖= 3.78升]），以及到2022年，若不包括1360億升生物燃料，就將處以嚴厲的處罰。爲了達到這個目標，2011-2012年，註定用於生物燃料生產的玉米將達到32.8%。

由於這種僵硬的法律，在2007年，由大型農業綜合企業公司主導的美國農業行業的收入增長了48%。關於美國在全球糧食危機上的責任，我們同意雅克·貝脫落特的論述：

“美國是農產品價格上漲和當前糧食騷動的無可否認的重要原因，因爲它的生物燃料生產的政策沒有理性，還有，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美國穀物的價格要對世界市場穀物價格的上升負責，因爲其他出口國根據它的價格而定價。”[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32面] 我們稍後將看到，投機活動，特別是在美國盛行的投機活動，它們的作用也必須考慮在內。

美國生物燃料的增加導致全球大米價格上升的過程。[本節內容取自雅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9面]

對稻米的投機活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乙醇的熱潮也要對大米價格的暴漲負責，儘管常見的實際做法是否認兩者之間的任何聯繫。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說法，雖然美國大米只占全球產量的2%，它仍然是第四大大米出口國…在2007/08年度，美國生產的糙米價格是1980 /81年以來最高的。另一方面：“自2005年以來，非常高的燃料和化肥價格，以及2006/07年度以來，競爭作物的超高價格，使得水稻無力同大豆，飼料穀物和小麥競爭” [參見 <http://www.ers.usda.gov/briefing/Ri> .]

事實上，2006年和2007年間，在耕地下降16%後，美國的大米產量下降了12%，結果美國的大米出口下降了20%，儘管美國出口的大米僅占2006年全球出口的12%和2007年的9.6%。然而，達瑞爾·雷（Darryl Ray）等人證明，美國是世界大米價格的“價格制定

者”：“84%的泰國大米價格的變化，可以用德克薩斯州的價格和美國大米庫存量與利用量之比來做解釋，而美國的價格每增加10%，將導致泰國的價格增加4.7%。這種關聯性是令人信服的證據，它表明，即使在美國不是主要出口者的地方，美國的商品交易也會影響世界市場的價格” [見 <http://agpolicy.org/blueprint/APAC%...>].

歐洲聯盟的責任

正如雅克·貝脫落特所寫的：“歐盟27國[2008年的歐盟是由27個國家組成的] 在鼓吹餵養世界各地的願望的同時，又高調宣揚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威脅幽靈！這是可悲甚至可笑的，實際上，事實表明，歐盟甚至超過了美國，獲得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糧食援助”。[見貝脫落特的文章，第38面]

在農業企業的壓力下，歐盟採取了同華盛頓政策類似的政策。到2010年，所有燃料的5.75%必須是生物燃料（到2020年爲10%）。歐盟生產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是菜籽油（歐盟產生全球77%的生物柴油），生產乙醇的原料是是小麥，大麥，玉米，甜菜和蒸餾過剩的葡萄酒。歐洲生物燃料的生產是不盈利的，只能靠補貼維持下去。爲了達到上面提到的目標而不必訴諸進口，到2012年，目前使用的可耕地的20%，將被投入用於這個項目。

歐盟希望人們相信，這一政策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而，根據許多科學家的看法，生物燃料的環境成本超過了所有它們可能提供的好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9月12日公佈的一份報告中申明，就其本身而言，“目前推動擴大使用生物燃料的做法，是在製造不可持續的緊張局勢，會擾亂市場，卻不會產生顯著的環境效益… 各國政府應停止爲生物燃料制定新的硬性規定，並且研究把它們逐步淘汰的方法 … ”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429..>]. 聯合國食品權利的特別報告員奧利維爾·德·舒特寫道：“其實，某些類型的生物燃料的使用，不是去幫助對抗氣候變化，反而可以加快這一進程” [奧利維爾·德·舒特，在2008年9月6日和7日的“今晚”報（Le Soir）上

的文章，題為：《必須停止對農業燃料的投資計畫》，
http://www.lesoir.be/forum/cartes_b...。]

中國，印度和巴西生產的生物燃料，對糧食價格的飛漲有重要影響嗎？

中國：直到2006年，中國是全球第三大的以玉米為原料的乙醇生產者（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歐盟），但到了2007年6月，中國當局禁止所有新的玉米乙醇的生產，以解決國內市場上豬肉價格上漲42%的問題。在2007年，中國的乙醇生產有效地下降了50%。雅克·貝脫落特別指出：“雖然，儘管有以玉米為原料的乙醇生產，中國還是在2007年出口了大量的玉米，不能因為全球穀物價格的通脹而指責其乙醇生產。而且在2006年它只生產了50 000噸的生物柴油，而不是預計的，在2010年達到的200萬噸，其生物柴油的生產不能對含油植物價格的暴漲負責”[J. 貝脫落特的文章，第23面]。

印度：就像它的北美和歐洲的同行，印度政府也要命令其石油工業到2010年納入5%的生物燃料，到2025年納入20%。到2006年，印度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生物乙醇生產國，但在2007年，印度的生產不折不扣地垮臺了（從19億升下降到2億升，幾乎減少了90%）。雅克·貝脫落特總結說：“因為生物乙醇生產會生成甘蔗糖蜜，而且印度出口食糖，自2006年以來其價格已下降，直到2008，都沒有越過其2007年的水準，所以我們不能因穀物價格暴漲而責怪印度”[J. 貝脫落特，第29面，參見<http://www.grain.org/agrofuels/?ind..>]。此外，印度決定用非食用植物麻瘋樹的種子，生產生物燃料。

不過，據貝脫落特的研究，這項計畫未能成功，因為政府把生物燃料的價格定得低於生產成本。必須指出，“印度農業合作社和非政府組織為保護環境，堅決反對生物燃料的發展，不管是用麻瘋樹還是用第二代纖維素的最終產品生產”[J. 貝脫落特，第29面，參見<http://www.grain.org/agrofuels/?ind..>

]

巴西：全球第三號生物燃料生產者，巴西僅次於美國和歐盟，大大超過中國和印度。事實上，它產生的生物燃料多過中國的10倍，超過印度30倍。到此為止，巴西生產的絕大多數來自甘蔗（一個非常小，但越來越重要的比例是從大豆中提取的）。以甘蔗為單一作物的耕種發展，其環境和社會影響顯然是不利的，因此，巴西當局的政策遭到了眾多社會運動的高度批評。然而，不能證明，以甘蔗為基礎的生物燃料的生產是全球糧食價格增加的一個因素，因為自2006年以來，食糖價格持續下跌。

總之，雖然從環境或社會的角度來看，中國，印度和巴西的生物燃料生產[即使巴西沒有糧食價格飛漲的責任，但其農業綜合企業出口行業產生巨大的利潤。在2007年和2008年，巴西來自農業出口的收入大大地增加了]，非常值得商榷[硬性指定耕地用於生產生物燃料的農田，這種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限制農民耕作可以用於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此外，甘蔗生產掌握在大地主和資本主義農業綜合企業的手中，他們會濫用榨取農業工人，不讓無地農民獲得自己的土地。還有到處存在的環境的負面因素。舉兩個例子：來自甘蔗收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為它可能當場燒毀），以及森林的大規模砍伐創建 --- 特別是在亞馬遜雨林 --- 其目的是擴大蔗田]，但它們不應對食品價格的暴漲負責。

投機行為在食品價格膨脹中的根本作用

美國證券交易所是世界商品價格（農產品和原材料）的談判場所，這裡的投機活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這種投機的主角都不是散户，而是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還有被解散或被收購以前的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對沖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主權財富基金是公共機構，除少數例外，它們屬於像中國或石油出口國這樣的新興國家。

第一批主權財富基金[創建於20世紀的下半葉，是想要保存來自石油和加工品那部分收入的政府建立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儘

管它們比重比機構投資者少得多[在全球範圍內，在2008年年初，機構投資者占7萬美元。

(原文70 000 USD，疑為70 00 billion USD，即7萬億美元---譯者)，主權財富基金的30 000億美元，對沖基金1 000美元(原文1 000 USD，疑為1 000 billion USD，即1萬億美元---譯者)。]

麥可·W·馬斯托，管理華爾街一家對沖基金12年，2008年5月20日，在華盛頓的國會委員會前的陳述[麥可·W·馬斯托，管理成員/投資組合經理掌握資本管理，LLC，在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上的證詞

[http://hsgac.senate.gov/public/fil ...](http://hsgac.senate.gov/public/fil...)]證明了這個事實。該委員會要調查投機炒作對商品價格上漲可能發揮的作用，在該委員會面前，他宣稱：“你們要問的問題應是‘機構投資者促成了食品和能源價格的膨脹嗎？’我的回答是‘不錯，是這樣的’”。

在這個確定的陳述中，他解釋說，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原因不是供給不足，而是因為商品市場上“期貨”交易的新參與者的需求突然增加。在期貨市場，投資者購買未來的產品：現在購買的是一或兩年後的小麥收成，三年或六年後的石油生產。從理論上說，在這些市場的主要投資者，例如航空公司，購買他們需要的石油，或農業企業，它們購買特定的穀物。然而，麥可·W·馬斯托表明，在美國，由機構投資者調撥給商品指數交易的資產，從2003年年底的130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3月的2600億美元[“分配給商品指數交易策略的資產，已經從2003年年底的130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3月的2600億美元”。]

在同一時期，在這些市場上市的25種商品的價格上漲了183%。他解釋說，必須處理一個狹窄的市場[在2004年，所有25指數商品中，表現突出的未來合約的總值只有1800億美元。同世界各地股票市場的總額44 0000億美元比較，後者超過前者240倍。麥可·W·馬斯托指出，在這一年中，機構投資者在期貨市場投資250億美元，占該市場的14%。他表示，在2008年的頭三個月，機構投資者大大增加了他們在這個市場上的投資：在

52個工作日投入\$ 550億美元。現在有一種方法煽動物價膨脹！]。

像養老基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只需要分派2%的資產，就能撼動該系統。商品期貨市場上的價格對這些商品的當前價格有立即的影響。他表明，2007年和2008年間，機構投資者購買了大批量的玉米和小麥，導致大規模的價格上漲[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期貨市場的管理機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不認為期票投資者是投機者，反而把他們當作商業市場的參與者。

這使他們能夠加強這個事實，即對於糧食價格的飛漲，投機活動沒有顯著的影響。在前述的麥可·W·馬斯托文章中，以及尤其是在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邁克爾·格林伯格2008年6月3日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證詞中，可以發現對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批評。從1997年到1999年，邁克爾·格林伯格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一個部門的主管，他批評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現任主管們鬆懈，無視機構投資者操縱能源價格的現象。他列舉了由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傀儡們提出的一系列申明，這些傀儡們在虛偽白癡者中不會沒有地位。

邁克爾·格林伯格認為，在美國股市，所有能源方面的交易中有80%到90%，是投機性的(第22頁)。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邁克爾·格林伯格，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關於“能源市場的操縱和聯邦執法制度”的證詞，2008年6月3日。] 2008年9月22日，在美國金融危機的核心，布希總統宣佈了一項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畫，大豆價格因為投機活動上漲了61.5%！

雅克·貝脫落特，在他的研究中用了六頁談到投機活動的作用，也表示，投機活動對價格的上漲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J.貝脫落特的文章，第51至56面]。此外，他還用比利時KBC銀行做例子，這個銀行開啓了一個廣告運動，目的是推銷一個新的商業產品：把它們的積蓄投資在6個農業原材料上。為了說服客戶購買其投資基金---“KBC-生命 MI 安全食品價格 3”，KBC的廣告肯定：“利用食

品類商品上漲的價格！”這則廣告中以一個“機會”的樣式展現“水和可耕土地的短缺”，因為現在“食品的短缺導致食品類商品的價格上漲”
<http://www.lalibre.be/index.php?vie..>】。

工業化國家和他們主宰的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所施加的貿易協定，削弱發展中國家應對不斷上漲的糧食成本的能力

在2007-2008年，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發現他們的生活條件急劇惡化，因為他們面臨食品價格的大幅增加。在2008年上半年，這至少在15個國家引發了大量抗議。受饑餓影響的人數，已增至幾千萬，數億人發現他們獲得食物的途徑受到極大限制（因此，還難以獲得其他重要商品和服務[其實，為了購買價格急劇上升的食品，貧困家庭不得不減少醫療和教育開支，以及削減各種家庭需要。]）。造成所有這一切的，是農業綜合企業部門的小型企業集團（生物燃料生產商）和金融部門（操縱農產品流通的機構投資者），他們獲得來自華盛頓和歐洲委員會的政府資助。

然而，世界糧食產品的出口依然疲弱。在全世界，只有極少量生產的大米，小麥和玉米出口，絕大多數都是當場消耗掉。例如，樂施會（Oxfam）聲稱，關於水稻的情況，“只有4~5%的水稻生產在世界市場上出售”[見www.madeindignity.be/Public/ ...]，而有近20%的小麥產量是出口的[參見www.fimarc.org/Fiche1BLE.pdf]。然而，地區市場上的價格是由出口價格決定的。

此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價格基本上都是依據3個美國交易所（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何坎薩斯城）而建立的。因此，在廷巴克圖，在墨西哥，在奈洛比和在伊斯蘭馬巴德的水稻，小麥或玉米價格直接受到美國交易所上這些作物價格變動的影響。2008年，因為害怕被巨大的社會起義推翻，全球發展中國家當局都緊急採取措施，以保證他們的公民獲得基本的食品。

我們到達這個地步，那是因為幾十年來，政府逐步停止支持這些作物的地方生產商 --- 其中大部分是小生產者 --- 並且遵循世

界銀行這類機構提供的新自由主義成功藥方，或者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和減貧行動計畫。這些這些機構自稱與貧困作鬥爭，說服政府推動再造甚至強行製造貧窮的政策。此外，在過去幾年，許多國家政府已簽署了雙邊條約（最顯著是自由貿易條約），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的貿易談判也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是怎麼回事？

第1條。發展中國家放棄海關的保護，從而使當地農民遭受到國外農業生產者的競爭，主要是北美和歐洲的大型農產品出口企業的競爭。這些大公司，用實際上比當地農民和育種者產生相同食品的成本更低的價格銷售農產品，入侵本地市場，從而導致他們走向破產（許多人遷移到自己國家的大城市，或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資料，北方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提供補貼給其大型農業企業，這個事實不是反傾銷規則的違規行為。就像貝脫落特所寫的：“雖然街頭的人都知道，低於生產成本價格的出口是傾銷，對於世界貿易組織OMC來說，只要出口價格與國內價格相同就不是傾銷，即便這個價格低於生產成本。”

總之，由於巨大的國內補貼，歐盟各國，美國和其他出口國家可以侵入其他市場。一個象徵性的例子就是，美國的玉米出口到墨西哥。由於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NAFTA），後者放棄了它和其北方鄰國之間的海關保護。1993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前的一年）和2006年之間，從美國到墨西哥的玉米出口量增長了9倍。億萬墨西哥家庭不得不停止玉米生產，因為國內玉米成本超過從美國來的玉米（依靠工業技術和巨額補貼而生產的）。這不僅創造了一個經濟戲劇，但也導致了一種身份的喪失，因為玉米是墨西哥文化的象徵，是瑪雅人最顯著的東西。廣大種植玉米的農民放棄他們的田地，在墨西哥和美國的工業城市尋找工作。

第2條。墨西哥不得不依靠美國玉米養活其人口，因此沒有準備好面對在玉米價格的暴漲，暴漲的原因，部分來自於芝加哥，坎薩斯城，明尼阿波利斯市場的投機活動，部分來自

於其北部鄰國的玉米乙醇生產。不再有墨西哥玉米生產者工作，以滿足其國內需求，墨西哥消費者不得不面對他們主食---玉米餅價格的爆炸性增加，玉米餅是用玉米製作的薄烤餅，相當於世界其他地區食用的麵包或米飯。2007年，巨大的工薪階層的抗議震撼了墨西哥。

這些不同的事件表明，有必要說清楚替代性的主張，本研究的最後一節，提出先遣工作組就農民組織‘農民之路’設立的“糧食主權”而引出的臨時結論。這些主張仍在研究中，不過（還）沒有被‘農民之路’的領導人採納，因此，在被採納之前，這些主張也可能遭到部分的或大部的修改。筆者在這裡討論現有的結論。

另一類主張

食品安全開始於穩定的糧食價格，該價格涵蓋了生產成本，以及確保生產者生活的工資。由西方國家政府推動的低廉的價格模式，其目的是增加加工產品和服務（旅遊，娛樂，電信等）的大眾消費，既不是社會也不是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得益者是大公司，並且通過把人民的注意力從民主理念轉向大眾消費，從而讓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搶佔權利。[本節題目為‘另一類主張’，它出自《‘農民之路’關於農產品價格和投機活動的立場檔》，2008年7月]

面對當前的糧食危機和環境危機，必須作出根本性的改變，還要快速。下面列出的建議，對於以糧食主權為基礎的農業和商業政策是可行的。它們能夠在保證大部分國家的可持續糧食生產的水準上，穩定糧食價格。

在地方一級：支持地方農業生產，特別是，支持農業實踐和幫助小生產者獲得信貸，無論其男女。

支持和發展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短捷/直接的行銷管道，以確保價格讓農民有利可圖，而消費者又負擔得起的

鼓勵本地產品的消費

支援更加自主的生產方式，這些方式受價格波動的影響，少於使用化肥（例如，培育牧草而不是玉米/大豆，）的生產方式。

在國家一級：

國際法允許國家實施單方面的主權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農業，並保證其利用自然資源的主權。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承認食物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確保這一基本權利優先於商業法，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可運用環境根本性的變化（食品價格上漲，氣候變化）或不可避免的必要性（維護社會秩序，讓人們實現基本需要的滿足）的法律觀念，退出威脅其人民糧食主權和安全的條約。以下主張就基於這一法律框架。實施這些措施，是各個政府的責任。

重新建立支持家庭農場生產的政策

- 不簽，如果需要的話，或者終止，與糧食主權衝突的多邊（WTO）或雙邊（ALE和APE）的自由貿易協定
- 建立或重新建立農產品進口的限制
- 在每一個國家建立公共糧食儲備
- 重新建立保證農產品價格穩定的機制
- 建立生產調控政策，以穩定農產品價格
- 控制仲介機構的利潤空間
- 進行全球土地改革（農田，還有水和種子），確保為當地居民生產糧食的農民而不是為出口而生產的大公司使用資源
- 禁止糧食投機活動

在國際層面：

- 禁止糧食投機活動；對人的生活作投機活動，這是一種犯罪行為，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需要停止對農產品的投機性投資
- 在國際法上加上一條糧食主權法，使每一個國家制定自身的農業政策以保護其農業又不損害其他國家的權利獲得正式承認（主要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 聲明暫停生物燃料的工業生產
- 建立或重新建立國際組織，以規範市場和主要出口產品的生產（咖啡，可哥豆，香蕉，茶葉等生產國的聯盟），保證物價在國際水準上的穩定

- 終止迫使各國放棄糧食主權的結構調整方案（SAP）
- 終止外債機制所造成的剝削，改革歐盟農業政策和美國農業法案，這兩者都對農產品市場帶來災難性的後果。[53]

結論：

這項研究提供了另一種觀點，即目前主流的說法‘中國和印度應對糧食危機負責’是一個轉移焦點的做法。

事實上，特別是美國的大資本的利益行為，並在較小程度上，西歐的大資本的利益行為，是糧食危機的真正原因。更具體地說，投機於食品和碳氫化合物的機構投資者，和強力地推動生物燃料生產的大型農業企業，應對食品價格的上漲負責，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增加了自己的利潤。

世界糧食危機揭示了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背後的推動力：追求個別短期利潤的最大化。對於資本家來說，食品不過是按照利潤盡可能高的價格做買賣的產品。人類生存的必需品食物，也因此被降低成一個簡單的利潤生成工具。必須停止這一致命的邏輯。必須遏制主要市場和生產的資本據點。世界糧食危機 --- 在目前的經濟危機和氣候變化的情況下，它造成的後果只會更糟 --- 呼籲整個地重新訂立根本的公共政策。這個前進方向關係到整個人類。

2008年11月21日

裘蒂·哈裡斯，布賴恩·亨特和帝仁·瓦雷登與伊莉莎白·安妮合作翻譯。

筆者大量引用了雅克·貝脫落特卓越的57頁研究，其題為：“世界商品價格暴漲的真假辨”（*Démêler le vrai du faux dans la flambée des prix agricoles mondiaux*），該文發表於2008年7月15日。請讀者閱讀全文：www.cadtm.org/spip.php?artic 筆者還希望感謝丹尼爾·穆訥瓦（Daniel Munevar）關於投機作用的研究資料。作者還參考了如下資料：讓·齊格勒和他2008年5

月以後的繼任者奧利維爾·德·舒特權的聯合國食品權利特別報告，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糧農組織，“經濟學家”，金融時報，和這篇文章明確引用的其他出版物。最後，筆者要感謝‘農民之路運動’糧食主權委員會2008年7月21日至24日在加那利群島舉辦的研討會的討論，他作為一個演講者出席了研討會。當然，本研究的內容由作者負唯一的責任，同所引用的個人和組織無關。

✦ 埃裡克·杜桑，取消第三世界債務運動（CADTM）比利時委員會主席（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ird World Debt, www.cadtm.org），列日大學（比利時）和（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政治學博士。他著有：南方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替代方案，VAK出版社，孟買，印度，2007年；世界銀行：一個關鍵的引物，冥王星出版社；字裡行間出版社，大衛·菲力浦出版社，倫敦-多倫多-開普敦出版社 2008；你的錢或你的生活：全球金融的暴政，Haymarket出版社，芝加哥，2005年。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35期，2011年4月號。



仇恨製造廠：歐洲的排外心理和種族主義

恩佐·卡瓦索

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不是“不想消逝的過去”的殘留物，也不是要挽救使它們產生的條件免於消失的復古情緒。20世紀的大災難還沒有讓我們對於歧視的誘惑有免疫力，沒有讓我們不去排外，沒有讓我們有時不從對多樣性的憎恨中獲取樂趣。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的排外心理深刻地同種族主義的歷史相聯結，種族主義的現代性地基修改了其形態但沒有改變其功能。所以有必要在種族主義的歷史背景下，確定它的其它形式，以瞭解今天它是如何延續自己的。

種族主義常常被視為一種病態而不具有正統的現代性。我們必須明白，為了同它作鬥爭，必須要質疑一個社會秩序和一個文明模式，而不只是質疑種族主義的一個變形或變態。因此，這就有必要從一個現實開始，這個現實就是：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的成功，並不是由於其真實性或其客觀描述現實的能力（它們可能會給出一些答案，但從倫理角度看，根據眾所周知的道理，這些答案是虛假的或不可接受的），而是因為它的效力，因為它運作的性質。

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是一個構築象徵性敵人——塑造成負面的角色——的過程，旨在滿足一個身份的搜索，一個歸屬的願望，一個安全和保護的需要。揭示其作用機制，譴責其謊言，當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足夠的（常常是無用的），因為它們的影響力，既不是基於認知的真誠，也不是基於理性的論據——即便它們顯現為“客觀”話語的形式時也是如此——而是基於一個不同的方法，依靠對替罪羊的搜尋。

種族主義在十八世紀末出現，然後與現代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共生共存，在上個世紀達到它的極盛時期，當時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反猶主義的結合導致了末日的滅絕。皮埃爾-安德列·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這個人今天已經完全成了新保守主義的右派——有一次有個直覺，即：當代種族主義話語有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變態，放棄了它的等級“種族主義”的方向（根據哥比諾，張伯倫，拉普奇或龍勃羅梭的舊模式），成了隔離性種族主義和文化種族主

義。換句話說，它已經從“種族科學”下滑到本民族中心主義[1]。然而，這些變化並沒有修改社會拒絕和道德排斥的舊機制，歐文·戈夫曼把這個機制歸納為恥辱觀念[2]。

在20世紀90年代，種族主義在歐洲又強力出現了，根本無視普世遵行的正式禮節，而這些禮節讓政治宗教當局以及修女們圍繞著“紀念的責任”舉行儀式，派出我國高校的青少年參觀納粹死亡集中營。如果種族主義回到舞臺的中心，那並不是“因為移民”這個眾所周知的老一套說法，而是像阿爾貝托·布林吉奧所寫的那樣，因為它屬於“歐洲現代性的遺傳密碼”[3]。

但種族主義延續自己的方法是披上一張新皮，給其用之不竭的排斥和仇恨“文章”加上新的篇章。二十世紀的上半年出現在歐洲的錯綜複雜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不再存在。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仍然在歐洲聯盟新成員國中增長，在這些國家裡，它們可以更新在1945年中斷的歷史，並培養“真正社會主義”四十年所積累的怨恨。在歐洲大陸的這一部分，他們聲稱是20世紀30年代獨裁體制的後裔，像匈牙利的屈比克（Jobbik），他接過箭頭十字架（the Arrow Cross）的遺產，要讓人漸漸想起霍爾蒂元帥，或者像大羅馬尼亞黨，或者像安特·帕韋利克（Ante Pavelic）的烏斯達莎（Ustashi）運動的繼承者克羅地亞權利黨（HSP）那樣，挖出一個舊的復仇主義和擴張主義神話。

然而，法西斯主義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在西歐，在那些曾是它歷史搖籃的國家，幾乎不存在。在德國，新納粹運動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幾乎為零。在西班牙，那裡的弗朗哥主義（Francoism）的遺產是由人民黨，國家-天主教和保守黨人繼承的，長槍黨人則是瀕危物種。在義大利，我們看到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在公共輿論中，甚至在相當比例人口的歷史意識裡，法西斯主義在復辟——反法西斯主義曾是“第一共和國”的遺傳密碼，但並不是貝盧斯科尼的義大利的遺傳密碼——這個情況同墨索里尼繼承人的一個主要變形是一致的。剛剛啟動的未來自由黨，他們的領導人是詹弗蘭科·菲尼，該黨展現的是一個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和“漸進式”右派的樣式，它攻擊貝盧斯科尼的政治保守主義

和北方聯盟的文化蒙昧主義。

國民陣線雖然把自己定位於法國政治派系的右翼，但在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推動下，正努力擺脫傳統的由國民革命鬥士[4]，原教旨主義的天主教徒和那些對法屬阿爾及利亞念念不忘者組成的極右形象。雖然它仍然保有法西斯的成分，但如今它已不是占支配地位的了。在其上次會議期間，國民陣線著手一個前所未有的活動，重建其用語，採用不是其傳統部分的共和言辭。如果取代其父親的瑪琳·勒龐表示了一個連續一致的願望，採取一個世襲繼承的形式，那麼它也證明了一個不可爭辯的革新願望：從來沒有任何正統的法西斯運動，曾經把其領導權交托給一個女人。

但是，法西斯傳統的衰落，給一種新型的極右翼勢力讓了路，它的意識形態考慮了二十一世紀的變化。政治經濟學家讓-伊夫·加繆是第一個抓住他們新特點的人：放棄國家迷信，贊成新自由主義的世界願景，批評福利國家，主張抵制稅收，放鬆經濟管制和穩定個人自由，反對任何官方的干預[5]。民主的拒絕--- 或按其國民投票表決和權威裁決意義的解釋 --- 並不總是伴隨著民族主義的，在某些情況下，伴隨的是種族中心主義，它質疑民族-國家的模式，就像義大利的北方聯盟或佛蘭德斯極右派（the Flemish far Right）表明的那樣。

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義採取保護西方的形式，因為西方受到全球化和文明衝擊的威脅。排外心理，個人主義，保護婦女的權利，以及2002年皮姆·佛杜恩在荷蘭炮製的公開同性戀，這些東西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是一個持久選舉操作的關鍵。類似的特性也是北歐其他政治運動的特徵，如比利時的佛拉芒利益黨（Vlaams Belang），丹麥人民黨，還有剛在斯德哥爾摩進入議會的瑞典極右黨。但我們也發現它們 --- 雖然混有比較傳統主義的定型 --- 存在於奧地利自由黨（其魅力領袖是約爾克·海德爾），在去年10月的選舉中，它成了維也納的第二大政治力量（獲得27%的選票）。

把這個新的極右翼聯合起來的新主題是排外情緒，它表現為對移民的暴力排斥。今天的移民是19世紀“危險階級”的後繼者，當代實證主義社會科學把它描繪成一個全社會病態者的窩，其中不但有酗酒，犯罪和賣淫，甚至還有像霍亂這樣的流行病 [6]。這些刻板印象 --- 常常濃縮在一個代表性的外國人身上，這個外國人的

心理和生理特點已定義妥當 --- 來自東方和殖民地的心態，因為害怕“其他人”，總是感到他們是“侵略者”和“敵人”，這種心態總是可能消極負面地斷定身份不確定和脆弱的人。

在今天的歐洲，移民一開始就帶有穆斯林的特點。對於新種族主義來說，今天的伊斯蘭恐懼症扮演的角色，就是過去的反猶主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扮演的角色。對於大屠殺的記憶 --- 通過種族滅絕後果的折射棱鏡，對反猶主義的歷史感受 --- 往往會模糊這些顯而易見的比擬。當代排外心理描畫的阿拉伯-穆斯林肖像，同二十世紀初反猶太主義塑造的猶太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以前時代的中歐和東歐猶太移民的鬍鬚，護身符和長袖衣服對應於今天穆斯林的鬍鬚和面紗。

在這兩種情況下，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服裝和食品的做法都被調動起來，以建立外來者對國家社會不能認同的負面刻板印象。因此，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作用是非我族類的負面比擬：一個世紀前，大眾肖像描繪的猶太人必然有一個鷹鉤鼻子和扇風耳朵，就像今天的伊斯蘭教徒等同戴面罩的人，即使99.99%的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婦女並沒有完全封蓋自己的身體。在政治層面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幽靈已經取代了猶太-布林什維主義。

今天，反猶主義仍然具有中歐民族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中歐那裡伊斯蘭教幾乎不存在，1989年的轉捩點重又喚醒了老惡魔（即使在沒有猶太人的地方，它們仍然存在），但在西方極右翼（有時宣稱其對以色列的同情）的話語中它幾乎已經消失了。在荷蘭，基爾特·維得爾把反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作為他的中心主題。根據全民投票的情況，57%的瑞士選民贊成2010年11月28日禁止清真寺尖塔。到現在為止，在瑞士聯邦的150清真寺中只有四個尖塔：這道門檻，現在仍然無法越過。

在義大利和法國，幾個聲音都提出了類似的措施，表示這遠非瑞士的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右派的一個突發奇想，歧視伊斯蘭教的意願與整個歐洲有關。什洛莫·沙是正確的，他強調說，今天恐懼伊斯蘭症成了凝結歐洲的水泥 --- 歐洲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發源地應該永遠不會被遺忘 --- 就像反猶主義在19世紀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基本作用[7]。所以這個新的“非法西斯主義化”的極右翼採取了民粹主義的形式。大家都知道，當用該觀念來確認對人民的責

族式蔑視時，它是含混的，彈性的，模糊甚至可恨的。然而，這個新的極右派獲得頻繁的選舉突破，證明它有能力在工人階級和社會中最貧困階層中間找到一個共識。右派民粹主義--- 埃訥斯托·拉克勞對它很強調[8] --- 依賴被左翼拋棄的人民的困擾，左翼的任務本應該是組織和代表他們的。最後，民粹主義是一個橫向的範疇，表示右翼和極右翼之間互相滲透的邊界。

如果任何人對這個問題曾有過懷疑，那麼薩科齊已把這些疑慮驅散了，因為在他當選後，先是建立一個移民與民族身份部，然後啟動反對羅姆人的運動，依據一個民族-種族的普查而搜捕和驅逐羅姆人，首先在義大利，獲得了許多歐洲右派代表的熱烈批准。說到底，在這個21世紀的開始，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 避免共和民族主義和社群多元文化之間的枯燥衝突 --- 回到了議事日程，如同它在19世紀的情形，當時崛起的自由派中產階級通過階級，性別和種族的強大障礙，限制投票表決，反對民主。

今天，儘管有幾個國家頒佈了法律，但在我們的機構裡，婦女代表性仍然不夠；普通人民在離棄投票箱，對一個他們感到陌生甚至敵意的政治制度越來越冷漠；最後，移民仍然被排除在任何權利之外。這些就是我們這個“幸福全球化”的突出特點。

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的變態不可能沒有政治後果。如果在歐洲聯盟的新國家裡，反法西斯主義顯然是一個現在的鬥爭，今天在那裡我們看到極端民族主義右翼，反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那麼在西歐這種情況則相當不同。當然，在經歷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地方，反法西斯主義應該是民主遺傳密碼的一部分，就像我們歷史意識的一個成分。新形式的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會打著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所以反對新形式的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的鬥爭可能顯得像一個防守行動。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時候，反法西斯主義履行了它的角色 --- 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運動 --- 特別是在法國，它面臨的是一個具有法西斯細胞的極右翼的興起（儘管總體環境不再是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但今天它不是一個捍衛受到威脅的民主的問題。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展現了兩副互補的面孔：一個面孔是新“共和”極右組織（保護基於種族，民族或宗教而作分隔的“權利”）；另一面孔是政府的政策（無證移民拘留營，有計劃的驅逐，旨在誣衊和歧視種族

或宗教少數族裔的法律）。

這個新的種族主義調節自身適應代議制民主，從中重塑自己。因此，需要重新定義民主本身以及平等權利和公民概念，這樣才能給反種族主義一個新的推動。

恩佐·卡瓦索出生在義大利，是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關於猶太研究的前講師，現在儒勒凡爾納的亞眠大學教授政治學。他早期的三部書已用英文出版：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問題（1994年），猶太人和德國（1995年）和瞭解納粹大屠殺；奧斯威辛集中營後的馬克思主義（1999）

注釋:

[1] 皮埃爾·安德列·塔吉耶夫，偏見的力量，發現雜誌，巴黎，1988年。

[2] 歐文·戈夫曼，羞辱：關於受寵身份的管理的剖記。Prentice - Hall出版社，上馬鞍河，新澤西州，1963年。

[3] 阿爾貝托·布林吉奧，雖然有奧斯威辛集中營。仍然“回歸”歐洲種族主義，Derive Appodi，羅馬，2010。

[4] 從1940至1944年，貝當元帥當局的意識形態。

[5] 2002. 讓-伊夫·加繆，「從法西斯到國家民粹主義。歐洲極右派變形記」，世界外交，2002年5月。

[6] 路易·富安，勞動階級和危險階級，佩蘭，巴黎，2007（1958年原版）。

[7] 什洛莫·沙，“從猶太恐懼症到伊斯蘭恐懼症。民族構成和歐洲建設”，猶太季刊，2010，注釋215。

[8] 埃訥斯托·拉克勞，論民粹主義的原因（Verso，倫敦，2005年）。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 438 期，2011 年 7 月號。

生態社會主義的戰略基礎

丹尼爾·坦努洛

下面的文章是特別為在蒙特利爾出版的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新筆記》(NCS)雜誌而寫的，該期雜誌特別發表了一些有關生態危機的文章。由 NCS 發表的這篇文章的法文本由理查·菲德勒翻譯，發表在他的博客上。

同賈德·戴蒙推出的虛假而家喻戶曉的復活節島比喻 (*Jared Diamond* 賈德·戴蒙的比喻是：復活節島是太平洋中一個孤立的島 - 一旦島內有了麻煩，人們無路可逃。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助他們。同樣，地球上的人，如果破壞自己的世界，人們也將孤立無援。---譯注) 相反[1]，我們現在觀察到的環境惡化，完全不是以往歷史時期可能發生過的損害可以相比的。區別並不只是定量（生態問題的嚴重性和全球規模）的，但也首先是定性的。雖然過去所有的環境危機，起源於長期生產不足的社會傾向，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供應短缺的害怕，但目前存在的問題起源於相反的傾向，源於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這對於廣義化的商品生產是特別的。

結果，“生態危機”的說法是不恰當的。不是自然處在危機中，而是歷史決定的人類和環境之間的關係處在危機中。這場危機不是由於人類的內在特點，而是大約兩個世紀前成為主導者的生產模式——資本主義——以及它需要的消費模式和商品流動性。對生態系統的嚴重損害（氣候變化，化學污染，生物多樣性的迅速下降，土壤退化，熱帶雨林的破壞等），構成了全球系統性危機的一個方面。它們一起表達了資本主義和尊重自然限制之間的不相容性。

無限制的生產主義

這種不相容性問題的根本原因很簡單。在競爭的鞭策下，每一個資本所有者總是尋求用死勞動（即物化勞動---譯注）代替活勞動，也即用更有效率的機器取代工人，因為前者除了平均利潤以外，還產生超額利潤。不用說，如果不是要試圖通過增加市場上價格低廉的商品量，以便消除其較弱的競爭者，這個做法對資本家是毫無意義的。按照這種生產模式，創新不在於勞動量的減少，而在於資本永無止境的積累。

因此，資本家不斷地尋找新的附加值領域，導致他生產無限量的無用有害的商品，以獲得剩餘價值，而且必須不斷地製造出越來越多的人為市場和需求。“生產主義”——為生產而生產——必然意味著“為消費而消費”，它就像商品拜物教一樣，是這種生產方式的遺傳天性的一部分。熊彼特說，資本主義“不僅從來不是，也決不可能是靜止的。”[2] 事實上，如果資本主義靜止下來，它勢必會取消構成‘資本’的眾多資本之間的競爭，這顯然是荒謬的。

但是，有人可能會反對說，如果資源的利用效率比所生產的大量商品，增加得更迅速，那麼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將不會伴隨著自然資源枯竭程度的增加。然後，資本主義將可以在生態上可持續地發展。實際上，這個論點讓GDP的增長同生態足跡 (ecological footprint) 脫鉤。這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鐘形曲線，根據該曲線，一個特定社會的環境影響，會增加到一個高峰，然後隨其財富的增加而下降，從而也隨其生產力的發展而下降。

誠然，在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生產模式中，資本主義最顯著地增加了勞動生產力，從而增加了資源的利用率。這是因為對剩餘利潤的追求，促進機械化，同時有利於節約自然資源。但是，這種觀察並沒有質疑該制度與生態滅絕有關的性質，還有，庫茲涅茨曲線是錯誤的。一方面，效率的提高必須是漸近的，並不是固定資本增加的一個線性函數 --- 否則有人會得出結論，說永恆的運動是可能的，因為如果做到極致，可以在不損失能源的情況下使用勞動力。（造成這明顯錯誤的專家們認為歐洲電力消費的份額可以被撒哈拉大沙漠的太陽能發電項目可以覆蓋）[3]。

另一方面，經驗觀察表明，增加生產量大大抵消了效率的提高，因為效率只是相對的。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汽車：發動機的效率增加了，但車輛數目無止境增加的結果，使得全球性碳氫燃料的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爆漲。癡迷於增長的資本主義必然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資源消耗，這與資源

的有限性及其再生率勢不兩立。

嚴重生態問題的驚人增加，使得資本主義增長及其帶來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環境退化的理論極限問題，浮上了檯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清醒地把認識到，資本不是一個東西，它是一種剝削的社會關係，它的發展，是因為統治階級以利潤的名義，優先佔用自然資源（土地、水、森林等），才有歷史性的可能。這個資源的佔用然後涉及到勞動力，把它轉化為帶有工資的商品。掠奪資源和剝削勞工——從社會角度來看考慮它時——因此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不過，撇開它的社會組成部分（合作公司及其形式），也可以從熱力學角度看人類的勞動力，把它看作其他自然資源（人體是一個能量轉換器）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掠奪和剝削只是同一個毀滅過程，剩餘勞動力可以被描述為由雇主壟斷的一個能量。

一旦認識到這一點，就可能回答關於資本的理論極限的問題。一方面，剝奪直接生產者，使他們離開賴以生養的土地，製造了一個社會階層，這個階層人們的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

另一方面，雇工找到現成的，由雇主給他或她的安排，給他或她提供其生產活動的必要成分——工具，廠房和能源——這些直接或間接通過勞動衍生的或轉化的自然資源。

在這一背景下，考慮到這一事實，即效率的提高只是相對的，不用說，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不斷地追求剩餘利潤，拖累資本的可變和不變兩部分，因此，縱使它有利於它們的相關經濟，它必然也要消耗一個不斷加大的絕對數量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由此看來，馬克思的神奇公式‘資本的限制只能是資本本身’，意味著這種生產方式自己停止的條件是，它已耗盡兩個僅有的“所有財富的來源：土地和勞動者。”[4]

對於一些人拼命固守的樂觀主義，這個結論沒有留下多少餘地，因為這些人執著的想法是，在達到這個理論極限之前，某些尚未確定的內在機制可能會阻止這個系統。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的，也不可能是這樣的。再次，究其原因，很簡單，那牽涉到資本主義的根本規律：這種完全基於勞動價值律的模式，其唯一目的是生產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既然價值是由社會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很

明顯，資本沒有任何手段，使它能夠自發地計算因為人類的活動而讓大自然無償付出的資源。貨幣形式——價值的符號和本質——按照其真正的抽象意義，和它產生的完成相反的印象（似乎是錢給商品以價值，雖然實際上是商品給錢以價值）製造出無限的物質積累是可能的假想。

解釋應該是，雖然資本計算和度量一切，但它無法定性和定量地考量自然資源，其不負責任的輕率就表明了這一點，儘管有各種警告，但這個輕率態度讓它不可逆轉地摧毀了大量資源的儲存。這種瘋狂甚至在極端自由主義者中間找到了其理論家，這些人——面對所有的證據——捍衛的荒謬論斷是，要用人類活動的產品完全替代自然資源。

一個政治的答案？

當然也有一些資本大量投資在綠色經濟部門，那是因為利潤的吸引力，尤其是公共補貼的吸引力。但這樣的“綠色資本主義”是一個矛盾說法。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嚴格經濟領域以外的政策措施，會把商品生產模式中的生態愚昧，可能抵消到何種程度。鑒於剛才說的，答案顯而易見：生態政策的效率，完全取決於決心，有了決心，那些主張它們的人就敢於挑戰資本的自由，並建立必要的力量執行它們（反過來，它們又要把生態問題的解決方案同被剝削者的鬥爭相連接：反對失業，貧困，社會不平等，歧視和工作條件惡化的鬥爭）。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例如，蒂姆·傑克遜，可能是最瞭解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邏輯是環境退化的根本原因的非馬克思主義作家之一。在‘無增長的繁榮’中，他拒絕膚淺的解釋，敏銳地寫道：“用完即丟的浪費社會作為一個生存的結構性前提，並不完全是消費者貪婪的後果”，因為該制度需要“賣出更多的商品，不斷地翻新花樣。”[5] 但傑克遜回避了由他自己的分析而推出的結論：他不是去質疑生產方式，轉而質疑一個“追求新穎性和消費的欲望”，他認為那是人性的一部分。結果是雷聲大雨點小：

【翻譯】

在生態方面，‘無增長的繁榮’極力主張對只受環境制約的資源的使用，要制定苛刻的管理限制。應該做的是...。但是，不能像傑克遜那樣，

假裝看不見商人階層成功地反對了所有激烈的環境監管，即使對於是否需要監管這個問題，爭議最少的情況，他們也反對；

在社會方面，傑克遜主張的有利點是減少勞動時間，但他把這項措施置於維持企業競爭力的措施之下，所以沒有給它以應有的分量。在他看來，其實勞動時間減少的形式是靈活的，並不是對失業的直接集體反應，也不是重新分配生產財富的工具（不減薪）。每當經濟學家轉換到一個新的“宏觀經濟模型”，不足以簡單地把經濟活動的焦點從價值生產部門轉向非物質化的服務時，他就把它設想為最後的手段。[6]

一般來說，所有傾向於對資本的生態自殺性質作政治補救的建議，都繞過了同樣的障礙：金融機構的利潤邏輯和階級性質。[7]

內部化的幻影

愛因斯坦有個著名的說法：“我們不能用我們製造問題時的同樣思維，去解決問題。”這個定理是完全適用於這個觀念，即如果一些政治當局給自然資源制定價格，那麼資本主義就能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由於生態危機是廣義商品生產的一個後果，把水，空氣，碳，基因或任何其他自然資源“商品化”，並不能停止對環境的破壞。“外部經濟效應內部化”不僅沒有讓我們更接近一個解決方案，反而讓我們背道而行。不用說，自然資源轉化成商品，意味著它們被資本佔用。因此，事情搞定了，因為資本讓它們服從勞動價值律，從而使它們離開除了利潤以外的任何管理規則。

即使不管這些顧慮，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給自然資源定價的企圖都遭到一個難以逾越的理論困難：如何評估不能按勞動時間衡量的生產的貨幣屬性，而且如何估價那些沒有價值的東西，還有，其造成的破壞，在時間上是延後的，又如何評估？試圖解答這個謎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在當前轉換率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並且質疑在多大程度上消費者願意為環境買單或接受它的退化。因此，自然資源的價格各不相同，這要看那些質疑者是富裕的還是貧困的。極而言之，這個方法清楚地顯示其荒謬性：在知道地球上的生命都依賴於陽光的情況下，要如何確定陽光的商品價值呢？

商品估算的僵局清楚地顯示在徵收碳稅的

建議上，該建議要使化石能源比可再生能源昂貴，從而減少二氧化碳氣體排放。我們知道，要合理地使溫度的增加不超過工業化前溫度的2℃，到2050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排放量必須減少80%至95%，在世界範圍上要減少50%至85%，不遲於2015年要達到拐點。[8]這些範圍標準——而且要審慎地瞄準更高的數位——意味著在兩代人的時間內放棄化石燃料，雖然它們占我們目前能源需求的80%（而且石油是石化行業的原材料）。

事實上，在給定的緊迫性下，在化石和可再生能源之間的成本差異的給定範圍下，要達到的削減範圍，是這樣的，即使每噸600美元的稅收也不足夠（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說法，到2050年，它只會在全球減少一半的排放量）[9]。由於一千公升燃油的燃燒產生2.7噸二氧化碳，可以知道的是，這樣的措施在現實社會中將不適用：雇主可以接受這個的唯一條件是，如果它能完全轉移給最終消費者，而大多數人口，被已盛行了30年的緊縮狀態所激怒，顯然會反對任何使其生存條件惡化的做法。

這就是為什麼，在實踐中，儘管有各種複雜的生態經濟學理論，污染成本內部化的政策建議還是生態學上不足的，在社會上也難以為繼。假使理論和實踐的障礙可以解除，內部化的成效仍將是不可預知的，因為價格是一個純粹的量化指標，成噸的二氧化碳是用不同辦法避免的，這些不同方法可以是家庭的隔熱，太陽能光伏板的安裝，樹木的種植，或一級方程式大獎賽的抑制，這些避免的二氧化碳之間的質的差異是無法捕捉的。從數量上看，沒有什麼可以把一噸二氧化碳同另一個區別開來。但在發展充分的生態戰略中，質的差異是決定性的，這個戰略的實施手段符合其最終目的——通向一個無社會破壞的能源節約和基於可再生能源的分散式系統。

新陳代謝的理性管理和階級鬥爭

自從這個生產方式開始以來，資本的生態自殺性質已經成了現實。在19世紀，土壤化學的創始人李比希（Liebig）已經敲響警鐘：作為資本主義城市化的結果，人類排泄物不再返回到土地，這破壞了營養迴圈鏈，威脅並造成嚴重的土壤貧困化。馬克思在他的工作過程中，建立了概念平面（conceptual plane）的觀點，提出了

“用理性的方式來治理自然與人體的新陳代謝”的一般需要[10]。然後，運用這一生態概念（生態這個術語出現以前），他回到土壤的問題，推出一個徹底的綱領性觀點：消除城鄉之間的分離，這對於逐漸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的觀點，是必要的補充。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理性”的管理不應該引起混亂。對於馬克思，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整體的正確代謝並不能靠綠色技術官僚機構達到，而是通過社會各階層的克制來實現的。事實上，對於同環境交換的事情，社會分工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意識和有組織的掌控。不僅因為利益驅動促使老闆們掠奪自然資源，而且還因為他們的資本主義撥款意味著，資源的配置是反對作為敵對勢力的被剝削者的，而後者是被驅離資源的。更有甚者，工人之間的競爭和對失業的恐懼，鼓勵每個個人渴望“他”或“她”的公司能盈利運作，從而不由自主地同生產主義合作。最後，根據資本發展的一定程度，商品消費提供工人一定數目的微薄補償，彌補他們的生產異化。

除了空前規模的階級團結的發展，沒有辦法打破這些機制。所以馬克思才說，社會新陳代謝的合理調控只有通過“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才能可以實現。馬克思解釋說，只有這樣才能提供“唯一可能的自由。”

雖然列寧在提到土地問題時，在某些地方提到了它[11]，布哈林在他的唯物史觀手冊中對它作了智識性演示[12]，合理調控物資交流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隨後就遺忘沉沒了。

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賦予它以應有的重要性，而事實上，自從20世紀60年代生態問題成為一個的社會問題以來，他們中間沒有人看到其相關性。本文不探討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這個不連續性問題的原因。[13]

但它足以提醒讀者要警惕簡單化的解釋：雖然在這一領域，它確實意味著一個可怕的理論退化，但史達林不是唯一的罪魁禍首。[14]相反，我們會強調這個事實，即一個迫切的需要，是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思維和綱領性發展中，給“馬克思生態學”一個中心的地位。[15]

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顯示了這個需要。大氣中二氧化碳的飽和，主要是由於化石燃料的燃燒——也即一個長週期的碳迴圈中的一個短

路——是一個不合理管理物資交流的惡劣例子，這種非理性使人類面臨一個可怕的兩難境地：

▶一方面，30億人生活在不體面的條件中。他們的正當需求，只能通過物質生產的日益增長來滿足，因而要處理從自然環境中開採出來的資源。這意味著能源的消耗，其中80%是今日的化石能源，是溫室氣體的來源；

▶另一方面，氣候系統處在危險發作的邊緣。如果我們要避免不可逆轉的災難（其中的主要受害者將是30億渴望有尊嚴地生存的人民），必須從根本上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這意味著化石能源的消耗要減少，而現在使用的這些化石能源取自自然環境並經過處理，還要減少物質的生產。

現在，留給我們的只有40年的時間，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加上缺乏超凡的能源科學革命——的說法，根本就沒有可以接受的資本主義解決方案，能夠解開這些難題。在持續減少能源消耗和物質生產的情況下，以盈利競爭為目標的系統，完全不能滿足大規模的無法解決的人類需求。分別實現這些目標，已經不符合資本的邏輯，那麼怎麼能一起實現這些目標呢？由政府 and 國際機構提出的，對氣候情形的檢查已經明確地顯示這是不可能的。

例如，國際能源署的藍色地圖（The Blue Map）方案，目的是到2050年減少全球排放量的50%。[16]更可能的是，這個目標是不足的；在任何情況下，它的實現，只有通過大規模的核能，農業燃料和所謂的“清潔煤”（更不用提葉岩氣和油砂）的使用才能做到。藍地圖涉及到每年的建設，在40多年的時間裡，建設32個1000兆瓦的核電廠，以及45個500兆瓦容量的新的“乾淨”燃煤電廠。沒有更進一步的觀點：日本福島的可怕災難，足以顯示這些專案中的畸變。

因此戰略的選擇如下：

▶我們要麼離開資本主義，從根本上限制資本主義生產和運輸的領域和規模，並有可能限制全球變暖的損害的最大值，同時只依靠可再生能源，立足於一些當代其它經濟，在這個社會視角內，保證一個高品質的人類發展；

▶否則，我們仍然處在資本主義積累的邏輯內，

放鬆氣候管制，從根本上限制億萬人類存在的權利，而子孫後代註定要應付一些危險技術項目的擴散而引起的問題。

顯然，我們會選擇第一個解決方案，但必須強調，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由於嚴格的环境限制，將會讓遭受到一些過去未能預見的條件。這並沒有高估所面臨的挑戰範圍。例如，在歐洲聯盟，減少60%的排放量（它們應該減少95%！）而又不訴諸核能，將有必要把最終的能源需求減少約40%。[17] 要衡量物質生產和運輸上的聯串影響，是不容易的，但顯而易見的似乎是，只是消除不必要和有害的生產（武器，廣告，豪華遊艇和私人飛機等），反對計畫的過時產品，或減少統治階級中最富裕者的擺闊消費，目標仍將無法實現。需要更多的激進措施，至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措施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口將有一定的影響。換句話說，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必然非常不同於20世紀的情況。

對農業綜合企業在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份額的估計，是一個指標。根據“不要吃世界”（Ne mange pas le monde）運動的說法，44%至57%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目前的農產品和林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模式。這個數字是一些排放比例數的和，它們包括：嚴格意義上的農業活動（11%至15%），毀林（15%至18%），食品的處理，運輸和貯存（15%至20%）和有機殘留物（3至4%）。[18]

因此，爭取最佳可能的氣候穩定狀態的鬥爭不能限制於剝奪‘剝奪者-污染者-浪費者’。財產關係的變化，只是社會消費和商品流動模式的重大變更的至深社會變化的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條件。這些修改——例如另類方式的旅行，少吃肉類，消費時令蔬菜，——必須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因為它們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它們有直接的影響。這是可能的，因為它們應用的文化思想機制，在關係到社會的生產基礎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雖然它們本身不涉及任何結構上的變化，但它們必須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組成部分。在它們會導致集體行為的意義上，它們可以說明提高覺悟和組織。

一個新的時期

托洛茨基寫於1938年的《過渡綱領》（The Transitional Program），開頭的話是“無產

階級革命的經濟條件，總體上已經達到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的成果的最高點。”結論是“客觀的先決條件...不僅‘成熟’，而且已經開始熟透變爛了。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在未來的這個歷史時期，一場大災難會威脅整個人類的文化。”

當然，紅軍的創始人首先指的是歷史背景：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勝利，西班牙革命的粉碎，和即將到來的世界戰爭。然而，他關於客觀條件在腐爛的判斷似乎有更廣泛的歷史意義。此外，這個主題再次出現在歐尼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文章中：“隨同增長的商品貨幣關係而增長的生產力，其實可以移動一個社會，使它離社會主義的目標更遠，而不是更近。”[19] 這是一個著名的引文，它的戰略含義值得探討。

其實，這是我們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局面：在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力的增長已經走得太遠了，以至於一個有價值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不再意味著進步，而是一個倒退。（當然，我們說的是物質力量，並沒有質疑在生產者中間發展知識和需要。）這個新的歷史關頭，它迫切需要的是減少生產和運輸，以便大大減少能源的消耗，並在本世紀末徹底消除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已經開始讓我們進一步離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這個事實是使生態社會主義新概念得以建立並且合理化的主要事實。遠非只是瓶上的一個新標籤，這個概念至少引入了5個新的方面，這在我的書“不可能的綠色資本主義（L'impossible capitalism vert）”中有概述，我在這裡做簡要的回顧：[20]

1. 必須放棄“人類掌握自然”的概念。生物圈的未知者和演化性質的複雜性，涉及一個不可簡化的不確定性。系統性的社會和環境的相互關係必須被看作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看作大自然的一個生產。
2. 必須完成社會主義的經典定義。現在唯一可能的社會主義，必須符合實際的人類需求（從商品的異化中解放出來），由有關各方本身在資源限制的範圍內，通過仔細質疑這些需求對環境的影響，以及他們感到滿意的方式而民主確定。
3. 必須超越把自然區塊化，功利化的線性觀點，

這個觀點把自然當作一個人類操作的物理平臺，把它當作倉庫，從中提取其社會存在的生產必要的資源，還把它當作垃圾場傾倒垃圾。一旦大自然是平臺，倉庫，廢物的容器，和得益於太陽能的生命過程，那麼在不斷重組的同時，這些端點之間會有物質迴圈。因此，廢物和它們的存儲模式，必須在數量和品質上，同生態系統的回收能力和節奏相容。換句話說，整體的正常運作依賴於必須得到保護的生物多樣性。

4. 能源和所使用的轉換方法，不是社會中立的。結果，不能像列寧那樣，把社會主義定義為“蘇維埃加電氣化。”資本主義的能源系統是集成的，無政府主義的，浪費的，效率低下的，死勞動密集型的，依賴非再生能源的，以及面向資本積累的。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改造，需要逐步代之以分散的，有計劃的，節儉的，高效的，活勞動密集型的系統，完全依賴可再生能源和面向耐用的，可回收的和可重複使用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這不僅關係到狹義的能源生產，還關係到整個工業機構，農業，交通，娛樂，和土地開發和規劃。這種極其深刻的變革，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才能實現。

5. 生產的物質力量的增長，使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變得複雜，要超越這個門檻，就要批判性地看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一些領域，尊重生態平衡的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的實施，必須用活勞動替代死勞動。這顯然是農業的情況，其中超機械化農業綜合企業系統，是投入和化石能源的一個巨大的消費者，它將讓位給另一種操作模式，就是人力密集型模式。這也適用於能源部門，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的分散性生產，將需要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維護方面的工作。

一般來說，在所有直接與環境有關的領域裡，活勞動的數量必須從根本上提高。與個人保健同樣重要的是教育和其他部門，那裡的左派認為公共就業的發展是必定的：事實上，人的智力和情感，結合一個“獲取照顧”的文化，對於直接與生物圈互動有關的事情是有必要的。

一些教條式的頭腦會擔心這些想法打開大門，修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向發達國家中針對工人階級的財政緊縮進攻妥協。沒有這個道理。這不是一個給讓人歉疚的說法留下最少餘地的問題，這個說法利用生態危機，試圖解除勞工運動及其代表的武裝。

一方面，是生態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是降低增長的政治生態，兩者之間的分界線，是對待階級鬥爭的態度。我們仍然堅信，被剝削者通過集體鬥爭取得經驗，這些鬥爭以工資，就業和工作條件的捍衛開始。工人的每個鬥爭，甚至是最直接的鬥爭，必須予以支持，必須被視為一個提高覺悟的機會，把它導向社會主義的視野。

這一戰略框架內，觀察到現在必須在環境的約束下運作社會主義的過渡，這個觀察並不能削弱反資本主義的信念；相反，它強化了它們。但是，只有真理是革命性的。我們不能隱瞞這個事實，即：社會主義的改造，很可能會要求放棄深刻影響廣大民眾日常生活的某些商品，服務和習慣，至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樣的。

那麼，這個任務宣導的目標，要能夠實質性地推進高品質的生活以彌補這個損失。我們認為，應優先追求這樣兩個目標：（1）基本商品（水，能源，流動性）的免費使用，要達到社會的平均量（這意味著公共部門的擴大）；（2）工作時間的大幅減少（50%），但不減薪金，按比例雇用工人和減緩工作節奏。

馬克思說，歸根結底，所有的經濟學都歸結為時間的經濟。申明較少的生產和消費的必要性，是要求有生活的時間，要求生活得更好。它開啓一個辯論，讓人們討論社會時間的掌握，討論什麼是必要的，對誰，為什麼，什麼樣的數量。它是要喚醒眾人對無戰爭世界的願望，在這個世界裡，我們工作時間短些，我們污染少些，我們發展社會關係，我們大幅改善福利，公共衛生，教育和民主參與，等等。在這個世界裡，聯合起來的生產者重新學習如何同自然集體“對話”。這個世界的富裕程度將不會低於目前的世界（像右派所說的那樣），也不是“為了絕大多數人口的富裕”（像某些左派所說的那樣）。它將是決非無用的，較少壓力的，較不急迫的——一句話，更豐富的世界。

✦ 丹尼爾·坦努洛，是經過認證的農學家和生態社會主義的環保主義者，為“左派”（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社會主義工人黨(LCR-SAP)的月刊，第四國際比利時分部）雜誌撰稿，。

附注：

- [1]賈德·戴蒙，崩潰：社會如何選擇失敗或生存（倫敦：企鵝叢書，2005年）。對戴蒙論文的批評，參見班尼·佩索，“從生態滅絕種族滅絕：拉帕努伊強姦”，能源與環境，16卷，3-4號（2005年）；特裡·亨特，“反思復活節島的生態災難”，考古科學，第34期，第485-502頁（2007）；和丹尼爾·坦努洛，“過去和現在的生態災難：復活節島的虛假比喻”，共產黨批判，第185期（2007年12月）
- [2]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第3版。（哈珀長期現代經典，2008年）。
- [3]L.坡索茲（L.Possoz）和H.約翰馬特（H. Jeanmart），“評DLR兩項研究中的電力需求情況：MED-CSP（地中海地區集中太陽能電力）和TRANS-CSP（地中海內部連接發展集中太陽能電力）”，ORMEE及MITEC工程顧問，比利時，網站 <http://tinyurl.com/65fzvqs>。
-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10節。
- [5]蒂姆·傑克遜（Tim Jackson），無增長的繁榮：一個有限星球的經濟學（Earthscan出版社，2009年）。
- [6]丹尼爾·坦努洛，“《無增長的繁榮》：讓人緊張的著作”。（“Prosperité sans croissance”：un ouvrage sous tension）
- [7]這尤其適用於關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替代者或補充指標的建議。顯然，GDP並不衡量環境品質；這既不是它的目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目的。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是資本積累。因此，它完全適應於資本主義。聲稱改變衡量工具，就足以改變制度的邏輯，如果不是知識的欺詐，就是明顯的無知。
- [8]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 [9] [-> 國際能源機構，2008年能源技術展望 - 朝向2050年的方案和策略。
- [10]馬克思，資本論，卷3（紐約：Vintage葡萄酒書局，1981年），第959頁。
- [11]列寧，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第四章。
- [12]尼古拉·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一個社會學系統（紐約，1965年）

[13]丹尼爾·坦努洛，“馬克思主義，能源和生態：真理時刻”，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2010年12月，89-101頁。

[14]丹尼爾·坦努洛，“托洛茨基的遺產”

[15]參見JB.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紐約，2000年）。

[16]國際能源機構IEA，同前。

[17]沃爾夫勒姆·克日維特（Wolfram Krevitt），烏韋·克藍（Uwe Klann），斯特凡·克洛沙葛（Stefan Kronsage），能源革命。為歐洲清潔能源未來的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途徑（斯圖加特：技術熱力學與綠色和平研究所，2005年9月）。

[18]以斯帖·維瓦斯的報導，“‘不要吃世界’：為另一個氣候的另一個農業，”一篇文章的法文譯本在加泰羅尼亞日報發表。

[19]歐尼斯特·曼德爾，“[->管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社會經濟規律的十大提綱”

[20]丹尼爾·坦努洛，不可能的綠色資本主義（巴黎：發現，2010年）

本文譯自《國際觀點》第440期，2011年9月號。



當代馬克思主義

托洛茨基著

(1939年4月)



本書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作出的簡潔而又不加歪曲的闡釋。畢竟，迄今為止，在勞動價值理論的闡述工作上，尚未有人做得比馬克思本人更好。《資本論》的第一卷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完整系統的基礎所在。奧圖·呂勒先生（Mr. Otto Rühle）懷著高度慎重和對自己工作的深刻理解，精編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刪節本。被刪掉的首先是一些已經失去時效的例子和說明；繼而是一些文章的引文摘錄，以及與這些文章作者們的爭論。這些引文現在只屬歷史上的軼聞趣事，作者也早已被人淡忘；最後，給刪去的是那大量的文獻，如議會法令，工廠調查報告，等等。儘管這些文獻對理解過去的一個時代是多麼的重要，可是它們在精簡陳述理論而不是回顧歷史的專著中是沒有位置的。呂勒先生在刪去這些材料的同時，作出一切努力以保留這項科學分析的發展脈絡的延續性和行文論述的統一性。我們相信，其中的邏輯推論和思想上辯證的轉變絲毫沒有受到違反。這本刪節本有理由要求讀者給予全神貫注、反復琢磨地細心閱讀。為了幫助讀者，呂勒先生更給文稿加上了簡明的小標題。

在未入門的讀者看來，馬克思的一些論證，尤其在第一章，也即是最難讀的一章，似乎有著太過離題的推論，太多瑣碎而不必要的分析，或太過「形而上學」。事實上，

這種印象之所以產生，是對過分習以為常的現象缺乏科學性的探討而習慣了的結果。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商品已經成為了生活中無所不在、行之有素而又耳熟能詳的一部分，以致我們昏昏欲睡，甚至不會試圖考慮人為什麼會把用以維繫生命的重要物品讓出，以和無實際用途的一小塊金或銀交換。事情不僅限於商品。市場經濟的所有範疇（各種基本觀念）作為不言自明的事物，似乎毋須分析便得到接納，仿佛它們是人類關係自然而然的基礎。經濟過程的實況仍然是人的勞動、原材料、工具、機器、勞動分工，在勞動過程的參與者之間分配製成品的必要性等等。在人們頭腦裡所持有的各種經濟過程的概念中，如「商品」、「貨幣」、「工資」、「資本」、「利潤」、「稅收」之類的名詞只是半神秘性的意象。人們不理解也不能控制他們。為了解釋這些概念，一次徹底的科學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國，一個人擁有一百萬美元會被稱為「價值」一百萬美元。「市場觀念」深入人們思想的程度比世界上其它地方更甚。直到最近，美國人罕有對經濟關係的本質作出思索。在這個經濟體系最為強大的地方，經濟理論卻是繼續極其貧乏，只在美國經濟危機現時嚴重化之下，公眾輿論才遲鈍地面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無論如何，對於經濟發展，誰若不去克服無批判地接受現成的經濟發展、意識形態想法的習慣，誰若沒有緊隨馬克思的步伐，得出結論認為商品最精要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有機體的基本細胞，那將證明是永遠都沒有能力對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和最敏銳的現象，得到科學性的理解。

馬克思的方法

人們把科學確立為對自然的客觀再現的認知，卻又頑強不懈地把自己摒除在科學之外，為自己預留各種特權，其形式是一種據

稱是超感性力量（宗教）或無時間性的道德戒律（唯心主義）的交相媾合。馬克思把人類這種可憎的特權，斬釘截鐵、一勞永逸地剝奪去了。他把人類看成是物質自然的進化過程裡的自然聯繫，把人類社會看成是生產和分配的組織，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馬克思的目的，不是要發現經濟的「永恆規律」。他否認有這種規律存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承先啓後的歷史，每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各自按其自有的規律運行。從一種制度過渡到另一種制度，往往是由生產力，也即是由技術和勞動的編制的增長所決定。社會的變化達到了某個程度，性質上是數量的變化，它並不會改變社會的基礎，也就是不會改變財產的普遍形式。然而當成熟的生產力達到了某一點，財產的舊有形式已不能把它承載，繼之而來的便是社會秩序的激烈變化，並附之以連串震動。原始公社由奴隸制所取代並補充；奴隸制由農奴制繼承，後者有著封建的上層建築；城市的商業發展把16世紀的歐洲帶入資本主義秩序，由此經歷了數個階段。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一般地研究經濟，而卻是研究自有其特定規律的資本主義經濟。爲了闡明資本主義的諸種特性，他才會旁及其它的經濟制度，附帶一提。

原始農民家庭的自給自足經濟，由於受到自然的力量和傳統力量兩方面的支配，所以不需要「政治經濟學」。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建立在奴隸勞動之上，是受奴隸主的意志統治，而奴隸主的「計劃」反過來則直接取決於自然規律和日常慣例。同樣的說法，也適用到中世紀的莊園及其農奴。在所有這些事例，經濟關係在的低層次是清晰無誤、一覽無遺的。但當代社會的情況卻全然不同。它毀壞了舊式的自給自足的社會關係和傳統的勞動模式。新的經濟關係已把城市與城市和鄉村與鄉村、省與省、國家與國家相連接。勞動分工已在地球上盛行。這些社會聯結把傳統和慣例搗碎後，本身還沒有構成爲確定的藍圖，反之人類的意識和預見相離甚遠，仿佛是背著人。隨著勞動分工，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團

體間、階級間和國家間的互爲依賴，不是由任何人來指揮或管理。人們各爲別人工作而互不相識，不問別人的需要，而抱著希望或甚至自信他們的關係將會以某種方式自行調節。總的說來，確是這樣——或毋寧說社會生活中的習慣使他們這樣。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員的主觀意識內——在其意向或計劃內——絕對不可能找到資本主義社會一再迴圈的起因。早在科學對之作出嚴肅思考前，資本主義的客觀迴圈已經化爲公式。時至今天，絕大多數人對支配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一無所知。馬克思探討經濟現象所運用的方法的整個力量所在，是他並非從一些個人的主觀觀點出發，而是把社會當成一個客觀整體，由此出發來探討各種經濟現象，就如一個實驗博物學家探討蜂巢或蟻穴。

對於經濟科學而言，有著決定性重大意義的是人們做什麼和怎樣做，而不是他們對自己的行動有什麼想法。社會最根本的基礎，不是宗教和道德，卻是自然和勞動。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主義的，因爲它是由存在到意識，而不是相反。馬克思的方法是辯證的，因爲這種方法既注視自然又注視社會，這兩者都是進化的，而進化本身則是矛盾的力量之間永不停息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與官方科學

馬克思有他的前輩。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李嘉圖）在資本主義成長之前，在它開始畏懼明天之前，已經達到其頂峰。馬克思對這兩位偉大的經典學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激。可是古典經濟學的基本錯誤是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人類社會一種永恆的狀態，而不僅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歷史階段。馬克思從對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批評開始，揭露出其錯誤和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進而展示出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誠如羅莎·盧森堡非常恰當的評論“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古典經濟學的產兒，一個以母親生命爲代價的產兒。”

惟其在有血有肉的社會內而不是學者式的脫離塵世的封閉的研究，科學才達到其目的。把社會扯向不同方向以至於支離破碎的

所有利益的激情，對科學的發展——尤其是關於財富和貧窮的政治經濟學——都施加影響。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迫使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掉頭不顧，不對剝削制度進行科學分析的工作，卻忙於對經濟事項做貧乏的描述，忙於研究經濟的過去，而更糟糕不過的，是爲了令資本主義政權言之成立，乾脆捏造事實。在當前，官方的教育機構所教授的資產階級極力所宣揚的經濟教條，其中不乏重要的資料事實，但這種教條完全無法把經濟過程作爲一個整體串連起來以發現其中的規律和遠景，並且亦毫無這個目的。官方的政治經濟學死了。只有通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才能得到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知識。

勞動價值規律

在當代社會，交換是人的基本聯繫。任何勞動產品一進入交換的過程，便成爲商品。馬克思從考察商品開始，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基本細胞推斷出那些在交換的基礎上客觀地自我形成的社會關係是不受人的意願所支配的。惟有從這個方向探求，才有可能解開基本的疑團——在這人們只爲自身設想而沒有人爲所有人設想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在生活裡必不可少的經濟體，是怎樣地產生出其相應的比例。

工人出賣他的勞動力，農民把商品帶到市場，貸款者或銀行家撥出一宗借貸，店主提供一批貨式，工業家興建廠房，投機家買入和賣出股票和證券——他們每個人都自有打算，自有私底下的計劃，自有對工資和利潤的盤算。然而，由於這些無秩序的奮鬥和行動逐漸形成了某種經濟整體，這個經濟整體誠然並不和諧，反之更是矛盾的，然而這不僅爲社會提供了生存，甚至是發展的可能性。總的來說，這便表示，那些紛擾完全不是紛擾；它是以某種方法自動地調節著，假如不算是有意識的話。理解這把各個不同的經濟面囊括在一個相對平衡的機制，便是發現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

明顯地，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是有著無數而繁複的規律統治著經濟的各個不同層面——工資、價格、土地、房租、利潤、利

益、收貨和股票市場。不過，所有這些繁複的規律，最後歸結起來化約爲一個經由馬克思發現、探尋到底的單一規律，這便是勞動價值的規律；這個規律正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調節器。價值規律的實質十分簡練。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一個任由市場處置的勞動力大軍，他們生產各種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社會分工造成了生產的產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商品以一定的比例進行交換，最初的時候是直接的“以物易物”，之後是用黃金或者貨幣之類的媒介進行交換。商品最基本的性質是等價交換，人們的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價值的基礎和衡量尺度。成千上萬的生產者被驅趕，出現了勞動的分工，然而社會並沒有因此而走向瓦解，因爲商品的交換必須依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進行。市場，作爲商品交換的活動場所，通過交易或者回絕，來決定商品是否包含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因此決定社會上的各種必要商品的分配比例以及不同行業之間勞動力的供需。

事實上，真正的市場上的那些實際操作過程紛繁複雜，是無法用幾句話解釋清楚的。勞動價值也會出現振盪現象，價格在其上下波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中對其進行了闡釋。

全部價格的總和總是和全部價值的總和是相等的。這是由於，最後歸結起來，只有經由人類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才會經由社會安排並付諸使用，而價格不可能突破這個局限，就是托拉斯的壟斷性價格也不可能。勞動若沒有創造出新的價值，即使是洛克菲勒也無可進帳。

不平等的剝削

然則，商品之間的交換若是按照投資在商品上的勞動數量來進行，在這種平等的交換中，怎樣會出現不平等？在眾多商品中，馬克思通過揭露其中一種商品的殊異性質，解決了這個疑團。這項商品叫做「勞動力」。它是一切商品的基本。生產資料的擁有者——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就如所有其它商品一樣，勞動力的價值是按照投資在勞動力上的勞動的數量來計算的。例如維繫勞動者的生活和再生產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數

量。不過，消費這項商品——勞動力——就是工作，也就是創造出新的價值。這些新創造出來的價值的數量，比起勞動者本身所取得的數量和他花費在維持他的生存的數量，是要龐大得多。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是爲了剝削勞動力。這樣，剝削就成了不平等的根源。

產品中的一部分是用來維繫勞動者本身的生存所需，馬克思將這一部分稱爲必要產品；將工人生產超過這個必要產品的，稱爲剩餘產品。奴隸肯定是生產剩餘產品的，否則奴隸主便不會保留任何奴隸。剩餘產品肯定是由農奴生產的，否則農奴制便對土地貴族沒有用途。而在更大程度上，雇傭勞動者也在生產剩餘產品，否則資本家便毋需要購買勞動力。階級鬥爭的全部內容所在，都只是爲了爭取剩餘產品而鬥爭。誰擁有剩餘產品，誰就是局面的主人——擁有財富，擁有國家，持有通往教會、法庭、科學和藝術的“萬能鑰匙”。

競爭和壟斷

剝削工人的資本家們，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是由競爭決定；這種關係長期以來是資本主義進步的主要推動力。大企業比起小企業，更享有各種優勢，技術、金融、編制、經濟，還有相當重要的政治上的優勢。資本愈多，能剝削工人便愈多，便必然要在競爭中勝出。這便是資本密集化和集中化無可變更的基礎。

競爭對技術進步起著刺激作用的同時，不僅逐漸耗竭著中間的層分，並且也在自我消耗。一批爲數愈趨少數而力量愈趨龐大的大資本家領頭人，逐漸在眾多中小型資本家的殘骸或半殘骸上冒升出來。就這樣，從「誠實」、「民主」和「進步」的競爭中，生長出「有害」、「寄生」和「反動」的壟斷集團。壟斷集團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伸張本身的勢力，至本世紀開初，已經採有明確的形態。現今，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最權威的代表已經公開承認了壟斷集團的勝利。前美國司法部長荷馬·S·卡明斯抱怨說，競爭作爲抑制的作用已經逐漸轉移；在很大範圍內，甚至只是作爲一度存在過的狀況的朦朧

提示。不過，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作出診斷預測的時候，他早已指出壟斷是資本主義的內核中的固有傾向，而那時的資產階級世界仍舊把競爭看成是自然的永恆規律哩。

壟斷消滅競爭，標誌著資本主義社會開始解體。競爭曾經是資本主義創造性的推動力，並且是資本家的歷史依據。由於同樣的原因，消滅競爭，標誌著股票持有者演變成爲社會的寄生蟲。競爭須有若干自由：自由的氣候、民主和商業都會的政體。壟斷則需要政府愈專斷愈好；也需要關稅壁壘、「屬於它自己」的原始物資的來源和市場的活動場所（殖民地）。壟斷性資本解體的遺言，是法西斯主義。

財富集中和階級矛盾的增長

資本家及其擁護者在人民和稅務官的目光之下，用盡一切辦法來掩飾其財富集中的真正程度。資產階級報章無視於顯而易見的事實，仍然企圖維護資本家投資是「基於民主基礎上的」分配的幻覺。《紐約時報》反駁馬克思主義者說，美國仍有三——五百萬名雇有勞工的不同雇主；而儘管聯營股份公司無疑是代表著龐大得多的集中資本，比三——五百萬名個別雇主要多，但美國仍有著「五十萬間有限公司」。這種玩弄整體和平均數字的手法，只是要訴諸掩飾，而不是披露事物的真相。

從大戰開始到1923年，美國的廠房和工廠的指數從100下降到98.7，產業生產的總額則從100上升至156.3。在（1923-1929）那聳人聽聞的數年繁榮間，似乎每個人都大發其財，商業機構的數量卻是從100下降至93.8，而生產則從100升至113。不過，受到冗腫的肉身束縛著的商業機構的密集性，卻遠夠不上它們的靈魂——所有權的密集性。美國在1929年不錯是有30萬間有限公司，一如《紐約時報》正確地評述。這裡必要補充的只是，這30萬家的其中200家，也即是全部數位的0.07%，直接控制了全部有限公司49.2%的資產；4年之後，比例更躍升至56%。在羅斯福政府時代，比例相信只會是有增無減。實際控制著這200家最重要的有限公司的，只是爲數很少的人。美國的一個參議院委員會在

1937年2月發現，在過去20年來，最大的有限公司的其中12家所作的決定，相當於是對美國一大部分產業界作出指令。這些大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成員的數量，和美國共和政府的行政分支即美國總統的內閣成員的數量大致相等。不過，這些董事局主席們無法估量的強大權勢，卻是內閣成員們望塵莫及的。

在銀行和保險業制度裡，同樣能觀察到相同的過程。美國五家最大的保險公司，不僅吸納了其它同業，甚至也吸納了許多銀行。銀行的總數量，主要在所謂「合併」的形式下減少了，也就是這些銀行在本質上被吸納了。營業額快速增長。在眾多銀行之上，冒出了一個超級銀行的寡頭集團。銀行的資金和產業的資金合併，成為了金融超級資本。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內，假設產業和銀行以同樣的速度邁向集中化——實際上，集中化的發展速度在增加——那麼，在緊接而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壟斷資產階級們將會把整個國家的經濟囊括殆盡，不剩分毫。

這裡用了美國的統計數字，乃是由於這些數字更是準確和引人注目。在本質上，集中的過程在屬性上是國際性的。在整個資本主義各個不同時期，經歷危機週期的各個階段，通過所有政治統治方法，通過和平時期乃至武裝衝突時期，財富大量集中在愈趨少數人手上的過程一直無間歇地進行著，並且會一直進行下去，永不止息。在〔第一次，下同〕世界大戰的年代，當各個民族流血捐軀，當資產階級國家被國債壓垮，當財政制度已滾入窮巷並把中產階級一同拖垮，寡頭們從血腥和烏煙瘴氣中鑄造出空前龐大的利潤。在戰爭年月裡，美國幾家最大的公司其資產增加2倍、3倍、4倍或更多。其紅利暴脹達300%、400%、900%，或更大的百分數。

在1840年，即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付印前8年，法國著名作家托克維爾在他著述的《論美國的民主政體》書內寫道：「龐大財富趨於消失，小富數量趨於增加」。

這段行文被重複講了無數次，最先是作為對美國的參照，後來則用來參照一些較年輕的民主政體，如澳洲和新西蘭。托克維爾的觀點，在他當日誠然已經是錯誤的了。然則，財富的真正集中，乃是繼美國內戰後才

正式開始，其時已是托克維爾的臨終前夕。在本世紀之初，美國的2%人口已經擁有超過全國的半數財富。到1929年，同樣的2%的人口已擁有全國五分之三的財富。在同一時候，36000戶富裕家庭的收入，相當於1100萬戶中等和貧困家庭的收入。在1929-1933年的大衰退年代，壟斷性企業已經毋須訴諸公眾的施捨，反而更高踞在普遍衰落的國民經濟之上。接續下來，由新政催酵而生的微微顫顫的工業復蘇，又讓壟斷資本家們刮去一大羹油膏。失業人數在最低時是從2000萬人減至1000萬人；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最上層的富賈——不超過六千名成人——積累了多得荒唐的紅利。這些數字，是美國副司法部長傑克遜在就任反托拉斯助理司法部長期間提出來的明證。

富有學者良知的相當保守的經濟學家費汀南·倫德貝裡在他那部引起轟動的著作內寫道：「今日的美國是由最富庶的60家族所組成的統治集團擁有和控制，由不多於90個次富的家族支撐。」除此外，或許還可以加上大約350個處在第三階梯的家族；這類家族年入超過10萬美元。居支配地位的是前60個家族，它們不僅支配著市場，同時也支配著全部政府機構。他們才是真正的政府，一個在銀元民主制下的貨幣政府。

「壟斷性資本」的抽象觀念，就這樣地賦予了有血有肉的内容。這當中的意思就是，一個龐大民族的經濟和政治財富，經由一小撮家庭由血統和共同利益維繫而成的一個獨特的資本主義寡頭統治集團來差遣。人們不得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集中的規律，出色地通過了考驗。

馬克思的教義是否過時？

由競爭、財富集中和壟斷而來的問題，自自然然會帶出下列這個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否和亞當·史密斯等人的理論一樣，僅具有歷史的意趣。抑或是繼續有著實際的重大意義？回答這個問題所根據的準則很簡單：假如一種理論正確地估計到發展的路向，並且比其它理論更準確地預見到未來，其就會是我們時代最先進的理論，哪怕這種理論已經行之有年。

著名的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他的事業初期，實際上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繼後則修正了馬克思學說的所有更具有革命性的部分，特別是招致資產階級甚為不悅的那些部分。在1928年，在松巴特邁向其事業的終結之前，他推出了用來和馬克思的《資本論》抗衡的《資本主義》一書；這本書給譯成了多國文字，可能是近年來為資產階級經濟辯護陳詞的最著名的書籍。桑巴特在本書內向《資本論》的作者的宗旨致以唯心的贊許之後寫道：「馬克思預言：第一，雇傭勞動者的悲慘迭增；第二，隨著手工業和農民階級的消失，普遍『集中』的出現；第三，資本主義災難性的崩潰。這些狀況，沒有一種出現。」基於這錯誤的預測，桑巴特對立地提出了他自己的「嚴格地科學」的對立的預言：「資本主義在其發展方向上已經開始作出自我改造，它會繼續沿著這個相同的方向，從內部自我改造，在其達到最高峰點時，將會變得越來越加平靜、嚴肅和合理。」讓我們試圖沿著這條基本線索來核對誰是正確的吧：馬克思的診斷是災難，松巴特的診斷是平靜、嚴肅和合理。讀者會同意誰呢？這個問題值得給以正視。

「悲慘迭增論」

所以，財富在一極的積累，馬克思早在桑巴特之前的60年寫道，「會同時在相反的另一極，即生產出以資本的形式出現的產品的那個階級的一極，積累下來的悲慘、困厄、奴役、無知、兇殘和精神墮落。」馬克思這個在「悲慘迭增」名目下的論點，一直受到民主派和社會民主改良派的攻擊；尤其在1896—1914年期間，當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且給予工人——尤其是工人的上層分子一些讓步時，更倍受攻擊。世界大戰之後，資產階級怯於本身的罪行和十月革命，走上了宣揚社會改良的道路——其價值被通貨膨脹和失業即時勾銷——以致讓改良主義和資產階級教授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進步性改造的理論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雇傭勞動者的購買力的增長，桑巴特在1928年向我們保證道，「和資本主義生產擴大的比率成正比。」

事實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最繁盛的時

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經濟矛盾更形惡化；在那時相當廣大的某些等級的勞苦者的生活水準的提升，然而卻看不到，無產階級在國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卻是減少了。就這樣，美國的工業生產在轉入疲憊時期之前，從1920—1930年躍升了50%，而同一時期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總額，只增加了30%。換言之，雖然有桑巴特言之鑿鑿的保證，勞工在國民收入占的一份卻是大大地減少了。1930年開始，預示失業增加；至1933年，或多或少有系統地給予失業者援助，但失業者收到的救濟金，僅為他們工資損失的一半。所有階級一起不斷「進步」的幻想，至此銷聲匿跡。廣大群眾的生活水準的相對下降，被絕對下降取代了。工人大眾開始要樽節開支，先是減少娛樂，繼而是衣物，以至最後是食物。一般品質的物品、產品，先是由次等的品種來替代，不久更是由最劣等的來替代。按生活費用定期作出工資調整的規定條款這台自動樓梯急激下瀉，而各個工會看來像個束手無策的人，苦苦守著這台自動樓梯一起瀉下。

美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6%，而美國擁有的財富占全世界40%。儘管如此，美國全國卻有三分之一人營養不良、衣物不足，生活在非人環境裡，這是羅斯福也承認的。對於那些較少特權的國家，更有何話可說？上次戰爭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無可爭論地證實了所謂的「悲慘迭增論」。每一個能幹的統計學家，甚至那些記得算術的基本規則的政治家，現在都承認當今社會的兩極化在增加。

作為每個帝國資本主義的內在本質，法西斯政府只不過是帝國資本主義在衰落和反動到極致時的化身；當資本主義的衰謝把維持無產階級生活水準有所提高的幻覺完全磨滅殆盡，法西斯政府遂成為最後的救命稻草。法西斯主義獨裁就是公開承認貧困的趨勢，而這是較富庶的帝國主義民主政體仍然試圖用偽裝來掩飾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這麼仇恨地迫害馬克思主義者，正由於他們的政權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診斷的可怕的確證。當戈林以其劊子手和小丑的特有聲調宣稱槍桿子比黃油更重要，當卡·斯特羅—

卡薩諾瓦－墨索里尼忠告義大利工人要束緊他們的黑衫上的腰帶，文明世界表現出義憤填膺或是裝作義憤填膺。但同樣的情形不也是在帝國主義的民主政體內普遍出現嗎？

每一處，都用黃油來塗抹槍桿子。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工人，學懂束緊褲頭並且沒有黑衫。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淪為乞丐，依靠聯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至私人的慈善金度日。

後備軍和失業者的新次等階級

產業後備軍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機制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像工廠貨倉供應機器和原始物資，或店鋪供應成品一樣必不可少。沒有一支勞動力後備軍，生產的總體擴張或資本對產業迴圈週期定期漲退的適應，便不會有可能。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趨勢——固定資本（機器和原始物資）是以犧牲可變資本（勞動力）而得到增加——馬克思得出這個結論：「社會的財富愈大...產業後備軍也就愈大...固定的剩餘人口的數量也就愈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愈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規律」。

這個命題和「迭增悲慘論」融為一體，許多年來一直給指摘為「誇大其詞辭」、「帶傾向性」和「蠱惑人心」，現在已成為事情恰如其分、無可責難的理論性的反照。現下的失業者，再不能給看成是「後備軍」了，因為這群失業者的基本成員，已不再有被重新雇傭的任何希望。反之，這支失業隊伍註定要被不斷加入的新失業者擴充壯大。崩潰過程中的資本主義培養出一整代從不曾有過一份工作，而且也不會有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的青年人。這個新的、介於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間的次階級，被迫依靠社會的支付來過活。據估計，在1930—1938年的9年間，失業從美國經濟中去除了多於4300萬勞動力年均工作量。考慮到在1929年繁榮期的頂峰時，美國的失業人數有200萬人，而在繼後的9年間潛在的工人人數增加了500萬之眾，由此觀之，在那9年裡損失的勞動力年均工作量，必定是無可比擬地高出更多。被失業的瘟疫蹂躪至此的社會政體，已是病入膏肓，無可藥救的了。在差不多八十年前，當這種

疾病還僅是細菌的時候，已經被正確地診斷出來了。

中產階級的衰落

資本集中的統計數字也同時顯示出，中產階級在生產裡所占的比重及它在國民收入裡分得的一份，一直在持續下降。至於小有產者，或是被大有產者併吞，或是降到更次一級的低位而喪失了自主性，受人奴役，牛馬不如。在同一時候，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錯是催生了一支人數有所增加的所謂「新中產階級」——技術人員、經理、服務員、文員、律師，醫生等大軍。可是，有關於這個階層人數的增長，即使在馬克思當時也沒有奧秘可言的了。這個階層和老的中產階級沒有共通之處——後者是本身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擁有實質的經濟獨立的保證。至於「新中產階級」，則比工人更直接地依賴著資產者，很大程度這個新中產階級是工人的監工；再者，人們已經察覺到，有數量不少的「新中產階級」中人，是生產過剩下的冗員，其後果將是社會地位的降格。

「可靠的統計數字資料顯示出，」一位人士指出，「為數十分多的產業單位已經徹底消失，而作為美國生活的一個因素的小商人，正在漸進性地被消滅。」這位人士，與我們之前引述過的美國前司法部長卡明斯一樣，都是和馬克思主義者各不相干的先聲。不過，儘管馬克思早已有言在先，桑巴特與他的前人和後來者一起提出反對：「隨著手工業和農民階級的消失，普遍的集中仍不會出現」。在如許的論句、不負責任和無誠信下，不啻令人難以分辨是哪番論據更有說服力。像每個理論家一樣，馬克思首先是把每個基本的趨勢按其純粹的方式個別孤立出來，不這樣做，便根本無從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不過，馬克思本人是完全有能力通過具體分析來觀察生活的各種現象的；這些現象，是各種不同的歷史因素濃縮而成的產品。物質在不同的條件下有不同的下跌速度，又或者，行星的軌跡會備受外來的騷擾；這些事實，都不會使牛頓定律無效。

為了理解中產階級的所謂的「頑固性」，人們必須記著，中產階級最終命運的兩種趨

勢，即它的沒落和它從破產演變成無產階級的過程，不是沿著均勻的步伐或相同的幅度進行的。隨著機器蓋過勞動力的優勢不斷增加，中產階級的破產愈是持續下去，其超過它們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愈大，以至到了某些交接點，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必定會停止下來，甚至反溯而行。

就像生理學的運作規律在生長中的有機體得出的結果會和消亡中的殊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規律也是如此，它堅持發展中的或是解體中的資本主義的運作規律各有差異。這種差異，在城鄉互為關係的差異裡份外鮮明地顯示出來。美國農村人口的增長相對人口的總體增長較低；直到1910年時，農村人口的絕對增長一直繼續，超過3200萬人。在隨後的20年裡，儘管全國總人口有急進的增加，農村人口的數字反降為3040萬人，即減少了160萬人。但在1935年，農村人口再回升，達到了3280萬人，比1930年時多了240萬人。乍看起來，這種逆向過程令人費解，但這個現象一點也沒有違反城市的人口增長趨勢是以農村人口減損為代價的事實。同樣，也沒有違反另一個趨勢，即中產階級是愈趨原子化了，這種原子化的趨勢並且極其尖銳地展現出資本主義制度整體的解體。在危機最尖銳的1930—1935年時期，農村人口增加：事實很簡單，幾乎200萬眾的城市人口——乾脆說，就是200萬名饑餓的失業者，遷回到鄉村去，即回到被農夫棄置的小片土地或是親屬的農場去，以讓被社會摒棄的勞動力能派上用場，能有用於自然經濟生產來拖延半饑饉的生存狀態，而不是完全忍饑挨餓。

因此，問題不是小農夫、手工業工人和店主的穩定性，倒是他們的處境淒慘完全無助。中產階級不僅遠遠不是將來的保證，而且是過去的不幸和悲劇的遺骸。資本主義不能把這個階級一筆勾銷，就試圖令它有多低下就多低下，有多悲慘就多悲慘。當農夫的，非但得不到他的小片土地應得的租金，得不到資本投資的利潤回報，甚至也得不到一份不錯的工資。同樣地，市鎮上的小人物，也隨經濟的生而生，經濟的死而死，庸庸碌碌，在煩惱中苟活。中產階級之無產階級化，不

僅是由於赤貧化所致。這種狀況，令人難以找到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社會而反駁馬克思的理由。

工業危機

過去的幾個世紀和本世紀初葉，資本主義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它的週期性危機看上去只是偶爾的小煩惱。在對資本主義樂天信念大行其道的年代裡，馬克思曾經這樣評價道：民族的和跨國的托拉斯、辛迪加、卡特爾只是預示著對市場的管制，而這只不過是最後崩潰前迴光返照的徵兆。桑巴特說危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大戰前資本主義的結構已經讓我們今天的“危機問題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僅僅是十年後的今天，類似的論斷看上去已經淪為了笑柄。相反，馬克思的預測卻愈加凸顯出其說服力。人的器官可能因為若干次意外疾病的中沉澱的毒液的緣故而積重難返，同樣，壟斷資本主義因其本質也已經腐朽。

可真教人感到出奇，資產階級新聞界半心半意地反對壟斷，卻又訴諸這些寡頭以期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紐約時報》譏諷地評說，60家族若是操縱著美國的經濟生活的話，「就是顯示到美國的資本主義遠不是『沒有計劃』的……而卻是十分整齊地組織起來。」這樣的評論真實讓人不知所云。

資本主義已不能把任何一種它的趨勢發展到底。正如財富的集中沒有把中產階級取消一樣，壟斷也沒有消除競爭，只是破壞了它，把它搞得一團糟。所有六十個家族並不是按「計劃」生產的，這些計劃的各種變體計劃完全無意為各種經濟部門作出協調，倒是有興趣損害其它壟斷集團和整個民族的利益來提高本壟斷集團的利潤。這些計劃的互為交錯，在最後結算中，只會是加劇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壟斷獨裁和混亂不是互為排斥的，相反，卻是相輔相成，水乳交融的。

繼桑巴特鄭重推測推出他那對危機這個難題全然漠不關心的科學一年之後，在1929年，美國便爆發了危機。美國經濟在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空前繁榮之後，一下子滑落到極可怕的衰竭的死胡同。在馬克思的時代，沒

有人能預想出如許巨大的震撼！美國的國民收入在1920年首次提升至690億美元，但在次年便立即下降至500億美元；換言之下降了27%。在繼後數年，又恢復了繁榮，國民經濟再度上升，在1929年，達到了810億美元的頂點，但旋即在1932年跌至400億美元，也即是跌了一半有多。假如以1929年的勞動力和國民收入水準為標準，當時「只有」200萬失業人數，在1930到1938年九年間，人年均工作量損失了4300萬人次，國民收入損失了1330億美元。倘若這些都不算是無政府狀態的話，我真不知道什麼算是？

「崩潰論」

自馬克思去世至世界大戰年間，資本主義的成就讓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工會官僚的腦袋和心靈差不多要徹底臣服了。逐漸進步的觀點（「進化論」），真是從此穩操勝券，一往無前，而革命則被看成是野蠻主義時代殘留下來的遺骸。馬克思的診斷，例如資本主義的高度積累、階級鬥爭惡化、危機深化和資本主義的破產，並沒有給加以改進以讓這些診斷更為準確，反之，卻是受到本質上截然相反的論斷所抗衡，例如成為較平均地分配國民收入、階級矛盾軟化，和資本主義社會日漸改良。在那個經典年代，最有才華的社會民主黨人饒勒斯，希望給政治民主體制逐步注入社會的內容。這就奠定了改良主義的精髓。這就是另一種代行的診斷。這些預測，現在有多少倍言中的呢？

壟斷資本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生命是連鎖的危機。每一次危機就是一次大災難。為了挽救局部的個別的災難而動用上的關稅堡壘、通貨膨脹、增加政府支出和負債，給下一次的、更深更廣的危機打下了基礎。為爭取市場、原始物資和殖民地的鬥爭，使軍事災禍成為不可避免。一句話，就是為革命的災禍作出準備。真的，要同意桑巴特說的所謂的“年邁的資本主義會與年俱增地更加「平和、安靜和合理」”，實在不容易。說資本主義在喪失其最後一點理性的痕跡，也許恰當一些。不管怎樣，「崩潰論」壓倒了和平發展論，是毫無疑問的了。

資本主義的腐爛

對社會而言，市場控制不管是多麼的昂貴，人類到了某一階段，大約是直至世界大戰期間，透過局部的和全面的危機得到了成長、發展和豐富了自身。對於那個年代，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仍然是相對地進步的因素。可是，到了現在，價值規律的盲目操作拒絕再進一步提供服務。人類文明來到窮巷，止步不前。儘管技術思想又再一次勝利，物質的生產力仍然是停滯而無增長。對經濟的基本部門停止作新的投資的結果，是建築行業的世界性蕭條，這是最清晰無誤的沒落的症狀。資本家乾脆是不能再相信他們自己的制度的未來。由政府來刺激建設，意味著當加稅和縮減「自由自在」的國民收入，尤其當政府的主要的新建設是直接為戰爭的用途而設計的。

在人類活動最古老、並和人類最基本的的需求最密切的領域——農業，緊縮〔政策〕帶有特別惡毒和低劣的特性。私人所有制以其最反動的方式——小地主對農業發展設置和障礙，已不能再令資產階級政府感到滿意，它不無頻繁地訴諸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的援助，人工地對生產加以限制；這種作法，可以令到處在沒落時期的行會的手工藝人膽戰心寒。歷史將會記載，最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政府向減少種植的農夫頒發補助金，國民收入因而被人為地減少。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占人類壓倒性多數的饑民人數，在我們這個行星裡繼續以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增加；與此同時，農業經濟儘管在經驗和科學支持下具有宏大的生產性的可能性，卻沒有在日益腐朽的危機中出現。為了保衛一個陷入毀滅、瘋狂的社會秩序，保守派認為那是明智的政治；他們譴責向這種瘋狂作鬥爭的社會主義者，稱之為毀滅性的烏托邦主義。

法西斯主義和新政

為把資本主義從歷史性的滅亡中拯救出來的兩種方法，是法西斯主義和新政。這兩種方法以各種面貌出現，在現今世界範疇上拼過你死我活。法西斯主義為了阻止無產階級鬥爭復興，遂把搗毀勞工組織、破壞社會

改革和徹底取締各種民主權利，作為其綱領的基礎。在拯救「民族」和「種族」的名義下——這些名義是由腐爛的資本主義專橫地塑造出來的——法西斯國家的官方政策，把敗壞工人、令中產階級貧民化予以合法化。

新政的政策，是企圖用賄賂工人和農民貴族和方法來拯救帝國主義民主，在廣泛的範圍，這個政策適用於富裕的國家，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是典型的美國政策。政府試圖把這個政策的部分支出轉嫁到壟斷者肩上，勸誡他們提高工資、縮短勞動工作日，從而提高人民的購買力，擴展生產。里昂·勃盧姆試圖把這條訓示轉介到“法國小學”，可是枉費心機！法國的資本家和美國的資本家一樣，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卻是為利潤而生產。法國的資本家一向就預備把生產設限，甚至可以把已製造出來的產品毀壞——要是他的國民收入能從中得到更大的一份。

新政綱領計劃自相矛盾之處，從下面可見一斑：政府一方面向資本的大商賈諄諄訓誨，謂不患多而患寡；另一方面，卻又向削減生產者發放獎金。其混亂之極，無以復加。你們能做得更好嗎？——政府用這個挑戰把批評者駁倒。所有這一切的意思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局面是絕望的。

從1933年開始，也即是過去6年來，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向失業者一共發出了150億美元的救濟金。這個數目只是杯水車薪，代表著工人喪失的工資的極少部分。但從另一方面看，考慮到下降的國民收入，這卻是一宗龐大的數目。在經濟相對復蘇的1938年期間，美國的國家負債增加了20億美元，躍到380億美元的新點，比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最高負債點還要多出120億美元。1939年初，國家負債再進至400億美元的新點。接著會是什麼？債臺高築，對子孫後代誠然是個負擔。然而新政之所以可能，是由於有過去世代積累下來的巨額財富。只有十分富裕的民族才能夠用這麼窮奢極侈的政策來自我縱容。但即使這樣的民族也不能無限地依靠揮霍上幾代來過活。成績虛構而國家負債實質增加的新政策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極度反動，以及爆發一場帝國主義的劫掠擴張。換言之，它是朝著與法西斯主義政策相同的

途徑走去。

反常還是正常？

〔美國〕內政部長哈樂德·L·伊克斯認為「美國在形式上民主而實質上專制，是歷史上最奇怪的反常狀態之一」；他說：「美國這片由大多數人統治的土地，直到至少1933年時（！）是由壟斷者操縱的，而這些壟斷者反過來受到一小撮數量上微不足道的股票持有人的操縱。」這項診斷，除去暗示壟斷集團的統治隨著羅斯福上臺後會停止或減弱這一點，是正確的。不過，伊克斯所稱為「歷史上最反常的狀態之一」，實際上卻是資本主義無可置疑的常規。強者支配弱者、少數人支配多數人、剝削者支配勞動者，在在都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基本規律。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分野，只在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矛盾幅度上要巨大得多，也更殘酷得多。在美國，封建主義歷史的缺席、富庶的自然資源和擁有活力充沛、富有事業心的人民——一句話，所有能預兆民主體制無間斷地發展的先決條件都已經具備，被很多人視之為異想天開的財富集中因而能在這片大陸上進行。

伊克斯部長答應領工資的群眾，替他們向壟斷的寡頭們討回公道，他信口開河地說，湯瑪斯·傑弗遜、安德魯·傑克遜、亞伯拉罕·林肯、希歐多爾·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是今日羅斯福總統閣下的先行者。“實際上，所有我們祖國這些偉人們之所以名垂青史，”他在1937年12月30日這麼鼓吹道，“就是因為他們不屈不撓地同財富及權力過度集中的現象進行鬥爭。”當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不屈不撓的鬥爭”到頭來的結果還是財閥的統治。

伊克斯先生毫無根據地聲稱這場戰鬥一定勝利，又告訴民眾“聯邦政府無意與開明企業家為敵，新政的敵人只是那60個保守的寡頭家族，他們將其它商人置於他們的統治之下。”我們這位權威的發言人並沒有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在美國民主的保障下，在偉大的先賢的努力下，這些保守分子依然能讓其他開明企業家屈服於他們的淫威。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梅隆家族、範德比爾特家族、古根海姆家族、福特家族以及其它諸多大家

族，並非合眾國的入侵者，與科特茲入侵墨西哥毫無共同之處，這些人都是從「人民」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說得更精確些，是從「開明的產業家和商人」中生長出來，沿著馬克思預測的脈絡而成了資本主義天然的頂點。既然一個年輕力壯、處於全盛期的民主政體也不能制衡處在初始時期的財富集中的過程，那麼，還有可能教人相信——哪怕是相信一分鐘——一個衰敗中的民主政體，能足以令已臻至極致的階級對抗的軟化嗎？無論如何，按照新政的經驗，是無法產生這種樂觀的。身處政府理事會高位的羅伯特·H·傑克遜在反駁大商家對政府的指控時提出資料證明，在羅斯福在位時，資本大亨們獲得的利潤遠遠超出他們自己在胡佛總統時代所不曾夢想的高度；從而可見，羅斯福打擊壟斷集團的成效，無論如何也不曾超過他的前輩。

儘管改良主義者感到自己應該去保衛資本主義的基礎原則，但改良主義者因其本質使然，證明他們自己是無力用經濟管轄的措施來驅策他們的法律。他們除了說教，可以做什麼呢？伊克斯像其它內閣成員和新政的宣傳者一樣，最後都以呼籲壟斷資本家們不要忘記禮儀和民主政體的原則來收場。這和向上蒼求雨有什麼分別？毫無疑問，馬克思對生產資料擁有者的看法，更要科學得多。我們從《資本論》讀到：「作為資本家，他只是資本的個人化。他的靈魂是資本的靈魂。但資本只有一個單一的存在目的——創造剩餘價值。」資本家的行為要是由個人的品格或內政部長的感情抒發來主使決定，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平均價格、平均工資，也不可能有簿記或任何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然而簿記行業繼續鼎盛，並且還是贊成歷史唯物觀的強有力的論據。

司法空談

前美國司法部長卡明斯在1937年11月說：「除非我們毀滅壟斷，否則壟斷會找到方法來毀滅我們的大部分改革，以至到了最後，會降低我們的日常生活水準。」卡明斯一方面援用令人瞠目的數字以證明「財富過分集中和經濟控制的趨勢是清楚無誤的」，

同時他亦不得不承認用立法和司法手段打擊托拉斯的鬥爭迄今仍是毫無結果。他抱怨說，當涉及到「經濟結果」的事情，「很難去證實一個險詐的意圖」。這正就是問題所在！尤有甚者，是反托拉斯的司法鬥爭更帶來了「亂上加亂，混淆不清」。這個巧妙的送句，頗為恰當地表達出民主制法制在打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時是多麼的無助。沒有根據能希望卡明斯先生的繼任人墨菲先生會更有幸能解決這些難題；正是這種裝腔作勢，見證了空談在經濟思想活動、經濟領域是多麼的無助。

把昨天帶回到今天

對於羅斯福政府任下的前預算案總監劉易士·W·道格拉斯教授譴責政府、「在一個領域攻擊壟斷的同時，又在其它多個領域中扶育壟斷」的說法，人們除了同意之外，別無他話。可是，就事物的本質來說，卻又不會有另一種局面。按照馬克思的見解，政府就是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

壟斷資本家們是統治階級現時最強大的部分。政府無從對壟斷進行一般性的打擊，也即是無從打擊它按其意志來進行統治的階級。當政府打擊其某方面的壟斷時，便必須尋找其它方面的壟斷的盟友。當政府與銀行和輕工業界聯盟的時候，它有時能夠向重工業界的托拉斯施予打擊，儘管這樣做並不會令後者停止賺取驚人的利潤。

道格拉斯沒有拿科學來和官方的空話針鋒相對，卻僅是拿出另一種空話而已。他把壟斷的泉源看成是來自保護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並且據此而發現拯救社會的方法不在於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卻是降低關稅。他預計：「除了恢復市場自由，」否則「其它所有機構如企業、言論、教育和宗教的自由能否生存便成疑問。」換言之，要是不恢復國際間的貿易自由，那麼，不管在何處在某種程度上仍然生還的民主政體必然會讓位給革命專政或法西斯專政。然而，沒有內部的貿易自由——也即是競爭，國際間的貿易自由是無從想像的。而在壟斷的支配下，競爭自由無從想像。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先生和伊克斯先生一樣，也和傑克遜先生、卡明斯

先生、乃至羅斯福先生本人一樣，並沒有費神向我們開出他打擊壟斷資本主義的藥方，同樣，並沒有開出打擊革命或極權政體的藥方。

貿易自由就像競爭自由和中產階級的繁榮一樣，無可奈何花落去。把昨天帶回到今天，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改良派現在餘下的唯一藥方：給中小型產業家和商人帶回來更多自由；把貨幣和信貸制度改變，以有利於中小型產業家和商人；將市場從托拉斯的主宰下解放出來；消滅股票交易所的職業投機家；恢復國際間的貿易自由，等等，無邊無際。改良主義者甚至夢想限制應用機器，禁制技術，因為這些東西令社會的均衡受干擾，引起憂慮。美國一位首屈一指的科學家，就這類倡議尖酸地評論說，最保險的做法顯然是返回到快快樂樂的阿米巴蟲的階段；若這樣做不行，也可以當個心滿意足的豬獮。

密立根和馬克思主義

可是，不幸地，這樣一位科學家：羅伯特·A·密立根博士，也是一樣的往後看而不是往前看。在他1937年12月7日以保衛科學的名義所做的演講中，有這樣一段話：「美國的統計數字顯示，在科學得到最迅速的應用的過去的50多年來，人口中「獲利的受雇傭者」的比例有穩定的增長」。這種用保衛科學的偽裝來保衛資本主義，不能說是快快樂樂的。過去半個世紀來，恰好正是「時間的聯繫破裂」、經濟學和技術的互為關係尖銳變易的時期。密立根所指的時期，包括了資本主義衰落的起始和資本主義最繁榮鼎盛的時候。

對在全世界範圍內開始衰落的狀況，三緘其口，就是為資本主義開脫。密立根博士對我們說，沒有提高生產類別的話，任何一種分配制度都無法滿足人的需要。毫無疑問！密立根拿這種順手拈來的扯淡來拒斥社會主義，但這種言論即使是對亨利·福特也難以帶來光彩的。可惜這位有名的物理學家沒有向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失業者們解釋，他們可以怎樣參與提高國民收入。泛泛空談個人主動性和提高生產力的救贖恩寵之類的抽象

說教，肯定不能為失業者帶來工作，不能填補預算案的赤字，也不能把民族的商業帶出窮巷。

讓馬克思得以排眾而出的是他多方面的天才、和理解各個不同領域的內在關聯所衍生的各種現象和過程的能力。他不是自然科學的專家，但卻是最先賞識這個領域的偉大發現的重大意義的人之一，如達爾文主義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馬克思的卓越，更多是借助於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智力。資產階級科學家或者會認為他們的思想比社會主義優越，不過，密立根的事例不啻再一次證明了，在社會學的領域上，資產階級科學家們仍然是誇誇其談的庸醫。他們需要學習的是馬克思的科學思想。

生產力的可能性和私有制

1937年年初，羅斯福總統在向國會致詞時，表達了他意欲把國民收入提高到900億至1000億美元的願望；不過，他卻沒有提示究竟是怎樣做到。這個計劃按其本身是十分溫和的。在1929年時，失業者約有200萬人，國民收入已達到810億美元。按照既有生產力的趨勢，不僅能夠綽綽有餘的達到羅斯福的計劃，並且還可以相當大幅地超過之。機器、原始物資、工人，樣樣具備，更不用說人民對產品的需要了。假如在萬事具備下這個計劃仍然不能實現——而確是無可實現——那便只有一個理由，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社會擴充生產的需要之間出生了無法調和的對抗。由政府贊助、著名的「生產力潛力全國性調查」根據零售價格作出計算後得出結論說，1929年用於生產和各類服務的開發總數約近940億美元。而生產力全部實有的可能性要是都得到使用，這個數字更會提高到1350億美元，即平均每個家庭每年43.7萬美元，足夠讓每個家庭享有體面和舒適的生活水準。必須補充的是，「全國性調查」的結果是根據美國現有的生產編制來計算的，而這些生產編制是從資本主義「無政府」的歷史中生成的產物。假如這些裝備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基礎上重新裝置的話，則生產的計算結果會相當大幅度地超越上述數字，能讓所有人在極短的工作日的基礎上享有高度舒

適的生活水準。

所以，拯救社會毋須要制衡技術發展，毋須關閉工廠，毋須用獎勵來驅使農民破壞農業，毋須把三分之一工人變成貧民或擁護狂徒來當獨裁者。所有這些以維護社會利益為名而實行的聳人聽聞的措施完全是不必要的。急切而必需的措施是剝奪那些寄生蟲們對於社會產品的支配權，並在合理計劃的指導下，重新組織社會生產。只有這樣才能掃蕩盡社會中的污穢，治癒其頑症。所有能自食其力的人都應該擁有一份職業，工作日應該逐步縮短，社會成員的日常必需品必須得到保障。那個時候，“資產”、“危機”、“剝削”之類的詞語將成為“歷史名詞”，人類將最終跨越一個歷史的門檻，真正的人性將綻放光芒。

社會主義的必然性

馬克思曾經這樣寫道：“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數目不斷減少，貧困、被壓迫、被奴役、退化和被剝削的群眾越來越多；但日益壯大、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模式之桎梏。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最後達到了與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喪鐘就會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馬克思來說，這些主張並非其個人偏好或者臆想，命令或者訓斥根本無法重建這個社會；從一方面來說，歷史發展的內核決定了生產力一定成熟到了一定程度；另外一方面來說，生產力的發展卻又受到價值規律的擺佈。某些知識份子在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上冥思苦想，對馬克思的學說置若罔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並非必然，而僅僅是有可能而已。這是種言之無物的鑽牛角尖。顯而易見的，馬克思無意暗示社會主義會不須經過人的意志和行動的努力而自行來到——這種想法簡直荒謬絕倫。馬克思預言，由於經濟崩潰，資本主義發展勢必告終——這崩潰刻下就在我們眼前發生——除了把生產資料社會化，其外別無其它出路。

生產力需要有一個新的組織者和新的主人，而由於存在決定意識，馬克思毫不懷疑工人階級經過付出錯誤和失敗的代價後會達致對局勢的理解，並且或遲或早得出必要的實際結論。

把經由資產階級創造的生產資料加以社會化所帶來的好處，現在已不僅通過理論來展示，並且也從蘇聯的實驗中得出展示——儘管這實驗仍帶有諸多局限性。不錯，資產階級式的反動派不無詭計地拿史達林政權作為稻草人來反對社會主義思想。可是事實上，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更遑論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蘇聯民眾繼續活在困苦之中，無所不能的特權階層騎在全民族和民族的苦難之上，官僚的鐵腕橫行無忌——所有這些都不是推行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所造成的結果，而卻是被圍困在資本主義的包圍圈內的蘇聯的孤立和落後的結果。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計劃經濟也能在劣境中展示出其無可匹敵的優點。

各種名目的資本主義拯救者，從民主派到法西斯分子，為了防範「剝奪者就要被剝奪」而企圖對資本巨頭的權力加以限制，或起碼是給以變形偽裝。他們所有人都看到其中許多人甚至公開承認，改良主義改革企圖的失敗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革命。他們所有人都沒法展示他們用來拯救資本主義的方法只不過是反動的方法和毫無希望的泛泛空談。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必然性的論斷，從而在另一個方面得到確證。

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

自1929-1932年大危機時期開始大行其道的技術統治的計劃，是在正確的前提上確立的；這個前提就是，只有通過把處在科學的最高水準的技術和為社會服務的政府聯合起來，才有可能令經濟合理化。惟當技術和政府從私有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這個聯合才有可能。偉大的革命任務正是從這裡開始。為了把技術從私人利益的小集團陰謀中釋放出來並且把政府置於為社會服務的位置，就有需要「剝奪剝削者」。惟有一個有興趣于解放自身、反對壟斷性的剝奪者的強大的階

級，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惟有與無產階級政府的步調一致，合格的技術專家階層才能夠建設一個真正科學的、真正屬於全國民的經濟，亦即是社會主義經濟。

要是能在和平、漸進和民主的道路上達到這個目的，誠然最好。可是已經過時的社會秩序從來都不會毫無抵抗地讓位給它的繼承者。民主政體在它處在年輕力壯的盛年時既然也證明是沒有能力阻止富豪統治奪去財富和權力，那麼，有可能期望年老破敗的民主政體會有能力變革由60大家族不受約束的統治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嗎？理論和歷史教導我們，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即革命，是社會政體轉移的先決條件。即使在美國，要是沒有內戰亦無法廢除奴隸制。「暴力是每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至今為止仍未有人能夠推翻馬克思就階級社會的社會學而提出的這條基本的原則。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為社會主義打開一條通道。

馬克思主義在美國

北美洲共和國在技術領域和生產組織形式上遠遠超出其它國家。在未來，全人類而不僅是美國人將在這個基礎上建設。可是，就在這同一個國家裡，社會進程的各個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步伐，這取決於各個特殊的歷史條件。美國一方面享有巨大優勢的技術，然而另一方面其經濟思想不論右翼或左翼卻是極其落後的。約翰·L·路易斯的見解和佛蘭克林·D·羅斯福大致相若。若考慮到路易斯所處的位置的性質，他的社會作用雖不能說是反動，可比羅斯福無可比較地保守得多了。在某些美國人的圈子裡，人們傾向不作任何科學性的批評，乾脆地用一句「非美國的」來否定、摒棄這種或那種激進的理論。可是，做出區別的準則又在哪裡？

基督教義連同對數、莎士比亞詩歌、公民和人的權利意識，及其它不無重要性的人類思想的產物一同被輸入到美國。今天，馬克思主義也被歸入這個類別。

農業部長亨利·A·華萊斯把以下這些罪名加給本文作者：「極端的非美國的教條狹隘性……」然後運用很懂得怎樣和對手周旋的傑弗遜的機會主義精神來對付俄國的教條

主義。華萊斯顯然從未有過這種念頭，即一個民族之採取妥協政策，並非出於某些非物質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使然，而實際上只不過是物質條件的產物。一個迅速致富的民族，因其具有充裕的物質儲備而能在敵對的階級和黨派之間進行調解。另一方面，當社會矛盾尖銳化，妥協的基礎亦會隨之消失。只因美國具有用之不竭的處女地、無盡的天然資源和看似是無窮盡的發財致富的機會，才免於「教條狹隘性」了罷。真的，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然而當那個不可避免的時刻來臨，妥協的精神也無法阻擋內戰的爆發。而無論如何，構成「美國主義」基礎的物質條件現在已日益成為過去的東西，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傳統意識形態的深刻危機。

勞工界的圈子如同資產階級界的圈子一樣，當馬克思發現的價值規律在每個人的思想中發揮作用的時候，作為解決日常性即時任務的經驗主義思想似乎已經足夠派上用場的了。可是，這同一個規律在今天已經陷入不可調解的自相矛盾。它不是促進經濟發展，而是削弱自身的基礎。妥協的折衷主義思想以及它的哲學前輩實用主義已經遠遠不敷應用；相形之下，把馬克思主義貶抑成「教條」的否定或輕視態度，就變得日益空洞、反動，以至十分可笑了。相反，是「美國主義」的傳統思想已經成了無生命力的僵化的「教條」，除了引起錯誤和混亂，別無用處。在這同時，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應用到美國，則益發具有生命力和針對性。《資本論》的理論基礎雖然取材於各國的材料，尤多是英國的材料，它則是對純粹的資本主義、廣義的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本身所作的一項分析。當資本主義以處女姿態成長、無歷史土壤的美國毫無疑問地最接近資本主義的理想類型。

恕我冒昧華萊斯先生：美國是按照馬克思的見解而不是傑弗遜的原則而發展起經濟的，正如承認美國是按照牛頓定律來圍繞太陽轉動，也不至於冒犯到這個民族的自尊。馬克思在美國愈是受到漠視，他的學說在當前就愈激發起人們的興趣。《資本論》給美國的痼疾提供了無可指責的診斷和不可更易的症候預測。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學說

比起胡佛和羅斯福、格林和路易斯的思想見解更富有一種新的「美國主義」的味道。

不錯，美國現時是有大量關於美洲經濟危機的獨具創意的著作；不問這些著作的理論前提是什麼——反正這點通常都缺乏——只要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是就美國的資本主義的各種毀滅性的趨勢提供了一幅客觀的圖像，則他們的考察看起來就像是馬克思理論的直描。不過，當這些作者們頑固地自我約束，不作任何確定結論而自限於暗淡的預測，或使用「國家必須理解」、「公眾輿論必須考慮」之類庸俗的勸諭時，保守的傳統原形畢現。這些書籍，就如刀不設刃，羅盤不備指針一般。

美國在從前不錯是有過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是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馬克思主義者——毋寧說，是三種怪異類型。第一類是那些被逐離歐洲的政治流亡者，他們盡其所能但得不到任何反響；第二類是孤立的美國團體，如迪里昂派。這一類人，隨著事態發展並且也由於本身的錯誤，結果變成了小宗派；第三類是受到十月革命所吸引，並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但與美國無關的學說而給以同情的業餘愛好者。所有這三類人的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運動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開始出現。在這方面，美國亦一如其它方面，將在幾步跳躍裡就趕上並大大超越歐洲。進步的技術和進步的社會結構將在學說的領域內鋪平它們的道路。馬克思主義最優秀的理論家將會在美國的土壤出現。馬克思將會成為美國先進的工人的導師。《資本論》第一卷的刪節本，將會是他們接近完整的馬克思的唯一開初的一步。

資本主義的理想鏡子

《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其時，英國資產階級對世界的統治仍未受到挑戰。商品經濟的抽象規律在資本主義達到最高度發展的國家內自然而然地找到最充分的體現——即是最少依靠過去的影響而得到體現。馬克思的分析雖然注重英國，但他的眼界卻不局限在英國而卻是在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他把當時所處身的英國用來作為資本主義在那個時

代裡最好的一面鏡子。

英國的霸權現在已經成了歷史長河中的追憶。作為資本主義始祖的優勢早已轉為劣勢。英國的技術和經濟結構已經陳腐過時。這個國家繼續憑藉業已成為一份昔日遺產的殖民帝國在世界上佔有席位，而不是憑藉進取性的經濟潛力。這點恰好解釋了張伯倫用基督慈悲的態度來對付法西斯分子在國際間的強盜行徑，這種態度教大家目瞪口呆。英國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意識到他們衰落的經濟已經愈來愈無法和他們在世界上的位置相容，一場新的戰爭勢必將帶來大英帝國的沒落。法國「和平主義」的經濟基礎本質上和英國異曲同工。

德國恰好相反：她利用了本身的歷史落後性在資本主義迅速上升期中帶來的便利，用全歐洲最完備的技術把自己武裝起來。由於民族根基淺窄、天然資源短少，德國動力充沛、發乎必需的資本主義在世界勢力的所謂均衡狀態中遂演化成爲一股最具爆炸力的因素。希特勒癲癲式的意識型態不過是德國資本主義癲癲病的倒映而已。

比起德國，美國除了爲數眾多的無法估價的歷史角色的優勢，美國的發展享有不可計量地廣闊得多的領土和豐富得多的天然財富。北美洲共和國在本世紀之初把大不列顛英國拋開老遠之後，成為了世界資產階級的堅固堡壘。深植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所有潛能，在那裡找到了最高的表達形式。資產階級在我們這個行星再不能找到一處地方能超越它在美元共和國達到的成就；這個共和國已成為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最完美的鏡子。

正如馬克思寧可引用英國的統計數字，如英國的議會報告、英國的「藍皮書」等等作為他的陳述的根據，出於相同的理由，我們在這篇簡略的導言裡主要是取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的經驗來作依據。不須贅言，要從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中援引相應的事例和數位並非是難事，但這麼做不會帶來質的增加，得到的結論也會相同，差別只在於那些事例會更少些震撼性了罷。

正如法國一個金融家貼切地指出，法國的人民陣線經濟政策不過是美國的新政「小人國改編版」。顯而易見的是，在理論分析

上，與巨人打交道要比和小矮人打交道無可估量地方便得多。正是羅斯福的大規模實驗顯示了只有奇跡才可拯救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但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剛好制止了奇跡的發生。符咒和禱告從未停止，但奇跡就是不來。顯而易見，資本主義假如能有重生，則只會發生在美國而不會是其它地方。但重生沒來。巨人不能達成的事，小人們更難達成。我們在美國的經濟領域漫遊的意思，就是要為這個簡單的結論打下基礎。

宗主國和殖民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上寫道：「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按字面的意思來看待這個見解。每個走上資產階級發展道路的國家，毫無疑問的都有生產力增長和社會不協調加深的過程；然而，人類所有發展中必然經歷過的、有著自然和歷史性原因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準之間不平衡的狀況，只有在資本主義下才變得尤其尖銳，並使到不同經濟類型的國與國之間產生了從屬、剝削和壓迫的千絲萬縷的互相依存的關係。

只有為數很少的國家，已全面地經歷過馬克思作過詳盡分析的從手工業、家庭工業進至工廠的有系統的符合邏輯的發展。商業、產業和金融資本從外部侵入落後國家，一方面破壞著自然經濟的原始形態，另一方面把受到破壞的自然經濟納入西方的世界性的產業和銀行制度之內。在帝國主義的鞭子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覺自己被強迫拉離某個發展階段，與此同時，滯留地在某個水準上。印度的發展並非是英國發展的複製本，她是後者的增補本。可是，為著理解如印度之類落後的附庸國的多重性的發展的形態，就有必要時刻記取馬克思從英國的發展中得出的經典藍圖。勞動價值的規律一視同仁地指導著倫敦城投機者的算術和遠在天邊的海德拉巴城的貨幣兌換交易，兩地的區別，只在於後者所採用的是更簡單、更少些使用手腕的方式。

發展的不平衡給先進國家帶來莫大利益，儘管程度不同，然而其繼續發展是在損

害落後國家、把落後國家變為殖民地或至少是令它們無從躋身資產階級貴族行列。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財富不僅來自剝削本國無產階級的剩餘勞動，也不僅來自劫掠本國的小資產階級，而且還來自對海外殖民地的系統性的掠奪。通過對其他民族的剝削，資產階級的剝削得到補充，他們的權力加強了。宗主國的資產階級從而能從殖民地得到的超級利潤中撥出一部分，來穩住其本國的無產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上層。若不是這樣，就壓根兒不可能有任何方式的穩定的民主政權。在其擴充了表現形式，資產階級民主已變成、並會繼續維持一個只有最具貴族派頭和最剝削的民族才有資格享有的政府形式。古代的民主建基於奴隸制；今天的帝國主義民主是建立在搶掠殖民地的基礎上的。

形式上幾乎全無殖民地的美國，卻是歷來所有國家中最富特權的國家。來自歐洲的富於進取性的移民侵佔了一個無比富庶的大陸，把土著居民殺盡滅絕，掠奪了墨西哥最好的地區，把獅子之國的世界財富據為囊中之物。從那時積存下來的肥脂，沿至資本主義沒落時代的今天仍然大派用場，得以潤滑民主的齒輪和輪胎。

新近的歷史經驗以至理論分析表明，民主發展的速度及起穩定性，是與階級矛盾的緊張程度成反比的。在較少特權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是俄國，另一方面是德國、義大利之類的國家），由於不能產生相當數量和穩定的工人貴族，民主從未能真正發展起來，故而是較易向獨裁屈服。不過，資本主義每沉愈下的癱瘓狀態也正在給最具特權和最富裕的國家準備相同的命運；差異只在於時間的先後而已。工人生活條件無以控制的惡化，令資產階級賦予工人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的可能性愈來愈少，哪怕這個權利是局限在資產階級的議會架構之內。任何人如果對於法西斯主義取民主而代之的過程給予其它解釋，都只不過是唯心的朦朧和自我蒙蔽而已。

帝國主義在毀壞資本主義舊有的宗主國民主的同時，又妨礙著民主在落後國的興起。在新時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沒有哪

一個國家完成民主革命——尤其在農業關係的領域——的這個事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所致；帝國主義已成為經濟進步和政治進步的主要絆腳石。壟斷的寡頭和他們的政府對落後國家的天然財富進行掠奪，並蓄意壓制落後國家的工業的獨立發展；在同一時候，又向這些國家內最為反動、寄生的和半封建的本地剝削者提供財政、政治和軍事支持。當代世界經濟最惡毒的瘟疫是人為地保存農業野蠻狀態。殖民地人民為解放自身的鬥爭，越過了中間介入的階段，將其必要的鬥爭轉化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從而把自身和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鬥爭聯成一線。至於殖民地的起義和戰爭本身，比以前更激烈的動搖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致使資本主義世界復蘇的奇跡比先前更渺茫。

世界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達成的兩項歷史功績，一是把技術置於高度水準，另是把世界各個部分由經濟紐帶聯結起來，有條理地利用我們這個行星上資源的物質的先決條件從而得到保證。但資本主義無從完成這個迫切的任務。各個劃地為牢的民族國家及其關稅所和軍隊繼續成為禍福擴散的窩藏所。另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早已超出民族國家的界限，從而讓一度是進步的歷史因素演變成不可忍受的遏制。帝國主義戰爭僅是生產力反抗國家界限的爆鳴而已，因為國家界限對生產力已成了過度的限制。所謂的絕對主權的計劃，和回復到一個自足的、設下界線的經濟體毫不相干；它看來不過是把民族基地改造就緒，以能隨時投入到一場新的戰爭。

人們一般相信，自凡爾塞條約簽訂後，地球上的勢力範圍已經被分割乾淨。但新近的眾多事態在提醒我們，我們的行星仍有著許多土地不曾受到搶掠或不曾受到充分搶掠。義大利奴役亞比西尼亞，日本試圖吞占中國，德國厭倦等候以前的殖民地重投懷抱，遂把捷克斯洛伐克變為殖民地。義大利強行進入阿爾巴尼亞，巴爾幹半島的命運現在岌岌可危。美國對「外來者們」包圍著拉丁美洲豎起警覺。帝國資本主義的基本政策仍然是為爭取殖民地而鬥爭。不論世界是如

何地分割得細緻無遺，分割的過程永不停息；重新分割世界界線的問題在帝國主義勢力交易的關係裡只會一次又一次的再度成為當前要處理的問題。這就是目下各種重新備武、外交動盪和戰爭結盟的實在理由。

把迫在眉睫的戰爭當作是民主思想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衝突來顯示的所有企圖，都屬於庸醫騙棍或愚昧之徒。政治形態有所變化，但資本家的胃口依舊。假如英倫海峽兩岸任何一方明日建立起法西斯政權——這個可能性是任誰也不敢否認的——巴黎和倫敦的獨裁者將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樣，幾乎不會放棄他們對殖民地的侵佔權利。無可抗拒地伴隨資本主義制度垂死的危機而至的，是為重新分割世界而拼個你死我活的絕望的鬥爭。

局部的改革或七拼八湊的修補將無助於事。歷史的發展已經來到其中一個關鍵性的階段，即只有廣大群眾的直接干預能掃除所有反動的障礙物，新的政權將奠定基石。計劃經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亦即是先從一個民族開始繼而在全世界層面把理性引進人類關係的領域。這個過程一旦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將從一國擴散至另一國去，其威力將遠遠超過今日法西斯主義氾濫的勢頭。落後國家在先進國的榜樣和援助之下，勢將被捲入社會主義的渦流中去。徹底腐爛的關稅閘門將要坍塌。令歐洲和全世界四分五裂的各種矛盾，將會在社會主義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框架裡、在歐洲以至全世界找到自然而然的、和平的解決方案，獲得解放的人類將把自己提升到最完整的高度。

寫於墨西哥，D.F.柯約亞崗（Coyoacan, D.F.）
1939年4月18日

（本文是《卡爾·馬克思思想萬歲》一書的前言。中文譯本由史丹譯自尋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小冊子《馬克思主義與當代》）

試讀一篇一九六三年冬至詩

吳萱人

這原本是不大會做成的事。事緣一位小友遊行相逢，熱情力讚新書，隨又得「十月」社（不是出書機構）重資郵贈；更意料不到的是，輾轉竟接到作者惠函、約晤，及再獲贈珍貴詩集（不是該書）。直至，聚焦於一篇新詩。

力讚的新書，名《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作者胡洛卿，二千零九年三月，天地圖書初版。

再獲的詩集，《苦口詩詞草》，謝山（越秀）著，一九九六年，香港文藝出版社初版。

聚焦的新詩，題《水滴》，寫於一九六三年冬至，是詩人寄給同派戰友胡洛卿互勉的作品。兩年後又冬至，有《星星》新作。前作錄引於書內第一二九頁，改題：《我是一顆渺小的水滴》（用了詩的起行為題），後作改題《星》單字詞，刊一三一頁。讀者很易留意到，兩作均寫於「冬至日」。冬至日不像新正元旦一類常會下筆開篇的日子，那麼每逢冬至寫詩，一定有了特別心事。

不錯，無論近體詩（我們現在普遍稱之舊體詩）或詞，以至新詩，謝山越秀，竟成一個大痛的「冬至詩」系列。《苦口詩詞草》由謝山自編，在港地出版，得亦自燕地幽禁返港，報上闢欄「島居新文」的羅孚，獲閱詩集後，一口氣寫了七天七篇評介文字。祇讀文題，便可貫穿羅孚讀後心聲：謝山和苦口詩詞草／「呼牛呼馬」的托派／年年冬至有悲歌／謝山苦口非苦面／「青史故人同戰鬥」／血淚文章一紙書／「不信千秋無定評」。

當年所謂蔣家「國民政府」，奉行聯俄容共的政策一夜變色，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大清黨，即殺人萬千於街頭牢獄，而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冬至日，發生全國捕拿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共產黨效法國民黨，雷霆萬鈞，犁庭掃穴，托派得了個痛徹的紀念：「十二月二十二日案」。文革後，他們都被靜悄悄地釋放，但「平反」一直不

見。謝山說得好：

『表面上看，甚麼平反等等，受害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實際上，從政治上看，最大的受益者是製造冤案的當事人。』（書頁二五九）

這麼透徹的洞見，放諸所謂要求中共黨「平反六四」，同理且有啓迪。因着這點，我相信了謝山之所以是一位真正的極具理析能力的革命者。

●
回頭說本文又所以「原本是不大會做成的事」罷。

都是筆者自惹的禍。得唔大姐之後，寫了一篇印象式的短詩：《珍希記》。又躲懶地尋章摘句，在謝山創作最旺，而且相對心情歡慰的年份，讀着一九七六年寫的《念奴嬌》，內有「深感卿情意」句，便向大姐報知是「先生的歲月留聲」。我的自以為聰明，把歷時十年，為之寫下十多萬字的一位詩人——不，作者在書的後記說：『把謝山稱作詩人』，非他所願，但他一生沒留下甚麼。——那就是矢志不移的革命者和他的那時代同道人，不能撫平的傷痛，暫撥一旁；從永恆的詩句內，尋永恆的部分。

也不錯和不愧為誌念去者的另一方法。

但無從聰明逃避，作者細心加美意，給我再寄兩篇新詩的電腦列印本和四十七年前抄下在「工作記要」冊內的影本。捧着便很有感覺和微微發顫，它斷斷不止是詩，它寄附的內涵太多太多。就詩藝的功力，羅孚便經已指出：

『鄭超麟說在自己之上。我看這不是自謙，在格律方面，他十分精通，詩意也濃，古文的造詣也好。』

羅孚的七篇文字，似乎刻意留隙。說『第一首是直接寫「十二月二十二日案」的』。但揭開《苦口詩詞草》，七言律詩《壬寅冬至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二日）》之前，是一首新詩！題《給不相識的朋友們》。它可

是一百九十三首中的開篇；羅孚是不是對謝山的新詩作品，不特別欣賞或垂注了。

編過本港重要新文學刊物《文藝伴侶》的羅孚，當然極懂新詩，從他當年刻意網羅一批現代詩寫手，可見一斑。新文學運動以來，健將崛起無數，風雲過後，都紛紛回頭寫舊詩，以融入源遠的傳統和文化意蘊。所以，由於有悠久前人遺產、華章典故支援，泰多得心應手；相反，同一位詩人而欲「一喉兩歌」的話，那便要看他是否由「新」返「舊」，或看從「舊」試「新」。

《詩人謝山》作者自謙『對詩詞一竅不通』（後記，頁三三七），事實卻是少年時『斷斷續續讀了幾年私塾』，是打下過一定基礎的了。另方面，分行如散文般的新詩句好讀，少典字淺，較易招時代青年喜閱。所以，書作者也錄引了多篇謝山新詩。

●
究竟謝山寫新詩，是否得心應手了？就讓我這後生，大着胆子「奉命」註①試讀一回。看看自己如何強作解人。

《水滴》讀過多遍又再慢讀，題旨明確，是革命同路人互勉扶持兼自勵自許，情愫自然在詩後，尤其是兩年後的《星星》，一種意象，多重情意。

改題《我是一顆渺小的水滴》版本，早在書內讀過，當時粗疏忽忙，到直面單張列印頁，便攪着首段第五行句子：

『我聽憑擺弄——變圓變方，變紅變黑，』

由於明了詩者的經歷，再加上歷史上曾發生過的紅黑論，詩者心意不難明白。而就得心應手方面看，一顆水滴，由形象到意象，亦不深奧。水滴天然如珠墜，散下或凝成半顆；或更細點，它不必「變」圓，亦難變「方」。再「變紅變黑」，則見急於釋放往事而強說了。

但這一行，明顯是點睛句，怎樣處理而令之再生，筆者亦乏力。

有云海納百川或百川匯海，是在說江河的歸處。長江黃河，滋養兩岸生靈，但她們必須不是鹹的海水。是詩次段末五行：『我們每一滴（顆）註②水滴都滋養着沿海的人民，分擔着他們的歡樂悲哀。』明顯得很，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沿岸」會較妥貼。另外，『渺小』詞不及『細小』好，『衝毀』不及『沖毀』好；『茫茫無垠註③的銀光』、『那時，你會聽到我的歌聲，這歌聲是多麼暢快——』，似可再修飾。

靜夜讀詩是愉悅的事情，評詩改詩則是危險且殺風景的所為，聰明人多不會幹的勾當，我又犯了。

我不能忘懷的是，書底出版者的小介：

『一生坎坷，屢遭不幸，身處底層，心境高華，……』

謝山是普通人，又不普通，身居草野，心屬天下，中國像謝山這樣的人太少，而像踐踏謝山那樣的人又太多。

……』

這纔是叫人擲筆肅起長太息，越過文字，穿越詩行，我們仍然感覺到一些東西——家國不幸詩家幸，那麼，家國平安，詩者無事，可以了嗎？

二千又十年七月十日 破曉時分

附記：

《苦口詩詞草》內「詞七十首」，首二闕：《蝶戀花·九龍彌敦道中》（一九四七年）及《蝶戀花·港九輪渡》（一九四七年），難得的涉及本地佳作，歷史留影。小友叫「阿偉」，常以曾經青年托派自居。「十月」社指本刊。

蒙邀稿略修於2011.9.16

〔註〕

①奉的是小友有命，說是書內引錄的詩感人，要我書介。

②一滴水滴，有誤。原作抄本影頁見：一顆水滴。

③茫茫無垠。古文《弔古戰場文》：『浩浩乎，平沙無垠，……』；茫茫一詞，本義豐足，毋須無垠。謝山詞：《永遇樂》『漢水茫茫，楚天黯黯，人在何處？……』（書頁一七零），又抄本影頁附有一九六三年七夕《未題》詩四行，內亦見：『只有白茫茫的銀河啊，』句。

家破人亡——追憶陳景光的慘痛一生

一卒

陳景光是廣東潮陽人。自幼在家鄉讀書，聰明好學，思想進步。抗戰初期，讀高中一年級時，與同學組織「青年學術研究社」，學習社會科學，宣傳抗日救亡，舉辦民眾夜校等等。1940年在小學教書，被一三青團教師誣為異己分子，被迫離鄉，去了上海。

在上海，他白天做學徒，晚上補習英文、會計。結識了一些共產黨方面的同學，通過他們介紹了一些同鄉參加新四軍進行抗日。後來陳在毛織廠當會計。開始學習寫作、投稿，認識了〈新人出版社〉的編輯，參加了他們主辦的讀書會。

1943年秋，考入上海大夏大學經濟系。白天做會計，晚上讀書。在該校認識了歷史代課教授陳松溪（彭述之化名），陳教授以唯物史觀的方法講中國歷史，把他吸引住了，常和一些同學到陳教授家坐談，來往甚密，思想大受影響。

1944年夏，一天晚上，彭述之和籍雲龍突然去陳景光家，說剛從杭州回來，要求借宿一宵。第二天才告以實情：原來有些托派分子被日偽追捕，故逃難至此。彭還告訴陳自己的真面目，並把一些托派文件請其保管。陳景光一向受共產黨影響，視托派為日本漢奸、蔣幫特務、帝國主義間諜等等窮凶極惡的傢伙，現在他所崇拜的教授，竟是一個托派分子！這個晴天霹靂使他久久不能平靜，陷入極端苦惱之中。……

經過一段激烈的思想鬥爭，加上閱讀彭述之托其保管的文件，知道他們的政治主張，了解到他們不但受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還受斯大林和中共的造謠污蔑，把他們打扮成大花臉，凶神惡煞，使

人們看不清其廬山真面目。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艱難地進行頑強的鬥爭，使他深受感動，並確認他們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自此以後，更積極參加他們的活動了。

1946年陳碧蘭（彭述之妻，陳碧雲化名）創辦《青年與婦女》，陳景光自告奮勇，去社會局登記，自任發行人，參加編委會。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詩歌，他的新體詩寫得很好，是有名的詩人，筆名「藍天」。

1947年秋，由劉康介紹，籍雲龍接受他參加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同盟在建黨大會後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

1948年春，由同學介紹他去中央航空公司做會計，後隨公司南遷至香港九龍。1950年2月，陳景光參加兩航（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起義，隨機飛抵廣州。

他是兩航起義員工，收入不菲。結婚不久，有個女兒，請個保母，過着溫馨的生活。1952年冬至以反革命罪被廣州市公安局逮捕。其妻頓感大禍臨頭，悲痛欲絕。雖不是托派成員，也是殺、關、管家屬，公安人員和單位領導對她毫不放鬆，逼她交代問題，檢舉揭發，劃清界線，爭取寬大。使她悲痛欲絕，六神無主，家裡被抄得亂七八糟，保母被嚇跑了，以至女嬰無人照顧，一病不起，慘遭夭折，後來離了婚，從此家破人亡。

陳被捕後判刑五年，押送湖北省漢陽新生磚瓦廠勞動改造，擔磚挑泥。慣坐辦公室、拿筆杆、打算盤的人，一下子要挑土，壓在肩上的擔子，那怕只有一丁點兒，也不堪負重。幹不了半天，腰酸背痛，肩膀腫脹，腳底也打了水泡。走起路來，東歪西倒，像扭秧歌似的。這就是：「強迫勞動，以觀後效！」

1956年夏，政府組織在囚的托派分子參觀學習，陳景光看到武鋼、武重等大型企業、農業生產合作社、醫院、學校等等。尤其蘇聯展覽館，看到蘇聯的成就，工作人員一再強調：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使他感慨萬分。工業國有化，農業合作化，再加上計劃經濟，這是社會主義的象徵了。自己所追求的，還不是社會主義！他認為共產黨是真真正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過去把她看差了，現在噬臍莫及！

1957年4月19日漢陽新生磚瓦廠召開獎懲大會，陳景光被宣佈提前釋放。當犯人給他戴上「新生花」時，他的心情異常激動，大有「覺今是而昨非」之感，以為過去那段歷史，像惡夢般一去不復返了！今後回到祖國的懷抱，要好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他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少不了他這種人才。於是，滿懷希望，走出監獄。

他以為自己是兩航起義的有功之人，回到原單位要求工作，得到的答覆是：已被開除，永不錄用。這迎頭一擊，非同小可。當時就業困難，沒有工作，就沒有飯吃。後來街道辦事處要他參加政協（政治協商會議）學習，一起學習的多是勞改釋放份子：有國民黨、三青團的軍政人員、特務、青紅幫及共產黨的變節份子等等，過去深受其害的人，現在像垃圾一樣，被收集在一起，去「洗腦筋」。每月領社會救濟十二元，算是對知識份子的優待。一般人只有六元，小孩三元。隨後介紹他去工地挑土，每天一元，也時有時無。

他念念不忘已離婚的妻子，幾經打聽，才知女方這幾年來為他吃盡苦頭，雖然離了婚，也無濟於事。在舊社會，一些革命者被捕以至殺害，其家屬不受株連；或易地而居，改名換姓，逃離厄運。而在新社會，則大不相同。一個單位，把全體職工的生、老、病、死都管住了，動彈不得。審查交代，檢

討批判，沒完沒了，政治上的壓力，使她透不過氣來。她是個知識份子，離開學校即到機關工作，找了個如意郎君，以為是終身伴侶，從此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不料禍從天降，一下子掉進萬丈深淵，不能自拔。離了婚也沒用，檔案就像個緊箍咒，緊緊地箍在她的頭上，時不時念動真言，使她痛不欲生。這幾年來她所受的苦難，並不比陳景光輕鬆。陳在勞改隊，除管教幹部外，都是犯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高低。而她處在群眾之中，卻被列入另冊。每次運動，都要被動一下。知識份子是最愛面子的，撕破了臉，無異撕心撕肝，日子難挨。後來下放農場，從未幹過體力勞動的人，要戰天鬥地。肉體上吃苦還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壓力並未因此而減輕，在農村一樣要受監督、受歧視，還要接受批判，苦不堪言。當陳景光輾轉托人找到她時，她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過去他們夫妻恩愛，感情甚篤，她相信陳從未做過傷天害理，為非作歹的事。離別五年，時時縈念。現在回來了，喜出望外。有機會時，還是偷偷地進城去看望他。他們不敢到外面，生怕被過去的同事看見了，橫生枝節，只好躲在他寄居的朋友家的瓦面上，互訴苦衷。顧不得夏日的瓦面像個蒸籠，把他們蒸得汗流浹背。

是年中秋之夜，女方帶來一些食物，與友人一家共聚晚餐。飯後依舊在瓦上談心。望着圓圓的月亮，想起過去甜蜜的生活，陳景光再也受不了目前寄人籬下的處境了，他不滿足於這樣偷偷摸摸的約會，希望重建家園。女方一再勸他：目前能間中見見面已算好的，要他忍耐些，慢慢來。可是陳等不及了，苦苦哀求，重溫舊夢。不管環境怎樣惡劣，經濟怎樣拮据，也要建立一個家。女方心有餘悸，覺得現實如此殘酷。他在農場，雖有一定自由，但界線分明。下放幹部是有各種問題的所謂「社會渣滓」，低人一等，

受人歧視。經常開會學習：深挖思想根源，徹底改造世界觀，批判檢討，從未間斷。現在要和「反革命分子」復婚，無異自討苦吃。政治環境是如此惡劣，經濟情況更糟，農場工資不多，陳做臨時工，收入低微且不固定。要建家庭，談何容易。過去的家已被毀了，現在重新組合，租房子、置家具，一切日常用品，樣樣都要錢。靠兩人不固定的收入，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個在農場，一個做臨時工，今後飄泊何方，難以預料。現在要復婚，為時尚早。這幾年來，為他吃盡苦頭，他還不理解，只重感情，不顧實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個要求太過分了，再來一次打擊，如何受得了！那晚談話至深夜，不歡而散。經再三考慮，女方找他談了一次話，表明態度，交給他一個照相機，這是過去唯一留下的一件價值昂貴的物品，從此不敢再去。

欲速則不達，陳景光對「家」的追求迫不及待，把對方嚇怕了，使他很沮喪。1958年5月陳通過李展的關係，去了武漢，和李展一起在東西湖農場做基建臨時工，每天八角錢。此前，他把照相機賣了六十元，等於六十天苦工，以為賣了個好價錢，沾沾自喜。不料回頭一看，標價一百二十元，再轉身一看，賣掉了。使他後悔不已。

李展是個女強人，在全民辦工廠的號召下，找了四個婦女，合辦拉絲廠。經過一段艱苦奮鬥，成績可觀。業務發展很快，陳景光做會計，不用當苦力軍了。

陳景光渴望有個溫暖的家。廠裡一位股東姓楊，曾因打麻雀被捕判刑，與李展在被服廠勞改時認識，陳與她相愛。不料雙雙挨批鬥，說他們「臭味相投」。孤男寡女，談情說愛是正常事，也以行政手段進行干預，終於把他們拆散了。

不久，陳被派出所調去大辦鋼鐵。1960年8月，又被派出所派去市郊參加抗旱，原

訂二十日，結果搞了幾個月，最後號召全體抗旱人員在當地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名義上是自動報名，但誰敢不服從？於是一百多人全部留下，無一倖免。

初到生產隊，他在食堂做會計兼記工分，一身兼二職。拿十多工分，比強勞動力十分計還要高。過去隊裡帳目混亂，年終結算，遲遲算不出來，社員工分也記不清，群眾意見很大。他記工分後，清清楚楚。除搞好本身工作外，還幫助大隊會計搞好日常工作，年終結算，很快便算出來了。領導和群眾滿意，他也高興，覺得這裡比原廠好多了，人格受到尊重，不用挨批鬥，吃飯不用愁。食堂的糧食，是自己種的，新鮮可口，不似城裡吃陳糧，還要配40%的雜糧——苞穀、大麥、高粱。城市副食品供應少，老菜多。品種單一。食堂吃的蔬菜是自己種的，質量好品種多，還養了豬，常有肉吃。別人教他養兩隻雞，放在食堂，走來走去，夠牠們吃飽，不用喂食，常有蛋吃。在當時有這樣的生活，算是優越的，他也心滿意足。

食堂會計也好，記工分也好，用不着高深的學問。要他這位會計專業人員去做，應付自如。一次幾位領導約他去看一塊荒地，有說三十畝，有說二十畝，眾人相持不下，他說有二十五畝，且肯定相差不會很大。眾人不信，拿尺一量，足足二十六畝。大家驚歎他好眼力，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心裡好笑。在他們議論時，他踱步向前，長、寬多少步，每步多長，心中一算，面積出來了，這是小學的算術，就那麼簡單。但那些幹部文化水平差，連這個也不懂，才把他神化了。

和他一起下放的一百多人中，他算是幸運兒。其他人要下地勞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辛苦苦，養了自己，養不了家，叫苦連天。那裡地勢低，常受水患。一次水災，農田被淹，家也保不住了。由生產隊安排去

城裡做臨時工。大隊和派出所研究決定，讓一部份人回城算了。於是通知1961年下放的可遷戶回城。消息一傳開，如下了大赦令，急不及待，把戶口遷走，派出所始料不及。因為平時組織他們學習時，聽到的都是好話，那知他們的苦衷！眼看一下子都要遷走，慌忙凍結。陳景光猶豫了一下，遲了半天，已截止了！

一個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禍福是難以預料的。誰料這一步之差，以後把他「整」得要命。

由於一系列政治運動，階級鬥爭越抓越緊，他的食堂會計由別人代替了。派來的人學會後，把他踢開。新會計水平有限，兼不了記工分，也另有人做。他要下地勞動，要靠戰天鬥地來養活自己，工分比過去少了一半。再加上精神壓力，使他苦不堪言。文化大革命兩派之間爭權奪利，鬥來鬥去，都把他作靶子，狠批猛鬥。對「敵」鬥爭狠，才表現自己是革命的「左派」，否則會被對方抓辮子、扣帽子，所以他成了兩派鬥爭的磨心，成了他們的犧牲品。無論大會、小會，都不放過他。還要他抄寫批鬥自己的大字報、大標語、大橫額，使他想到渣滓洞裡的烈士臨終前要他們自己挖墓穴的悲慘情景。挖墓地不一定是埋葬自己的，但他抄的卻清清楚楚是爲了批鬥自己而造的會場氣氛。不論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或是造謠污蔑的不實之詞，都要他照抄不誤，內心的痛苦，難以言喻。

他是知識份子，有文化，有見識，在農村裡，如鶴立雞群。過去領導有什麼問題，主動找他研究；群眾有什麼困難，樂意找他幫助。他來者不拒，盡力而爲，受人尊重。現在不同了，這隻鶴太高大了，領導在他面前也顯得失威，現在報復的機會來了，怎肯放過！一部份牢騷滿腹的人，辛辛苦苦，不得溫飽，無處發洩，也乘機出氣。更有些積

極份子，也想從他身上撈稻草。他成了眾矢之的。結果把他整垮了，還不肯罷休。

農業生產靠天吃飯，天災是難以避免的，但人爲的災害更甚。那時的政策，一切行動聽指揮，不管實際情況，具體條件，一聲令下，蜂擁而上。農業學大寨，硬要把斜坡變梯田，洪水一到，就沖垮了。自流灌溉是勞民傷財的事，辛辛苦苦把有限的田地挖出灌溉渠道，水一放，低的被淹，高的水流不到位，無法控制。又要用鋤頭扁擔挑呀抬呀去填平。結果農作物受損，農業失收，最差的一年，一個工分只有八厘錢！一個強勞動力十分計，每日只有八分錢，當時够吃一根冰棒！

「積肥」既髒且臭，很多人不願幹，非要陳景光去不可。工分卻不加，拿低工分幹強勞動力的事，這是赤裸裸的剝削行爲。他的任務是在鎮上打掃廁所，馬車來了，打起糞便，挑出去，倒上車，由車夫拖走。初幹這行，不但氣味難聞，惡心欲吐，就是看見那千千萬萬、蠢蠢欲動的蛆蟲，也够毛骨悚然了。但「置人刀俎供人烹」，只得服從。他沒有氣力，挑不了一擔，東歪西倒，好容易挑到馬車旁，那位車夫知道他體力差，主動幫他倒上車，並輕聲說：「少挑些，我多等一會便是。」使他大受感動，體會到群眾眼睛是雪亮的，內心得到安慰。他知道並非每個人都是凶神惡煞的，很多人心中有數，不好公開表示，只有沉默寡言。如果在生產隊，眾目睽睽之下，那位車夫是不敢叫他少挑的。慢慢地他愛上這個工作了。表面上是個苦差，實際上比隊裡幹活好得多，工作時間少得多。車子拖走了可以歇一會，不用一天幹到晚，業餘還要搞環境衛生等義務勞動。聽不到有理無理的漫罵聲、吆喝聲。晚上住在鎮上的茅棚，又脏又臭，但習慣了，反覺舒服。因為那裡遠離生產隊，不用開會，不受批鬥，不挨打受罵，可以鬆一口氣，

也可以說是「自由自在」了！可惜「好景」不長，每月只有幾天，由各生產隊輪流去積肥。

記得剛出獄時，他滿懷信心去建設社會主義，以為中國共產黨是真真正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是出獄不久，「反右」開始了，以後形勢急轉直下，運動一個接一個，直至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極。為什麼老是強調階級鬥爭，鬥來鬥去？為什麼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而不集中精力去搞經濟建設？自己本是起義人員，雖曾參加托派，沒有幹為非作歹的事。且無論在那個工作崗位上，都是兢兢業業，盡心盡力，為什麼得不到體諒，還要成為眾矢之的，萬箭穿心，比坐牢更受罪？……一連串的問號，得不到答覆；一顆赤子之心，無人理解。白天勞累過度，晚上躺在床上，像放電影似的，一幕幕悲慘景象，展現眼前。他支持不住了，腦動脈硬化，兩眼直視發光，手足失靈，走路困難。無錢醫治，還要出工，下地勞動，苦不堪言。

遠在家鄉的老母，心痛極了，要他回鄉治病。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仍不放過這個活靶子。一次在路上遇見派出所所長，陳向他訴說病情，要求回老家去。所長看他病成這個樣子，留下來也沒用，將來還是個負擔，於是答應他遷戶回鄉。領導無奈，只好放行。

直至1977年5月，他像逃出魔窟似的離開這個鬼地方，回到母親的身旁。他的母親已86歲，仍能操持家務，他自愧不如。弟媳找來名醫為他治病。他得到親人體貼關懷，壓在頭上的大石沒有了，冷酷的面孔不見了，喝罵聲聽不到了，連他的「安樂窩」——又髒又臭的茅棚也不用去了。精神上的壓力，肉體上的折磨，都離他遠遠的了，在武漢十九年的悲慘生活像惡夢一場過去了！可是他已病入膏肓，回天無術，任何靈丹妙藥，只有拖延時日而已。而且他一貧如洗，

吃飯問題不大，醫療負擔很重。弟弟勸他不要管，安心養病就是了。

陳景光與弟弟向來感情很好。陳被捕後，其弟受到株連。幾十年來，吃盡苦頭。他不知托派是什麼一回事，只從魯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毛澤東選集〉裡知道托派是「漢奸、特務、走狗……」等等。但從哥哥身上從未發覺他是個壞人，反正為此坎坷一生。過去他的哥哥回家探親，其弟避而不見，住在單位不敢回家，以免檢查交代，諸多煩惱。可這次不再逃避了，住在家裡照顧兄長。尤其政協隆重地專車送上起義證書後，更毫無顧忌，悉心照顧，使顛沛流離，受盡冷酷的親人得到溫暖。

他回鄉第二年，當地大隊要為他「摘帽」（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等五類份子「帽子」），到他原來的公社去查檔案，出乎意外，他根本沒有「戴帽」！沒有戴帽而當五類份子整，把好好一個中年人整至殘廢人，使他怒不可遏。但有什麼辦法呢？「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過是勸世之言，有多少心狠手辣之人得到報應的？把他整得要命的人，肯定沒有人用同樣的手法去整他，使他嘗嘗那種滋味。所以有「若然不報，時晨未到」之說，把「報應」推向冥冥中的未來，搪塞了事。苦果是他吃了，善後工作是家人承擔，整人者則逃之夭夭，不受懲罰。使他傷心不已。於是要求落實對起義人員的政策，艱難地不斷往縣城去，跑了幾年，那些單位像踢皮球似的把他踢得精疲力竭，病情加劇而止。

1982年，廣州成立南方航空公司，急需技術人才，找到陳景光時，他已生活不能自理，無法復職了！只有發給他一個很漂亮的「兩航起義人員證明書」，每月給予生活補助25元，醫療費也沒有。幸得親友幫助和全家人無微不至的關懷照料，挨了幾年，1985年7月折磨殆盡，終年65歲。

他回鄉後，念念不忘他的前妻。經多方打聽，知道她已結了婚，定居香港。仍在工作。丈夫已去世，有個兒子二十歲，在上大學。前妻仍關心他，問他患什麼病，需要什麼藥，只要能買到，不論昂貴，定會寄去。陳接信後，心情異常激動，思前想後，無法控制。於是寫了一首詩，也是最後的一首詩：

讀來書

顫抖的雙手捧着來書，
久違的筆跡躍然眼底，
我說不出是悲哀還是歡喜。
愛我的 x x 已經死去，
我愛的 x x 仍在人世。
我無法使死去的 x x 復活，
也無法使活着的 x x 重返年輕時。
欲哭無淚，
二十年無消息。
桑田已成滄海，
怎奈此心不移。
彷彿就在昨日，
你淚痕依稀。
是什麼使你言不由衷，
身不由己？
是什麼使你踐踏我的忠貞？
橫着心兒把我拋棄。
是什麼使我在你心靈上抹黑？
讓那美好的記憶黯然無生氣。
是什麼使你變成如此的「現實主義」？
生活就是一切，
一切爲了吃飯穿衣？！
什麼恩情，
什麼忠貞，
拋到九霄雲外。
是什麼
是什麼使你麻木不仁，
走肉行屍？

我不懂，
我不懂。
現實爲何如此殘忍！
它摧毀人的意志，
它湮沒了純潔的情操，
善良的動機。
它逼得我家園破滅，
兒死妻離。
它使我心肺欲碎，
肝膽俱裂！
它逼得我貧病交困，
發呆變癡。
多情應笑我，
當年用鮮血寫下了盟誓。
年年月月，
月月年年，
我自甘孤獨，
讓無邊的寂寞把我磨折。
到頭來只落得癡人說夢，
一文不值。
譏笑我吧，
鄙視我吧，
五尺男子不出息！
剝奪我吧，
摧毀我吧，
我已一貧如洗，
除了那些美好的記憶。
記憶呀記憶，
它曾給我以溫暖，
給我以自豪和生活的勇氣。
我將手握鮮花和野草，
擁抱着它去見上帝。
天若有情當開眼，
我恨綿綿無盡期！

1980年1月19日

驀然回首大學時光

熊安東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重慶考取中央大學歷史系，中央大學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由南京搬遷到重慶的，校本部在距市區三十多里的沙坪壩，分校在距沙坪壩二十多里的柏溪，兩地都瀕臨嘉陵江。

一九四五年是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的一年，四月蘇軍和美軍相繼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殺，歐戰收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日軍尚佔據半個中國、朝鮮和東南亞各地區，在太平洋各島上，美軍和日軍進行著猛烈慘酷的爭奪戰，美軍猛攻，日軍死守。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蘇聯對日宣戰，蘇軍迅速消滅了日本勁旅關東軍，十四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投降，美蘇中英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艱苦的八年抗戰結束。

手裏都握著槍杆子的國共兩黨分別向日軍佔領的淪陷區調兵遣將，國民黨說是收復失地，共產黨說是擴大解放區。美國政府爲了美國的利益，曾企圖“調處”國共兩黨關係，赫爾利代表美國總統於八月二十七日飛到延安，二十八日陪同毛澤東飛到重慶，於是國共兩黨進行了四十三天談判，簽訂了一份《會談記要》（即《雙十協定》），談判環繞政權問題和軍隊問題，各說各的，討價還價。中共主張成立聯合政府，國民黨拒絕承認中共領導的軍隊和解放區政權的合法地位。雙方約定談而未決的問題，留待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繼續磋商。

毛澤東到重慶後，同蔣介石合拍了一張並肩而立的全身照，據說是美國記者拍攝。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曾到沙坪壩看望老朋友柳亞子。應柳亞子索句，毛澤東抄錄舊作《沁園春·雪》奉贈。詞的下闕：“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柳亞子步韻和詞，下闕末句：“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史實劄記：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

八月九日，蘇聯一百五十萬紅軍進軍中國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令八路軍、新四軍大反攻，控制日偽佔領區。

八月十一日，蔣介石致電中共中央，制止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行動。

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國民黨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規定：中蘇共管中長鐵路三十年，旅順爲蘇聯海軍基地三十年，大連港成爲國際自由港，中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

八月十四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毛澤東不予理睬。

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莫斯科三封電報，再三勸說毛澤東必須赴重慶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

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代表美國總統飛到延安。

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飛抵重慶。國共兩黨進行了四十三天的重慶談判。]

——摘自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日21時中央台紀實頻道。

由此可知，重慶談判是美蘇幕後牽線的皮影戲。

日本投降後，川江上的船舶都被國民黨政府徵調，搶運軍糧和軍用物資。戰時移到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的學校，拿不到運輸工具，無法復員，被迫滯留雲貴川一年。九月，中央大學仍在重慶開學上課。

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談判，打口水仗。國民黨的中央軍和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東地區衝突越來越頻繁，國共兩黨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國民黨統治區民眾爭取和平的民主運動高漲，學校裏的自由、民

主氣氛濃厚，各種社團辦的壁報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張錫縉是我在國立六中四分校讀初中時的同學，那時我們一群小夥伴曾在一塊讀進步書刊，辦過壁報。張錫縉是我們之中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一九四〇年讀初三時他同其他幾個人受到警告，被迫離校。分手時，他知道我正在讀馬列原著，那時還沒有看到托洛茨基的書。分手後，聽說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幫他轉到其他學校讀高中，學校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因此失去了聯繫。一九四五年在中央大學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們仍然是孟浪少年時的感情相處。蘇聯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勝利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都壯大了，並且正在同國民黨談判和平建國問題，這些都使他的思想信仰更成熟了。他崇信蘇聯和蘇聯的宣傳，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大學一年級時，他不知道我信仰了托洛茨基，但在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民主運動中，他同我有共同的語言。

《海濤》是眾多壁報中編排不錯的壁報，是張純文藝性質言情的壁報，在介紹臧克家詩的一文章中引用了一段臧克家的詩句：“開在你腮邊笑的花朵/它要把人間的哀愁笑落/你的眸子似海深/從裏邊我撈到了失去的青春/愛情總伴著恨/時間會暗中偷換了人心/我要放出感情的野馬/去追你的笑/你的天真。”這段詩句引起我對臧克家的興趣，想找臧克家的詩集，知道張錫縉喜歡新詩，他也能寫新詩，我向他講《海濤》上這篇文章，沒想到他告訴我，《海濤》是他和幾位朋友辦的，他約我寫稿，我就寫了一篇姚雪垠《春暖花開的時候》書評給他，《海濤》採用了。他帶我到他們編寫《海濤》的地方去，在那裏我認識了趙宏才等人，知道趙宏才是《海濤》主編。聽張錫縉講，趙宏才曾在西安一家報社編輯過文藝副刊。

中央大學柏溪分校校舍建造在一條山溝的兩面山坡上，學校周圍是茂密的山林，一家農戶在竹林深處蓋了幾間簡陋的竹木結構草頂房，在那裏磨制豆腐供應學校食堂，有豆渣又有食堂的泔水，還養了幾口豬。《海濤》就在那裏租了一間草房，屋裏

放一張竹制桌，桌上撒放著幾本文藝刊物和準備編寫壁報的稿件和紙張。我立即意識到他們幾個人肯定是中共地下黨員，組織一個社團，辦一份純文學言情性質的壁報作掩護，爭取公開存在的一個活動空間。後來知道，那時已在中央大學組建了新青社（在中共南方局指導下的地下青年組織）。張錫縉沒有盲然把我拉進海濤社，他介紹我去參加政治系學生杜一飛發起組織的追求社，說是一個有進步傾向的社團。

追求社辦的壁報刊名《追求》，它的頭一期我流覽過，是版面整潔又謄寫得很漂亮的一張壁報，內容有散文、詩歌、讀書心得、時事評論等。在刊頭下面標注辦社宗旨：

“追求友誼，追求進步，追求知識，追求真理”。這樣亮出辦社宗旨，我一看就斷定辦社的人不是三青團的，三青團擁有權勢就擁有了一切，他們不會用追求進步追求真理這類字彙；也斷定他們不是新青社的，新青社的人當然認為進步和真理在他們手中，他們不會掛出這些字彙暴露自己。

我參加時，追求社已是二十多人的社團。杜一飛是召集員（不稱社長），歷史系的李炳均是組織員，外文系的李平濟是宣傳員。二十多名社員來自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教育系、藝術系、政治系、社會系等八個系。原來是群互不相識的男女大學生，被四個“追求”吸引在一塊，親如兄弟姐妹，真是不亦樂乎。現在還記住大部分人的姓名：杜一飛、李炳均、李平濟、王紀志、羅成義、葉公亮、李方、李芳、曹先志、曹惠白、胡潤如、喬象鐘、谷風、袁家祺、張君若、杭英、張維明、高興農、程紀平、戴伯宏、柏興翰等。

杜一飛是個憑青年人特有的正義感活動的廣東人，他的活動能量大，交際廣泛，能應對各色人物。我不知道他用什麼辦法，在大操場西北角弄到一間小屋，弄來一張長方型桌，幾條凳子，小屋成了《追求》社員的活動室。星期日，我們大都聚攏在小屋裏圍桌而坐，讀書看報，編寫《追求》，開讀書討論會，時事座談會等等。

讀書討論會上曾討論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討論過毛澤東的《沁園春·雪》，

等等。時事座談會上最關心的是國共兩黨的談判，四十多天的談判是如何進行的和談些什麼，報紙上無所披露，我們就根據一些流傳的小道新聞漫談，總的印象是國共兩黨的談判是在那裏劃地盤，爭奪勢力範圍和分配政府委員名額。

十月間，杜一飛和李平濟從美國大使館的新聞處借來世界名曲唱片和留聲機，以追求社的名義在柏溪分校舉辦一次世界名曲欣賞晚會，豐富了一年級八百多同學的精神生活，追求社獲得好評和好名聲。接著又從中蘇文化協會借來圖片，舉辦一次蘇聯圖片展覽，我第一次看到大型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的照片，那時我國的農業生產還完全是靠畜力和人工作業。

雲南昆明“一二·一”慘案

抗日戰爭時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高等院校搬遷到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一直保持著北大的自由民主傳統精神。孔祥熙是國民黨政府的紅人，又是蔣介石的連襟，炙手可熱，抗戰期間，利用權勢，大發國難財。一九四三年，西南聯大學生曾發起反孔運動，舉行示威遊行。反孔運動實際是發洩不滿情緒，反對腐敗而又專制獨裁的蔣介石政權。

日本投降，抗戰結束，國共談判，昆明爭取和平、民主的浪潮首先高漲起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學校的學生自治會舉辦時事晚會，受到國民黨軍警的衝擊破壞，二十六日，聯大、雲大等校罷課，二十九日全市學生五千多人上街示威遊行。十二月一日，國民黨特務沖進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校園，對著集會要求和平民主的學生開槍，殺死四人，重傷六十多人。“一二·一”慘案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首先封鎖消息，報紙不得報導，像《新華日報》有所報導，也開了“天窗”（報紙清樣送檢，被檢查官劃掉的字句，紙版上被挖掉，印出的報紙，有許多空白地方，戲稱“天窗”，是國民黨控制新聞自由而造成的醜陋景觀）。

《追求》社獲得西南聯大同學寄來的一

份油印小冊子《匕首》詳細記敘了“一二·一”慘案真象，我們全文抄錄出了一期《追求》特刊。觀看的同學絡繹不絕，議論紛紛，用各種方式聲援昆明學生，有人提議罷課示威。訓導長把杜一飛召喚去，受到訓斥：“你們好大的膽子，把壁報撕掉！”追求社員表示不予理睬。接著，學校佈告欄貼出一張訓導處的佈告，大意是：奉教育部訓令，學生結組社團必須登記，壁報稿件必須送訓導處審查等語。“登記”，“審查”傷害了我們的自尊心，追求社和我所知道的幾個社團，都表示拒絕登記和審查，與訓導處的通告形成了僵持局面。這已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一月初，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致詞中許下了四項諾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權。青年人的思想反應快，我注意到貼在佈告欄裏的那張通告上不知被誰劃上了一個很大的“X”。

“一二五”請願遊行示威活動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簽訂《停戰協定》，雙方發佈停戰令。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現在通稱舊政協）在重慶召開，這次會議開到一月三十一日結束。據史料記載，當時出席會議的共三十八人（國民黨八、共產黨七、民主同盟九、青年黨五，無黨派人士九）。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許下四項諾言，其中之一是保障人權。

國共兩黨四十三天的談判，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提出的，又一再修改的提案，把問題推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商談解決。協商會議桌上，國民黨方面占不到絕對優勢，只有青年黨站在國民黨一邊。國民黨反共派就企圖利用中央大學三青团發動學生遊行干擾和分散會議進程，結果引發了中央大學中進步力量與三青团勢力的一場較量。當時中央大學學生會有雙重機構：系科代表大會和學生自治會。系科代表大會是由各系科按規定的人數比例產生代表組成，它是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有權對罷課、遊行以及各種公共事件表態，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進行表決，做出決定。而學生自治會是執行系科代表決定的機構。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主席）

是通過競選由全校學生投票產生，候選人須先組成十人的理事會參加競選。一般只有兩個競選人競選，他們分別代表學生中的兩種政治思想傾向，有點像美國總統選舉。我不知道中央大學學生會這兩套選舉制是如何設計出來的，也不知道是從何時開始的，只知道這兩套選舉辦法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中央大學改為南京大學後截止。

一九四六年一月，剛剛選舉換屆的系科代表大會，進步思想傾向的代表占多數，但尚未換屆的學生自治會掌握在三青團手中，要發動遊行必須由系科代表大會開會討論和做出決定才行。系科代表大會上代表經過認真激烈的爭辯、磨合，決定遊行請願，制定了“政協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總口號，通過了向政協提交的七項要求和遊行時用的二十多條標語口號。七項要求是：①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放棄黨派私見；②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③國民大會代表必須合理產生；④嚴格執行停戰命令，永遠停止內戰；⑤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⑥黨派一律退出學校，實行講學自由；⑦政治協商會議沒有成功之前不許閉幕。二十多條口號有：①任何黨派不許擁有軍隊；②國家利益高於一切；③要求國內團結、統一、和平、民主；④徹底執行停戰令；⑤學校講學自由；⑥一切黨派退出學校；⑦立刻嚴懲漢奸；⑧雙方釋放政治犯；⑨嚴懲貪污；⑩反對官僚資本；□經濟民主化；□我們要變不要亂；□擁護蔣主席和平建國；□徹底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等等。系科代表們經過爭辯、磨合，制定的要求和標語口號，使得三青團方面也無法反對。系科代表大會還通過了一項臨時決定，成立十九人組成遊行委員會主持這次遊行。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大學、重慶大學、教育學院、中央工職、戲專、音專等十多所院校一萬多學生和幾十位教授步行三十多里到市區遊行請願，中大吳有訓校長和重慶大學馬寅初教授也都參加了遊行。一路上貼標語、喊口號。“國民政府”的牆上也貼滿了要求和平民主的標語，這是抗戰八年期間向未有過的事情，是國民黨

（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四三）發動三次反共高潮製造高壓政策以來，首次出現的民主運動。我還是頭一回參加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親身感受到群眾運動一旦發生就會產生出它自身運動的力量，意志不堅決的勇敢起來；膽小怕事的在群體行動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認識模糊的思想提高了；彷彿有一種使命感把參加運動的人互相團結友愛起來了。

遊行委員會推出三名代表把七項要求送交上去以後，各黨派代表出來與全體學生見面。孫科代表國民黨首先講話，他的話很長很囉嗦，我還記住的幾句是：“抗戰勝利來之不易”，“現在是千載難逢的建國大好機會”，“你們應該好好安心讀書，前途大有希望”等等。官腔官調，加上他那叫人聽起來很吃力的口音，聽眾有點不耐煩的騷動聲響。接著是周恩來代表共產黨講話，他的普通話講得簡捷，“同學們來政協提出的七項要求，不僅是你們的要求，也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這七項要求，並且願為之實現而奮鬥”，最後他振臂高呼：“政協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得到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周恩來的風度，博得了學生們的好感和好評。之後邵力子、張君勱、莫德惠等人也向學生講了話。

遊行的次日，《新華日報》以“民主大進軍”為標題，詳盡報導了“一二五”遊行實況，評論“一二五”遊行是五四精神的繼續。

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建國綱領》後，於一月三十一日閉幕。

在軍隊國家化問題上和各自實際控制區的劃分問題上，國共兩黨相持不讓。《和平建國綱領》成了僅是紙上的東西，半年後，中國的命運還是靠武力解決。

那天遊行結束後，我沒有隨遊行隊伍步行回校，我到“五十年代出版社”蘇學常住的地方，重慶托派組織的領導成員範文華和隗寬正好在觀看學生遊行後回到那裏。他們告訴我，已經與上海托派中央取得聯繫，中央分成了兩派，還在打派仗。他們贊同我與中共同學攜手參加反獨裁專制、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他們認為不反對中共提出成立聯

合政府的要求，但我們應當明確提出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我們堅信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深入推進民主革命，必然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我同他們見面後，傍晚就乘嘉陵江上的小輪船回學校。

二月初，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換屆選舉，兩派力量經過一場熱鬧非凡的激烈搏鬥，產生了新的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和兩個副常務理事都是校內知名的進步同學。他們都熱心公眾活動。中共處於非法地位，新青社的骨幹在公眾活動中大多不做太出頭露面的工作，他們總是把進步學生中自發冒出來的活躍分子推到第一線，經過一段考察，這些活躍分子，有的成了新青社員。從這一屆自治會開始，三青團勢力沒有再奪回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在系科代表大會中，進步力量一直處於多數地位。

“二·二二”反蘇大遊行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大學、重慶大學等幾所高等學校萬餘學生，又到重慶市區舉行了一次遊行示威活動，這就是“二·二二”反蘇大遊行。發生遊行的原因，要追溯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在蘇聯雅爾達舉行會議，決定歐戰收場以後，蘇聯參加同盟國對日本作戰，為此，他們背著中國簽訂了一個秘密協定，規定了蘇聯參戰的條件，其中有關中國的是蘇聯在中國東北獲取某些特權，如租借旅順為蘇聯海軍基地、大連港闢為國際自由港、中蘇共管從滿州里到大連的中長鐵路、維持外蒙古現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日，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後，八日，蘇聯對日宣戰，九日，百萬蘇軍開進中國東北，消滅日本關東軍。八月十四日，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政府正式接受了雅爾達秘密協定中有關中國的條款，但在當時沒有即時公佈。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雅爾達秘密協定公佈後，引發各界民眾和青年學生的憤怒和不滿，反對強權政治和秘密外交。同時期，蘇軍在東北

拆搬機器、用軍用票搶購物資、蘇軍大兵強姦婦女等等，亦時有傳聞。這時又發生了“張莘夫事件”（國民黨政府派到東北接收煤礦的工程師，慘遭殺害），許多事件彙集起來，更激發了中國民眾和青年學生們強烈反應。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大學教授發表《致蘇聯政府電》，學生們更是主張舉行示威遊行。民族主義的愛國心，再加上反動派的鼓噪，突如其來的、又像是水到成渠地爆發了二月二十二日的反蘇大遊行。沒有經過系科代表大會討論，推開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三青團和復員青年軍主導了倉猝爆發的“二·二二”反蘇遊行活動。自從雅爾達秘密協定公佈後，中共的《新華日報》，在宣傳方面顯得被動，國民黨的《和平日報》振振有詞地大做愛國主義文章。

二十一日上午，張錫縉、趙宏才等人對即將舉行的遊行持抵制態度，表示不參加。追求社的許多人認為遊行是三青團鼓動起來的，表示不去參加。到了傍晚，張錫縉等人又忙著分頭勸說進步同學，都要去參加遊行。

二十二日，追求社的二十多位同學，除我一人，他們都去參加了遊行。我決定不去遊行，在嘉陵江邊一家小茶館裏閑坐了一天，看江水歡快地向東流去，運煤船上的船工們，踏著整齊的腳步搖槳划船，聽他們喊唱著蒼涼的號子聲。

“二·二二”遊行後不久，我聽說，新青社社員勸說進步同學都去參加遊行，是接到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說遊行是普遍自發的學生愛國運動，如果都不參加，就會失去群眾的信任，中間勢力是占多數的；還要組織一些人保護《新華日報》館，預防反動分子衝擊破壞，等語。

關於“二·二二”反蘇遊行，我走筆多囉嗦幾句：現在我能看到的有關解放前學生運動的官方史料中，“二·二二”遊行是不寫的，彷彿沒有發生過。我看到有人在回憶文章中，提到“二·二二”遊行的事，有人就因參加了那次遊行，在十年後的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倒了楣，劃分右派六條標準之一是“反蘇”，反對史達林的蘇聯那還了得！雖然史達林的聖光被赫魯雪夫折騰得

差不多了，那時在我們的國度，史達林還被榮尊為偉大革命導師。也有人在回憶錄中寫到，當時，抵制了“二·二二”反蘇遊行，“並且引以為榮”。

在《李慎之文集》中，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那次遊行的事，當時他剛剛大學畢業，抱著滿腔革命熱情，被調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現摘錄李文的有關一段敘述：“一九四六年年年初，由於蘇軍在東北拆遷機器，並且殺了中國工程師張莘夫，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學生進行抗議遊行。說實在的，其規模之大可能在中國是空前的。我正由成都到重慶，一路上看到鄉下的田間小路上都有中小學生排著隊，搖著旗子喊口號。一到重慶，就讀到了《新華日報》的社論：《愛國不等於排外》。當時蘇軍在東北搶掠姦淫的惡行，雖然我們這些左派不相信，但是中國人知道的是多的，僅僅因為大學生在左派的掌握下，按兵不動，也就沒有引起大的風波。相對比之下，與僅僅一個月前的昆明“一二·一”和一年以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五十萬學生抗議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而舉行的示威遊行，其勢頭之猛簡直不能相提並論”。（《文集》一五三頁）[筆者按：從敘文可以推算出李慎之是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到重慶的，他是沒有親眼目睹二十二日重慶的大遊行的，而《新華日報》的那篇社論恰恰是針對二十二日大學生遊行而寫，刊登於二十三日報紙上。據我所知，二十二日以後，在許多中小城市的中學生，在老師的率領下紛紛舉行了遊行，這與李慎之在路上看到的情況相符。]

從重慶復員回南京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大學學期考試完畢，提前放暑假，準備復員。一放假，能回家的如川雲貴等省的同學，各自回家去了，杜一飛也回廣東家鄉去了。曹先志和我把留校待船的“追求社”社員組織起來，成立“ABC讀書會”，參加的有李炳均、李方、羅成義、曹惠白、喬象鐘、胡潤如、穀風、張仲逸、常建宇等十多人。原計劃圍繞某一本書某一個專題進行學習討論，我只參加了一次討論會，因被一年級同學選為代表

之一，參加協助學校復員工作，提前離開柏溪到沙坪壩與高年級的代表會合，於五月初乘江輪回到南京。壯美的三峽風光，留下空前印象，一生不忘。

離開重慶前，到市區見到隗寬，他是重慶托派重要成員之一。他告訴我，範文華、蘇學常和劉毅三人已經去上海，他們到了上海後，範文華參加了少數派，蘇學常和劉毅參加了多數派，根據他們的來信，隗寬還是弄不明白，上海托派中央為什麼分裂成兩派。隗寬囑托我，回到南京後，一定要先到上海，把分裂的原因弄清楚，寫信告訴他。這是同他最後一次見面。

南京中央大學校址，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改建成軍事醫院，成了亞洲規模最大的野戰傷兵醫院。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的接收大員，從日本人手裏接收了這所醫院占為己有改為陸軍醫院。幾經周折交涉，中央大學才從國防部手裏要回了原來的校舍。國防部把能夠搬動的物資，都當作敵偽財產，搬走了，留下的是空蕩蕩的校舍。我們把所有的樓房和平房都清掃乾淨，給將要分批復員回來的同學住宿。

協助工作結束後，我於六月中旬到了上海，住蘇學常的大哥家，蘇大哥比我和蘇學常大二十歲，是位不識字的老郵政工人，從十九歲就在火車站幹接送郵件的活。從此，我每從南京來上海，都是住蘇大哥家，他的家成了我們從四川復員回來的托派學生們的聯絡點。他對我們的事情不聞不問，他只熱情地招待我們吃住，可能他暗想我們是共產黨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網打盡”後，他仍在火車站幹接送郵件的活，一直默默無聞地幹到退休，像他同樣的郵政工人，早就提幹或成了勞動模範。一九八〇年，我被釋放回到上海定居後，我試著去找找看，他竟還住在老地方，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身體還很健壯，每天早晨要到公園裏做健身活動。他對我說：“我不懂什麼‘托拉機派’、‘托拉斯派’，我只認為他們都是好人，我向審查幹部就是這樣講的”。他的弟弟蘇學常於一九四八年去臺灣，一九五〇年在臺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判無期徒刑。這

件事，我始終沒有告訴蘇大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蘇大哥在世時，他時刻等盼他弟弟的消息。

我設法弄到了托派分裂時雙方爭論的若干油印小冊子，就呆在蘇大哥家的閣樓上看了一個星期。看完後，我寫了一份書面材料交給雙方。在抗日戰爭問題上，贊成多數派的主張：保持政治獨立，支持抗戰；不贊成少數派的主張：抗戰變質論和革命失敗主義。

蘇學常介紹我與華貝（籍雲龍）見面，華貝又領我去和耀如（劉家良）見面，我就算作多數派成員了。同時，梁貽也帶我去與連根（王凡西）見面，連根善談，很投合青年人的心理。我留的印象是，他們雙方，對我們這些在四川經歷戰爭成長起來的托派思想學生，都是表示期待和信任。而我們對他們幾位托派老人都很崇敬。一九四七年初，我第二次來上海時才分別認識了彭述之和鄭超麟。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一次來上海最大的收穫是，從多少數雙方拿到了我所需要的書和小冊子——已經翻譯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著作。那時上海來了一批莫斯科出版的中文《列寧選集》上下兩巨冊裝，市面上很難買到，不知彭述之通過什麼關係，拿到若干卷，他叫蘇學常帶給我兩卷。我在四馬路（福州路）一家進步書店，買到了幾本馬恩重要著作的中譯本。

擴散思想

馬恩的思想與列托思想，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擴散思想就是擴散他們四個人的思想。在我的判決書上有一條“罪行”是“積極在學生中散佈托匪謬論，一九四六年在南京為首組織托匪‘支部’。”

金萬林是第一個受我影響接受了托派思想的，他是地質系的學生，比我高一年級。一九四六年五月，在復員回南京的輪船上認識的，我們的艙位緊靠著，船上生活單調，除了看看風景，就是與人閒聊或看看書。我注意到他聚精會神地在看何幹之的一本社會性質的書，我覺得奇怪，一個學地質的人喜歡這樣的書。因此，我就同他聊起了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何幹之那本書是論戰性質的，略論到托派的觀點。金萬林表示，不知托派是怎麼講的，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受到的思想訓練首先是嚴慎認真和求真。嚴靈峰的一本社會性質論戰的書正好帶在身邊，就借給他看，他看後，贊成嚴靈峰的觀點，他說：現在無論城市或農村，到處都是洋布、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釘、洋襪子，四川人稱自行車為洋馬……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霸佔了中國的市場。閒聊中，知道他參加過“一二五”遊行，他對國共和談不抱樂觀；他參加過“二·二二”遊行，他說那是一場無組織的亂哄哄的遊行，青年軍分子呼喊反蘇口號，進步同學就用更高的聲音喊：“一切外國軍隊都撤出中國”等。他對國民黨專政獨裁不滿，思想要求進步又無明確目標。我開始同他談社會性質問題，他說他看過《新民主主義論》。我忙完了協助學校的工作後，到上海住了半個月，回到南京後，我把《共產黨宣言》和《國家與革命》介紹給他看後，又繼續同他談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接著把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本書介紹給他看。美國宣佈“調處”完全失敗，國共全面內戰，抱和平主義思想的大多數同學都陷於苦悶，金萬林接受托派思想。

杜一飛是第二個受我影響接受托派思想的。因為復員，那年暑假放了四個月，到十月才宣佈開學。杜一飛回到廣東陽江，見到了他在中學時的許多同學（已是中共或傾向中共），約他到農村去看看，有意要他留下來，在農村幹一番事業，他想留下來，但對農村幹革命沒有信心，結果，他還是回到學校來了。他對我講了在農村的所見所聞，那裏已經有了一支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所謂武裝力量，就是有幾支步槍和手槍。我介紹他讀恩格斯的《德國革命與反革命》和《德國農民革命》，還有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等幾本著作。他聰明，是個筆尖子快，勤於寫作的人，看完幾本書後，就寫了兩篇文章給大家傳看，他在文章中明確論證在民主革命中，農民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農民只能跟著資產階級走或跟著無產階級走。我把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問題》和

《不斷革命論》介紹給他看。他接受了思想後，不組織社團不辦壁報，他在學校裏辦起了一個民眾夜校，報名參加的都是中大的校工和校警，每天晚飯後在教育系的一間教室上課。原來參加追求社的兩位教育系的女同學，還有曹惠白擔任教課。那時曹惠白不知道杜一飛已經接受托派思想，他把杜一飛當作新青社員，他在後來寫的回憶文章中，說她曾在地下黨（中共）領導的民眾夜校教過課。民眾夜校從一九四六年底一直辦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為止。八月，國民黨特務在中大逮捕進步學生，杜一飛逃走離校。

曹先志是第三個受我影響而接受托派思想的。同讀歷史系，在重慶時同參加過追求社，又同組織過“ABC讀書會”。回南京後同住一寢室（一室八人），星期日，閒暇時就結伴逛書店或去玄武湖和中山陵遊玩。讀中學時，他就喜歡寫作，深得國文老師的好評。一九四六年六月復員回到南京後，在那個漫長的暑假期間，他開始寫電影評論，寄《新民報》發表，有稿費，又可買電影票，我沾光不少。以後他寫的書評不是發表在《和平日報》副刊上就是在《文匯報》副刊上，儲安平編的《觀察》上還多次刊登他的散文式的通訊。在校內他參加新青社員王國慶主持的《太公報》，是校內唯一的新聞性手抄壁報，他擔任過抄寫、採訪、編輯和寫社論等項工作。我知道他已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美國人斯諾的《西行漫記》，也讀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書，我介紹他多讀馬列的著作。他在自傳體的《我這一輩子》書中寫道：“他先介紹我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著作……”“爲此，我先後讀過《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四月提綱》等著作，腦子裏裝進了一些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概念。”“接著他又介紹我看《托洛茨基自傳》、《中國革命問題》等書，還把美國記者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這部報告文學作品介紹給我，這部書記實性地報導了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十天內的情況，曾得到列寧的推介。”

“……使我知道，列寧逝世後，蘇聯共產黨

內經歷了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路線鬥爭，史達林取得了勝利；他背叛了國際主義原則，一切政策以蘇聯的利益爲出發點，我國大革命失敗就是由於史達林的右傾機會主義所致。”“……使我開始探索歷史真象的願望。”（《我這一輩子》十九——二十頁）。曹先志對文學作品的感受力很強，法國文學家安德列·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和《從蘇聯歸來答客問》兩本小冊子同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寫的《震撼世界的十日》，都是紀實性的報導，曹先志讀了紀德的兩本小冊子後，完全相信了托洛茨基在《蘇聯現狀與前途》（《被背叛的革命》）對蘇聯的分析和批判，接受了托派思想和觀點，成了我在南京活動的有力助手。

曹惠白讀中國文學系，在重慶讀一年級時，參加“追求社”和“ABC讀書會”。她爲人樸實大方，熱情豪爽。她的父親曹亞伯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是位民主主義革命元老。北伐戰爭後，不滿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和篡改辛亥革命史，退出政界，隱居江蘇昆山，著《武昌起義真史》。上下兩冊，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民國時期，曾遭禁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華書局曾再版發行）。認識曹惠白後，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使我想到舊俄作家屠格涅夫在散文詩《門檻》中所塑造的那位爲爭取自由而挨苦難的俄羅斯少女形象，而曹惠白一生一世，遭受的苦難，大大超過了屠格涅夫的想像力。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歷次發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她都積極參加，在學生運動中，她很活躍，她感召力很強。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大三千多學生因伙食費問題，到教育部向部長朱家驊請願（後節詳敘），回校後，我對她講“朱家驊是五四運動學生運動中興起的人物，現在成了學生運動的對頭”，她說了一句：“歷史是一代人踏著一代人的屍骨前進”，語氣深沉，我受到震撼，記住了，至今不忘，當時我回她一句：“你這話講得很有哲理”。我同她交談的次數多了起來，知道了她父親的經歷，她把《武昌起義真史》借給我看後，同她談的議題更多了；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正在進行中的國共內戰等問題。一九四

七年暑假，她到上海住在她父親的一位王姓朋友家裏，我介紹她去參加彭述之主講的哲學班，告訴她參加聽講的都是上海大專院校的學生和青年工人，她同意了。暑假後，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開始同她談馬恩列托的理論問題和中國革命問題，介紹她看《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路》（即托寫的《過渡綱領》）等書和小冊子。她求索真理的精神很強，她讀理論書的理解能力和吸收能力也很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初的寒假期間，她仍到上海住王家度假，我介紹她去參加“社會科學講座”，聽彭述之講中國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問題和劉家良主講國際工人運動史。從此她確立了思想信仰。回學校後，積極地擴散馬恩列托的理論觀點，把她看過的書，傳給她周圍的所有認識的同學看，這引起了（中共）新青社的注意，因為在她周圍的人，大多是新青社的或思想傾向中共的進步同學。在她還沒有把托派宣傳小冊子傳給人看之前，（中共）新青社可能把她看作是發展可吸收的物件，一九五二年我被捕之後，托案承辦人曾向我講過這樣一句話：“曹惠白如果不是受到你的影響，該是我們多好的幹部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民黨特務在南京第二次大逮捕學生（另節記敘），曹惠白被捕，男友鄭顯芝早已在上海被特務逮捕（上海解放前夕遇害）。她被釋時，淮海戰役已接近尾聲，國民黨軍隊連連潰敗，南京政局混亂，學校已呈停課狀態，曹惠白無處安身，離開南京到上海，又去香港進工廠當工人，懂得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一九五〇年四月，從香港回到上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國肅托“一網打盡”時被逮捕。經過一年管制，未判刑釋放，安置就業，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安然無事。一九六三年中蘇兩黨大論戰，雙方互相把托洛茨基派這頂帽子硬向對方頭上扣，當時，許多中共高級幹部如“墮入冰窖”，“不敢多講一句話”（《李慎之文集》語）。不知曹惠白主動還是奉命寫思想彙報，在彙報中，一條思想的大意是說《九評》中的某些論點與托洛茨基的論點一樣。這還

了得，她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立即召開群眾大會揭發批判，給她戴上“托匪”帽子，送政法機關審查，判刑坐牢，延至“文革”，橫遭文鬥武鬥，肢體嚴重受傷。她意志堅強，思想信仰未被擊潰。

以上四人，是直接受我影響接受托派思想的，以下簡述南京其他托派思想的人：

羅成文是中央大學社會系的學生，與曹先志同時參加中共同學王國慶辦的“太公報”。一九四八年初，他一度去蘇北解放區，不久，他回來後，受曹先志影響接受了托派思想。

楊同春是金陵大學學生，受金萬林影響。

熊人望在金陵大學半工半讀，靖江人，抗日戰爭時期，彭述之曾一度在靖江避難，不知是住在他家還是住在他父親的朋友家，他那時還在中學讀書，認識彭述之而受到影響。

范月秋是江甯師範學生，也是靖江人，也是受彭述之思想影響的，抗戰結束後，她一度在上海進工廠做工，後來考取南京江寧師範。在江寧師範她影響了兩個女同學和一個男同學，組成一個讀書會。曹先志負責定期與她聯繫。

邱季龍和胡振東都是溫州人，在溫州讀書時參加了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投考南京金陵大學代辦的工商學院讀書。上海負責青年團工作的周仁生把他們介紹給我，他們是氣質優秀，信仰堅定的兩個青年人。

趙慎也是溫州人，在溫州讀中學時受到托派思想影響，抗戰後期去了重慶曾進工廠做工，抗戰結束後，他借親戚關係，回到南京，在國防部充當一小職工。他在溫州讀中學的女同學陳秀蘭在中央大學讀書，傾向中共，他倆很要好，但思想上誰也說服不了誰。趙慎能弄到軍用火車票，不用花錢，使我來去上海，非常方便。

李修梅，安徽人，在重慶兵工廠當工人，受範文華影響接受托派思想。抗戰結束後，也是借親戚關係，回到南京，在後勤部充當一名職員，在中央大學附近一條小巷子裏租借了一間民房住。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大潰敗，中共又發起了淮

海戰役，局勢越來越緊張，學校裏有捕人的傳聞，我把許多有關的書籍、小冊子，都送到他住的地方存放，他是一位很忠誠的人。

張聖時是我的中學同學，年級比我高，是最早受托派老師閔子桂思想影響的學生之一。他到重慶先進工廠做工，後又準備回到被敵偽佔領的山東家鄉進行抗敵活動，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受盡折磨後釋放，到江津國立九中讀完高中，與我同時考取中央大學，讀藝術系，專心致志於學畫油畫，與我保持個人聯繫。

江□□，名字記不清了，一九三五年前後在北平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與劉家良、王振華等同一時代，已脫離組織，仍與劉家良個人聯繫，劉家良把他介紹給我，與我保持個人聯繫。

我現在再回頭記敘一九四六年底以後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和我的活動。

抗議美軍暴行的兩次遊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發生美軍強姦北京大學生“沈崇事件”，中央大學校園各種壁報立即貼出抗暴專刊，《太公報》更以剪報形式揭露美軍暴行。（中共）新青社發動同學，要求召開系科代表大會，討論舉行抗議美軍暴行遊行示威，商定了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遊行，受到三青團勢力反對，他們認為強姦是法律問題，不必發動遊行示威，不要被“另有作用”者所鼓動利用等語。他們脅迫中間分子退出會場，使系科代表大會代表人數不足法定的半數，使決定不能成立。

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下午，中央大學只有不足千人的學生以“自由參加”身份與金陵大學、劇專、音專、藥專、東方言專等學校的學生共三千多人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遊行隊伍走到國民政府門前，高呼口號“美國兵，滾出中國！”“請政府保障人權”等等。學生代表呈上三點要求：①請美軍立即撤出中國；②請政府向全世界控訴美軍暴行；③請政府保障人權。

劇專學生在宣傳卡車上扮演美軍暴行的活報劇，激發起圍觀市民們的憤怒，跟著學生呼口號。遊行隊伍行至美國駐華大使

館，中文口號夾雜著英文口號此起彼伏。五名代表進入大使館要求見大使，提出四點要求，由參贊接見，參贊宣稱：司徒雷登大使整個下午都在等待遊行的同學們，直到五點鐘才因公出門去了，留下一紙書面信。內容：“關於北平不幸事件，正由北平美軍海軍當局徹底偵查中，如犯法屬實，自當以軍法從事。我們對於這次事件當然根據事實如何，以民主原則為依歸，現正等待北平偵查的結果。”拿了這個回答信，代表只好辭出，向同學們報告了經過情況，遊行隊伍撤離大使館回校。

得知二日遊行情況後，中大未參加遊行的學生紛紛提出三日再舉行一次遊行。二日晚上，系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各自回到所在院系，聽取同學們的討論意見。三青團勢力看到無法阻攔遊行，提議加上要求蘇軍撤出東北，取消蘇聯在東北的特權等口號。在歷史系小組討論會上，有人反對這一意見，認為這次是針對美軍暴行的遊行，不應再提“二·二二”反蘇遊行的口號。在討論中，我提出：接受他們提出的要求也行，但應該再加上“要求收回九龍、香港和澳門”的口號，我說：這樣一來，就使這次遊行有了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要求實現民族真正獨立的性質了。歷史系多數同學同意我的意見，其他院系也接受了歷史系通過的意見。二日深夜，系科代表大會上經過爭論通過了三項遊行口號：美軍立即撤出中國；一切外國軍隊都要撤出中國；嚴懲暴行罪犯，等等。

一月三日下午，中央大學三千多學生又走上街頭，只有少數極端親美分子沒有參加。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劇專、音專等院校的學生又都來加入組成近六千人的遊行隊伍。仍沿二日的路線，先到國民政府，呈交請願書，經過《和平日報》館時，有人喊“《和平日報》拿出良心來，不要造謠”，經過外交部時，有人喊“中國不是美國殖民地，不做美國人的尾巴”，“外交部要維護國格，不要媚外！”一路上沒有受到軍警的阻攔。最後，仍到美國大使館，我注意到在大使館外，增加了軍警防護。司徒大使接見學生代表，他首先表示，他要講的話，都寫在昨日的書面信上了。他彬彬有禮

的學者風度和言詞回答代表們的提問，最後表示：還沒有收到北平最新資訊，對你們提的要求，無法回答得更具體。

天色轉暗，遊行隊伍再一次撤離美國大使館區，各自回校。

經歷這次反美暴行遊行最大的收穫是成立了全市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會，其次是使安於現狀的中間分子（他們在學生中占大多數）擺脫了三青團分子的影響和控制。

反美暴行遊行後，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改選換屆，王世德任常務理事（主席），朱成學和王安民任副常務理事組成十人的學生自治會理事會參加競選獲勝，我是十名理事之一，負責文藝和宣傳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駐南京、上海和重慶的代表團全部撤退回延安，國共和談徹底破裂，兩黨內戰全面展開。

“五·二〇”學生運動始末

一九四七年春，國民黨為應付內戰，大量印製鈔票，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在國統區各地，不斷發生搶米風潮。中央大學教授會於三月二十七日，五十多位教授開會，推舉歷史系主任賀昌群教授起草了《中央大學教授宣言》，於五月六日公開發表。教授們提出了六項“鄭重決議”：

一、請政府決定並施行全國教育經費最低不得少於國家預算百分之十五。

二、各黨派、青年團訓練經費，不得由國家文化教育項內開支。

三、請政府直接指撥充足外匯，交各校訂購圖書儀器及科學器材，並簡化上項各物向國外訂購之各種手續。

四、教員薪津應明文規定，依照物價指數支付。

五、教授最高薪額，應由六百元提高至八百元。

六、如不能達到目的，吾人為國家前途及實際生活計，當採取適當步驟，以求上列決議案之有效貫徹。

中大教授發表《宣言》之後，中央大學學生伙食團於五月十日貼出佈告：“近來物價猛漲，伙食費不能維持到月底，即日召開桌長（八人一桌）會議，共商辦法。”佈告一出，群情激憤。系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激烈辯論，通過決議，要求國民政府按照物價指數調整伙食費（解放前國立大專院校學生伙食是全部公費的），並決議自五月十三日罷課。

五月十三日，中央大學學生為提高伙食費，到教育部請願，教育部長朱家驊拒不接見，由總務司長用“搪塞”、“推托”和“官腔”三件法寶對付學生，同學們氣憤異常，一位情緒過於激動的同学，舉起雙拳砸碎傳達室的玻璃窗，雙手和手腕都是鮮血。請願未得到結果。

五月十五日，中央大學聯合劇專、音專等校共三千多名學生到行政院請願，要求提高伙食費。行政院長張群不知去向，由副院長王雲五出面接見學生代表，雙方辯論好久。王雲五說：“政府沒有錢”，學生問：“打內戰為什麼有錢？”學生們根據教授《宣言》，要求教育經費提高至國家預算百分之十五，王雲五說：“改變預算須經立法院通過”，學生就問：“打內戰是那次立法會議通過的？”王雲五最後表示：“伙食費可以提高一些”，但拒絕按物價指數支付。學生說：“請你不要用社會上商務買賣來討價還價”（王雲五是商務印書館大老闆）。

中大系科代表大會決議，五月二十日，趁“國民參政會”開幕時，再次舉行遊行請願，同時與上海、杭州、蘇州各高等院校學生取得聯繫，希望採取共同行動。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八所高等院校學生立即舉行聯席會議，決議為要求增加伙食費派出代表赴南京，參加請願活動。

五月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發表社評，大大挖苦為伙食費請願的學生們，它說：“五四運動是為國家主權，何等偉大！”《中央日報》的暗臺詞是譏笑我們為吃飽肚皮，興師動眾，遊行請願向政府要錢。《中央日報》的挖苦，卻激發了學生們的思想昇華提高，系科代表大會又作出補充決議，在“搶救教育危機”、“反饑餓”兩口號後面加“反內戰”口號，使遊行請願有了政治色彩。

五月十八日，蔣介石召開國務會議，針對連日來“學生鬧事”，發表的談話中惡狠狠的兩句話：“國家何貴乎有此毀法亂紀之

學校，亦何惜乎如此暴戾恣肆之青年！”國務會議通過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請願和一切罷工、罷課、遊行示威，違者採取“必要措施”和“緊急處置”等等。這沒有嚇倒學生們，反而激怒了學生們。

五月二十日一早，憲兵員警就把守住中大校門，並要學校交出學生自治會主要領導人，吳有訓校長當即拒絕。憲兵員警把守中大校門，學生們知道沖不出去，就像若無其事的樣子在校園裏走動，待到快中午時，中大學生和上海各校學生代表分組從學校後門突擊，與金陵大學等校學生會合，五千多名學生舉行“挽救教育危機”、“反饑餓”、“反內戰”大遊行。遊行隊伍行進到珠江路口時，受到員警的阻攔，走在前面的隊伍冒著高壓水龍噴射沖了過去，剩到最後的幾百名中大學生（多數是女同學），遭受了員警用粗棍橫打，被打倒在地的女學生又遭腳蹬和踢。我已沖到前面去了，沒有看到那陣暴行的場面。據事後統計，輕傷近百人，重傷十九人，被捕二十八人。沖過水龍頭封鎖線的隊伍，行進到國府路（今長江路），又被五道防線阻攔：騎兵、憲兵、步兵、青年軍、防護團。第一道防線是一字橫排的騎兵，高頭大馬緊緊靠近。無法向前沖，遊行隊伍困在那裏。下午二點鐘，狂風大作，接著暴雨，學生們堅持原地不動，最後，學生代表到國民參政會會見秘書長邵力子，邵力子出面調解，學生代表與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達成協定，協定之一是軍隊撤防，讓學生隊伍回校。

南京“五·二〇”血案發生後，全國有六十多個大小城市的學生舉行遊行、罷課等活動，表示支援。

五月三十日，毛澤東在《蔣介石政府已處於全民包圍中》一文中：“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侵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尖銳鬥爭。”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北平學生提出以六月二日為“反內戰日”，號召全國罷課、罷工、罷市。那時，中大學生從十三日

已經罷課。五月二十日遊行挨打後，學生們很氣憤，要求再舉行遊行，系科代表大會開會通過決議，六月二日，再舉行一次命名為“反饑餓”、“反內戰”、“反暴行”的遊行，響應北平學生五月十九日的號召。過了兩天，系科代表大會又開會，通過了撤銷“六二”遊行的決定，並通過決議，六月三日複課。遊行為何又撤銷呢？“南京地下黨市委指示我們取消‘六二’遊行，以免遭受打擊。”（《南京黨史資料》第二期六十七頁）。當時，新青社員堅決執行上級指示，在進步同學中進行了勸說活動。系科代表大會決定撤銷“六二”遊行，與三青團方面反對舉行遊行，兩相巧合。

一九四八年“五四”紀念和 “五·二〇”周年紀念活動

“五四”二十九周年紀念活動，在中大、金大、金女大，分別舉行了一星期。內容有：歌詠大會、戲劇晚會、詩歌朗誦會、營火晚會、學術講演會、“五四”史料展覽等。我和中共同學蔣毅辛負責主辦“五四”史料展覽，我把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重要文章，都翻開放在展覽桌上顯著位置，我還寫了簡略說明貼在牆上。那時，還沒有經歷後來半個世紀的反托陳宣傳影響，共產黨同學也沒有表示異議和反對。現在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受到承認和尊重，看到學者們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陳獨秀，既感到興奮，又自愧無力參與。

“五·二〇”周年活動內容是在南京各大學舉行巡迴史料展、漫畫展、座談會、紀念晚會等。二十一日，南京萬餘學生在中央大學操場舉行紀念晚會，有著名教授演講，有去年遊行示威受傷同學的控訴等，最後是晚會文藝節目，曹惠白演唱陝北民歌《兄妹開荒》，音專三百人大合唱後，劇專演出活報劇《典型猶在》，演的是袁世凱坐皇帝前後的史實，全劇共三場，演至第二場時，以顧崇實為首的三青團特務分子近百人沖進會場搗亂，斷電線滅燈，亂打人等騷動了一陣，群眾在“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安靜下來，打手們在黑暗中遁出。糾察隊在紊亂中抓住了兩名行兇打手，一查，是高中學

生，三青團員。晚會無法繼續進行，各校學生整隊集體離開中大。在路上，有四位同學被埋伏的特務抓捕，當晚送到三民主義青年部關押。引發了第二天中大學生包圍青年部要人，青年部大門緊閉，憤怒的學生們在大門頂中央用瀝青寫上“特務部”三個大字，又把青年部的招牌改寫成“中國刮民黨中央暴行委員會青年部”。青年部長陳雪屏拒不接見學生代表，學生們衝擊青年部大門。僵持到中午，金陵女大學生們來支援，她們帶來一千多個燒餅和其他食品慰問中大學生。後來，中央大學訓導處的生活指導員和青運處長來了，他們都是與青年部有密切關係的人，他倆出面調處，被捕的同學獲釋。

大逮捕

一九四八年暑假，學校裏就有黑名單要捕人的傳聞。有些共產黨同學和在歷次運動中出頭露面的活躍分子，都不見面了，他們有的撤退去了解放區，有的躲藏起來。我就聽說張錫緒和趙宏才住進麻瘋病院去，那裏有位醫生與中共地下黨有關係。

一九四八年七月，朱成學等幾個人企圖北去解放區的路上，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回來，朱成學被判十年。他是“五·二〇”遊行時那屆學生自治會副常務理事，是位積極肯幹的人，就是他把我拉進那屆學生自治會的理事會的，十個理事都是能為他們競選增加選票的人。那時他是不是已是共產黨員，我不知道，我是托派，他應該是知道的，他常找趙宏才商量事情，當時趙宏才已是中共地下黨組織重要負責人，已經知道我是托派。朱成學於一九四九年，李宗仁代總統時期，由中大教授保釋。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任南京地委副宣傳部長。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國民黨特務在南京第一次大逮捕學生九十三人，被捕都是學運的積極分子。杜一飛住一樓，特務們敲他寢室門時，在同室同學們幫助他從後窗逃走。後來知道，他逃到上海，參加托派少數派活動了三個月後，回廣東他的家鄉去了，與我失去聯繫。曹先志被逮捕，與他同時被捕的那批學生，都押送到南京城外孝陵衛一

處破舊的廟裏，那裏成了特種刑事法庭的看守所。由於學校的營救和國內外輿論的壓力，這批被捕的學生先後經過形式上的審訊程式，都被判無罪釋放，於十一月五日獲釋回校。曹先志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大逮捕的次日，逃離南京，在上海《觀察》週刊社住了個把月，決定回湖南家鄉。一九五〇年回到南京時，中央大學已與金陵大學合併，改組成南京大學。

一九四八年底，在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徹底崩潰，中共又發起了淮海戰役。戰役開局，國民黨軍就處於劣勢，黃伯韜兵團在碾莊全部被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京衛戍司令部對中大、金大的學生進行第二次大逮捕，當晚逮捕數十人，其中有些是第一次被捕被判無罪釋放的。中大曹惠白和金大楊同春被捕。曹惠白被捕的次日，和她同寢室一位教育系的女同學把書桌抽屜裏曹惠白的東西放在書包裏送到我手裏。書包裏除了日記和若干信件，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在第一次大逮捕前，我已把我身邊的和別人手頭的重要書刊、小冊子等，都收集起來，送到校外藏放。

淮海戰役，國民黨又輸得精光。蔣介石引退，副總統李宗仁出臺，準備再度與中共和平談判遊戲前夕，第二次被捕的學生才獲得釋放。

第一次大逮捕時，我正在上海出席彭述之建黨大會。大會後我回到南京，學校已呈半停課狀態，教授照常上課，但有的教室裏空無一人。如果有一個學生坐在教室裏，教授照舊正式上課。教授有教授的苦處，學生罷課是一會事。如果教授不上課授課，就是罷教，不得不存戒心。第二次大逮捕後，我躲住在天主堂辦的孤兒院的後院兩個月。一九四九年初，到上海參加革共的黨團臨委會工作，從此，我的大學生活結束。

“四一”遊行血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發生“四一”遊行血案，第二天看報知道後，我曾回南京一趟。對這次遊行血案的起因與後果，簡略記敘如下：

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一月，遼沈

戰役和淮海戰役相繼結束，蔣介石輸光了打內戰的本錢，一九四九年元旦發表文告，聲明“只要共黨一有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中共提出了和平談判的八項基本條件，第一條即“懲辦戰爭罪犯”，蔣介石名列首位。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下臺“引退”，原屬桂系勢力的李宗仁以副總統身份出臺執政，仍玩和平談判遊戲，發表聲明，要以中共的八項條件為和平談判基礎，並於四月一日派出代表飛赴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

就在和平談判代表起飛的當天，四月一日，南京數千名學生舉行了“反假和平”遊行示威。與以往遊行情況稍有不同的有兩點：①遭受兩次大逮捕之後，南京各校中，進步積極學生留在學校裏的已經不多了；②這次遊行示威是以中央政治大學（簡稱“政大”）學生起頭。“政大”是國民黨政府培訓縣級政工人員的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前幾次的遊行示威活動，“政大”學生概不參加。學生們在全市遊行快要結束時，遭到了南京衛戍司令部“軍官收容大隊”數百名兇手的襲擊，“收容大隊”收容的都是敗退逃回的軍官，他們毆打學生的兇器是木棍、鐵尺和磚頭。當場打死四人，輕重傷二百多人（“政大”傷七十三人，死二人；劇專傷六十多人；中大傷四十七人，死一人；建國法商學院傷十四人；邊疆建校傷三人），衛戍司令部竟推說學生傷亡是與軍官發生互毆造成。這竟與上一年“五二〇”遊行示威時警察局的謊言一樣，為鎮壓學生，一輛運送警官學校學員的卡車，在鼓樓附近翻車，受傷者送到中央醫院，他們受命報稱是被學生打傷。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生存，除了鎮壓手段，還要兼用謊言、欺騙和蒙蔽。

國共雙方和談代表，經過半個月的談判，擬定了一份《國內和平協定》。四月二十日，代總統李宗仁拒絕在“協定”上簽字。二十一日，中共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萬里長江橫渡，二十三日攻克蔣介石政權盤踞了二十二年的南京。毛澤東賦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龍踞虎盤今勝昔，天

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兩黨舉行和平談判，簽訂《雙十協定》，同時期，蔣介石密發《剿匪手冊》，準備再次大打內戰，毛澤東採取“針鋒相對”政策。一九四七年，兩黨宣告決裂，全面大打內戰，中共首先在華北和東北地區實施土地改革，發動農民戰爭，只經過三年征戰，中共領導的翻身做了土地主人的農民子弟兵，徹底打敗了蔣介石“拉壯丁”拉來的兵，把蔣家政權掃出大陸。從此，中國大地上，萬方百族頌唱《東方紅》二十七年。“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懿興盛哉，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

二〇〇八年三月初稿
二〇一一年四月補充定稿

“良知喚醒了內心”

一九四五年在重慶中央大學就有了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青年地下組織——新青社，當時在中大柏溪分校（一年級學生），趙宏才是主要領導人。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學復員南京，一九四七年，中共有了地下黨支部，一九四八年趙宏才任黨總支委員。（參照穆廣仁編寫《中大新青社簡史》，載《南京黨史資料》第二期）。在中央大學，我同趙宏才同年級不同系，我讀歷史系，他讀社會系。大學一年級時開始認識，在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中，彼此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我明白他的中共立場，他也意識到我的托派立場。這並沒有妨礙我同他們在“反饑餓”、“反內戰”的民主運動中採取一致的行動，至少表面上是相互敬重的。

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北京中蘇友協工作時被打成右派，一直拖延至“文革”，遭遇了二十一年非人的苦難生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生活才得以走上正規。晚年死於癌症，生前寫下了二十萬字的自述《劫後餘生的劫後餘聲》。去年，我看到了萬餘字的摘

要，知道了他的苦難經歷和他對苦難經歷的審視和反思。在“江畔懺悔”小節中有一小段文字記敘了他與我的關係。

茲將趙巨集才這一段懺悔文字全文抄錄：

“解放前的地下鬥爭時期，我就沒有左傾症嗎？在中央大學，有托派活動。按照當時黨的政策，我把托派熊某（安東）和杜某（一飛）說成是國民黨特務、幫兇。可是他們積極投入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主運動。我告誡同志們不跟他們合作，提高警惕。個別新青社員背叛組織，投向托派。托派瞭解我們的地下組織，卻從來沒有出賣我們。他們和我們地下組織同志同時被國民黨逮捕下牢，也沒有出賣我們。解放後，公安機關在我的“幫助”下抓到了他倆，我還舉證他們曾在反對國民黨的群眾鬥爭中起了破壞作用。難道這是實事求是嗎？”“我不是做了史達林的跟屁蟲嗎？”

讀了這段文字，我要講的是以下五點：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對全國托派“一網打盡”，在審訊員審問某個問題時，我意識到趙宏才參與了肅托工作，這也只是我的一種猜想而已，可這一猜想壓在心頭，多少年來揮之不去。“公安機關在我的幫助下抓住了他倆”，竟證實了我的猜想，不僅參與了，還動手了。

（二）托案承辦人在一次審問我時，說過“曹惠白如果不是受你的影響，該是我們多好的幹部哇！”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見到曹惠白時，她說她也聽到過這樣的話。承辦人員有什麼根據做出這個結論的呢？“個別新青社員背叛組織，投向托派。”趙宏才指的是曹惠白和曹先志嗎？我不知道她們是不是曾參加過新青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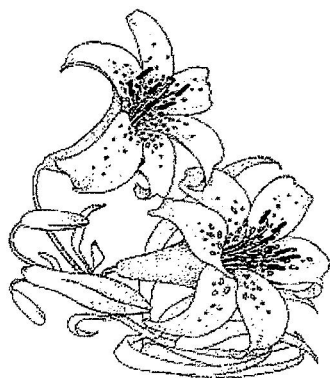
（三）趙巨集才在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兩次說到“沒有出賣我們”，我不能不聯想到，他既然參與了一九五二年的肅托工作，他又是做事很認真負責的人，他不會不去翻查檔案（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和一九

五二年以前被捕反動分子交待的）材料，想找到托派同國民黨“勾結”的證據，那怕是蛛絲馬跡的證據也好，他沒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因此，他連說兩次“沒有出賣我們”不是空泛泛的套話。

（四）“難道這是實事求是嗎？”這是一位忠誠共產黨人的反思懺悔，良知喚醒了自己的內心，是自責，也是對“實事求是優良傳統”說法的質疑！

（五）“這不是做了史達林的跟屁蟲嗎？”一位正直的共產黨員用良知喚醒了自己的內心，才講出了這麼一句沉痛的反思。他曾按照當時黨的政策把托派說成是“特務”、“幫兇”、“起破壞作用”等，他曾參與了“肅托”的具體工作。國際風雲幻變，他看到了蘇聯東歐的巨變，他看到了史達林偶像的崩塌，他看到了《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中對托派的定性作了修改，取消了“漢奸——托匪——反革命”誣蔑性的說法，他明白了他的“左傾症”的根源來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部被譽為馬列主義的百科全書，曾經是共產黨幹部人人必讀的“聖經”。它對史實的歪曲和捏造的謊言，混亂了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思想認識，至今，它的影響還潛存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想要扭轉幾十年來根植於人們頭腦中被歪曲的觀念恐怕比修改毛澤東著作中的注釋更艱難。”（馬長虹《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七期）

二〇一一年四月



The Aggravating Crisis Cannot be Solved Even with Wen Jiabao's Push for Political Reform

Zhang Kai

Wen Jiabao's Proposal for Political Reform

On September 14, 2011,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with high profile pleaded for political reform when he attended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also known as the Summer Davos Forum, in Dalian, a coastal city in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Wen offered his "five points of political reform": 1.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ensuring separa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2.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addressing unfair distribution of wages and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3. ensuring an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4. protecting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the people and expanding grassroots elections; 5. opposing corruption, requir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make public their financial affair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Wen repeated his idea about political restructure in different public events. Wen presented himself as a modest reformist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se position is similar to Zhao Ziyang. In 1989, Zhao, accompanied by Wen, visited the students and protesters on Tiananmen Square. Later Zhao stepped down and Wen went into disappearance for a long time.

President Hu Jintao's speeches to mark the 30 year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to a certain extent supported Wen. Hu stressed that China should push for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refor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ervative faction of the leadership dismissed any notion of political reform. Wu Bangguo,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dvocated the five NOs: no multi-party election; no diversified guiding principles, no separation of powers, no federal system and no privatization".

Modest reformists such as Zhao and Wen urged to solve the serious tension between the bureaucracy and the people. But it is still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structure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Background of Wen's Speeches

Due to the lack of political reform, social unrest is everywhere.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C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has recently released China's first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Report, at the International City Forum 2011 held in Beijing on Sept. 15. Lian Yum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warned that because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and uncertainty of these risks, crises could be massively spread and magnified if risks are not solved now. Furthermore, Lian pointed out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impoverished was widening,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exceeded 0.5, seriously challenging social tolerance; Seco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were increasingly emerging; Third, public security problems were severe, protests by disgruntled people were on the rise; Fourth,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resenting the rich, officials and the authorities could result in social crises; Fifth,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hazards were becoming main threats of society.

Lian also remarked that nine categories of disputes: land disputes, relocation disputes, property disputes, restructuring disputes, medical disputes, labor disputes, pollution disputes, loan disputes, and disputes between locals and foreigners, could easily be transformed into social risks. He examined that these disputes are caused by the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roo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Civic disputes and social tragedies forced the People's Supreme Court to issue an emergency notice on 9 September that all people's courts should seriously settle the cases and solve the disputes based on law. However, scuffles continuously broken out between police and protesters. For example, Wukan Villagers of Guangdong Province protested against the land grabbing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a Hong Kong capitalist. Longtong Villagers also complained about the illegal land confiscation by the developers. Irritated by land disputes, Yilong Villagers attacked the developer's industrial park. There are many social conflicts yet to be disclosed.

Bad Consequences by Capitalism

The CCP has committed a serious mistake in implementing capitalism with corruption and negligence. The mushroom of factories brought harm not only to people's health but also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Dalian PX protest was a public protest up to 80,000 people against a toxic PX (paraxylene) chemical factory built in Dalian city. The government agreed to move the factory out of the city, although the

new location of the factory and the date of its move were not announced.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blocked the main road in Guti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to protest the death of tons of fish in the river Min, caused by the discharge of chemical waste.

Worse still, there are most destructive and widespread pollutants – tiny particulates widely known as PM 2.5.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stitute, cities in the Pearl Delta, Yangtze Delta, Sichuan plain and northeast region, are seriously affected by PM 2.5. Air particulates with a diameter of 2.5 microns or less (hence “PM 2.5”) have serious health implications. They are small enough to penetrate human lung tissue, which can cause asthma, lung cance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he research states that 58% of cities in China have exceeded 5 times the standard of PM 2.5 set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2004, air pollution killed 358,000 of people.

Poor Public Health Services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s have become worse.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reported that hospitals made 5 times profits from the most 20 popular drugs, some even gained 65 times. Doctors were involved in sharing the profits. *People's Daily*, dated 1 September, reported two cruel medical events. In Wuhan city of Hubei Province, a doctor immediately tore open the stitched wound of a peasant worker once he admitted he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In Anguo City of Hebei Province, a mentally handicapped street girl was abandoned into the remote area by a hospital. She died soon after. It is not only a question of morality, but also a question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It is becau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profit-making is the first priority.

Moral Decline

Capitalist economy has led to social indifference, moral decline, profit-orientation and selfishness. For example, in Fosha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 two-year-old girl, Yueyue, was knocked down by two cars, but none of the 18 passengers turned a blind eye. In Shandong Province, a five-year-old boy was dying due to the collapse of the house, but no one gave him a hand. These events stirred national debates about moral decline. Wen Jiabao criticized the moral decline but the editorial of *Guangming Daily* refuted the fact. Nonetheless, according to *Wen Wei Po* dated 23 October,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the Global Net and Global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stated that 86% of the interviewees thought the moral standard largely declined in today China, and officials, doctors and businessmen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mmoral groups.

Other figures prove that there is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China. The Gini Coefficient has already gone beyond 0.4, the acceptable line. According to *Wen Wei Po* dated 6 December, the gap between the highest income group and the lowest income group in the city is also enlarging. It increased from 2.9 times in 1985 to 8.9 times in 2009. According to *Xinjing Daily* dated 8 December,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Guangzhou Popular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showed that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e elites with high income were 81% satisfied with the reality but the grassroots, only 18%. Meanwhile, Fang Xiaojian, the hea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estimated that at the end of 2011, there would be 128 millions of rural poor, which accounted for 13.4% of the whole rural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n peasants in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conducted b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Wuhan, the percentage of peasants who felt they were respected by doctors, officials and the rich were respectively 4.7%, 3.7% and 2.5%; even when they were shopping, only 10.7% felt they were respected. There were not interested in national policies which did not concern peasants, and only half of them had heard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From the above,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has caused serious consequences and it should completely be reformed. But the conservatives within the party refused to make any change even when reformists such as Zhao and Wen proposed modest reforms. Hence, only radical reforms will be the solu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2 December 2011

Postscript

In the following 20 days, Wukan villagers continuously protested and then self-organized in the ‘Temporary Representative Council’. Other villages also followed suit. It seems that there appeared a new peasant movement. At last, Zhu Mingguo, Guangdong's deputy Party secretary, met with the protest leader and agreed to make concessions: (1) to release the arrested within 3 days; (2) to disclose the postmortem report of Xue Jinbo who died during custody; (3) to acknowledge the legitimacy of the Temporary Representative Council. This is indeed a victory of the people which will affect the struggle of democracy and livelihood in China.

23 December 2011

十月評論 2011年第2/3期

Hong Kong

- 2 Defend Hong Kong Press Freedom and Oppose Harassment Law Proposal.....Jun Xing
- 3 Fight for General 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KSAR.....Zhen Yan
- 4 Hong Kong District Elections Should be Just and Honest.....Wei Bo
- 5 Three Hundred Protesters Occupied Central of Hong Kong.....15 October Action...Tr. Wei Zhong
- 6 Grieving New Invasions after the Handover.....Bai Chongqing

China

- 8 The Aggravating Crisis Cannot be Solved Even with Wen Jiabao's Push for Political Reform.....Zhang Kai
- 13 Interest Blocs and the Cost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Po Mi
- 15 The Land Struggle of Wukan Villagers.....Qing Yan
- 17 China cannot save the world from crisis.....Jean Sanuk

Feature on Anti-Nuclear Struggles

- 19 China Should Stop the Nuclear Great Leap Forward: Letter to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 (Reprint).....Anti-Nuclear Group
- 21 Protest Against HK Observatory's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Nuclear Energy.....Anti-Nuclear Group
- 22 Withdraw "Einstein's Interesting Works" Which Misled Children to Support Nuclear Energy.....Anti-Nuclear Group
- 23 China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Nuclear Energy.....Anti-Nuclear Group
- 24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Germany: Stronger than ever-weaker than before?.....Thadeus Pato
- 26 A first turning point in the crisis in Japan.....Pierre Rousset

International

- 29 Solidarity with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Solidarity Political Committee
- 30 Labour Party Pakistan under Attack; Help us to Fight Back!Farooq Tariq
- 32 "Why I Am a Socialist and Intend to Remain So".....(Written in detention)Jeyakumar Devaraj
- 34 Support for Palestine'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Zhao Jing
- 36 Will Jeju Island be Another Okinawa Islands?.....Zhao Jing
- 37 Climate Change and Neoliberal Policies: the Case of Bangladesh.....Danielle Sabai
- 39 A Crisis Without End.....Michel Husson
- 45 Getting to the Root Causes of the Food Crisis.....Éric Toussaint
- 55 The Hate Factory: Xenophobia and Racism in Europe.....Enzo Traverso
- 58 Foundations of an Ecosocialist Strategy.....Daniel Tanuro

Theory

- 65 Contemporary Marxism.....Leon Trotsky

Poem Commentary

- 73 Comments on a poem in Winter Solstice Festival of 1963.....Ng Huen Yan

Memory

- 84 Family Broken up and Decimated---In Memory of Chen Jinguang's Life of Tragedy.....Yi Zu
- 90 Those were the Days at the University.....Xiong Andong

Article in English

- 105 The Aggravating Crisis Cannot be Solved Even with Wen Jiabao's Push for Political Reform.....Zhang Kai

香港	2	捍衛香港新聞自由，反對纏擾法建議！.....	軍行
	3	爭取普選特首，廢除小圈子選舉！.....	振言
	4	香港的區議會等選舉亟需普及公平廉潔.....	微波
	5	三百名示威者佔領香港中環.....10月15日行動著.....	衛眾譯
	6	痛我回歸國土新現侵略物名.....	白重慶
中國	8	溫家寶再提政改也改不了危機加劇.....	張開
	13	既得利益集團與維穩成本.....	破謎
	15	從烏坎農民抗爭談起.....	青岩
	17	中國無法拯救世界脫離危機.....	吉恩·薩努克
反核專頁			
	19	要求國家停止核能大躍進：致溫家寶總理的信(轉載).....	反核之眾
	21	抗議香港天文台散播偽科學欺瞞公眾擁護核電：致香港天文台台長的信(轉載).....	反核之眾
	22	請收回引導學童擁護核電的「愛因斯坦趣味習作」：致香港科學館黃慶瀾館長的信(轉載).....	反核之眾
	23	要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立即廢核：致中電主席的信(轉載).....	反核之眾
	24	德國近年的反核運動.....	塔多·帕托
	26	日本危機中的第一個轉捩點.....	皮埃爾·魯塞
國際	29	聲援佔領華爾街運動.....	團結政治委員會
	30	巴基斯坦工黨受到攻擊，幫助我們進行反擊！巴基斯坦工黨的呼籲.....	法魯克·塔里克
	32	“為什麼我是並將繼續是社會主義者？”.....(馬來西亞)傑雅庫馬·德瓦拉	
	34	支持巴勒斯坦的聯合國成員國地位.....	趙京
	36	濟州島會成為第二個沖繩嗎？.....	趙京
	37	氣候變化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孟加拉的情況.....	達尼埃爾·薩拜
	39	沒完沒了的經濟危機.....	米歇爾·胡森
	45	糧食危機根源探索.....	埃里克·杜桑
	55	仇恨製造廠：歐洲的排外心理和種族主義.....	恩佐·卡瓦索
	58	生態社會主義的戰略基礎.....	丹尼爾·坦努洛
理論	65	當代馬克思主義.....	托洛茨基
詩評	73	試讀一篇一九六三年冬至詩.....	吳萱人
回憶	84	家破人亡——追憶陳景光的慘痛一生.....	一卒
	90	驀然回首大學時光.....	熊安東
英譯	105	The Aggravating Crisis Cannot be Solved Even with Wen Jiabao's Push for Political Reform.....	Zhang Kai